



大连文史资料

第五辑



大连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88年9月

审核定稿：蒋永维、田将庆、王多闻

编辑：王胜利、卓武山、童方、于礼萍

大连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大连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198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1092X787 1/32 字数：135,000

印数：1-2,000册 工本费：2.30元

大连市文化局出字（内）No：0005381

目 录

缅怀邹大鹏同志.....	3
输送干部上前方的一段历程.....	10
李长年被俘后二三事.....	16
反“升科”斗争与宋凤桥.....	26
一场骇人听闻的惨案.....	29
击毙日寇安住.....	32
旅顺监狱回顾.....	34
大连机械制作所罢工事件的演变过程.....	40
关于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情况及其它.....	43
简忆旅顺高公师范部.....	48
回忆金州农业学堂.....	55
关于“南金书院”的由来.....	61
日寇统治时期的一次金银建风潮.....	65

我所知道的满洲兴业银行	71
一起政治谋杀案	79
一支反动武装是怎样转变为革命武装的	85
记蒋介石视察青年军	91
蒋经国给我的印象	98
大元帅府近卫团长吴浩	101
肃亲王善耆在旅顺	105
恭亲王溥伟在大连	123
旗人在大连地区	134
鳌拜的后裔在庄河	141
参加足球活动的回忆	146
永丰塔记略	164
满铁图书馆的西文藏书	167

缅怀邹大鹏同志

张树汉 谷庆福

邹大鹏同志是我的老首长。解放前，在胶东区党委情报部工作时，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45 年秋，我随大鹏同志从胶东渡海经庄河挺进东北，在东北局工作期间，我一直为大鹏同志作保卫工作。与他相处时间较长，因而他所给予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胆识，以及平易近人的作风，体贴、关心同志和爱护他人胜过自己的情怀，深受党内外同志的称道。

邹大鹏同志原名宝丰，曾用名蕴华，1936 年始用现名。1907 年旧历 5 月出生在辽阳市三块石堡子一个贫农家里。1925 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满洲省委委员、中共晋西北调查局局长，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长春市市委书记、长春特别市市长、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部长等职。1967 年 4 月遭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含冤逝世。终年六十岁。

他六岁入小学，四年后考进了辽阳县城高级小学，品学兼优，得到学董张文宣和校长韩国勋的器重，享受免缴学杂费的待遇。在他们的关怀下，又做通了家长的工作，于 1921 年春升入凤城县省立第二师范。就读期间，每月三元六角钱的官费，仅够支付伙食钱。虽然伙食极差，但他每天仍坚持“开夜车”，所以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受“五卅”风暴的影响，省立第二师范学院师生曾举行过罢课、游行示威，震撼了反动当局，也促进了青年学生的进一步觉醒。青年时代的邹大鹏同志，从这时起便接受了反帝反日教育，对共产党及国共合作的内幕开始有所认识。

1925年夏季，借暑假回家探望二老之机，顺便筹措入关路费。父亲性情刚强，望子成材心切，不惜以高利借得“奉币”百元(合大洋四十元)以遂儿子心愿。入关抵北平，正值各校招生，原拟报黄埔军校，但因身材矮小，军校体检极严，不得不改变初衷。此时，汉阳兵工厂去平招收亦窝军医学校新生，踌躇之中在同乡祁某资助下，缴了五元报名费。经过初试及格，又赶赴汉阳以优异成绩顺利经过复试关。深造的愿望终于实现。1926年，大鹏同志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10月，他被派往齐齐哈尔、昂昂溪等地，以中学教员身份作掩护，任满洲省省委委员兼做地方党团工作，积极为党筹措经费，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倾注全部精力为党工作。这个期间，北满地区的学运、工运，农运（尤其是鲜族基本群众）都有较快的发展。共青团的组织建设也有较大的进展。1930年春，邹大鹏被调往哈尔滨负责共青团兼做党务工作。他继续深入群众进行组织发动工作，赤色工会，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群众组织皆蓬勃发展起来，并有效地发动了一次反日筑路运动，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正当各地群运方兴未艾之际，党、团中央先后派巡视员——林彪之叔兄林仲丹（化名张浩）和邹旭去哈地，批判邹大鹏等同志犯有“右倾”错误。他们竟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不切实际地组织党团员、赤色工会会员、近郊农民协会会员数百人，赤手空拳去冲击日本驻哈领事馆。面对着武装的敌人，付出了近五十人被捕的代价。

当他被派往安东商科中学任数学教员兼做学生工作期间，还积极为抗日义勇军邓铁梅部筹款和选配干部。1932年他率干部（非党积极分子）5人，穿过敌人层层封锁，到达邓的驻地，受任政治部主任，并草拟政治工作条例及农民协会章程等文件，很受邓的赏识。他还建议：小部队驻原地（南满和安奉铁路之三角地带，南临渤海由海路同关内保持联络，并接受枪械弹药等项的接济），坚持打游击；大部队则应转移到安奉路以东通化、桓江、临江、濛江（今靖宇）以至长白山地区（即以后杨靖宇率部活动的地区）。虽获邓的赞许，但邓总舍不得离开原地，结果屡遭日寇围剿，终于不幸被俘，英勇就义。

1933年，王明派往满洲的代表执行“左倾”宗派主义路线，又以“右倾”错误对他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停止了他的组织关系。1934年冬，大鹏同志又被派往马占山的骑兵军，给马占山将军做秘书工作。期间，配合骑兵军六师秘密党支部进行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并着力于上层，因而骑兵军与红军长期保持友好关系，推动官兵坚持了抗日。大鹏同志1936年重新入党后，在第六师继栗又文之后担任党支部书记。

1943年夏，大鹏同志这时已从晋绥调回延安。同年秋在分局任书记的林枫同志三次申请中央社会部，邀大鹏同志返晋绥担任情报部第五局局长（1942年中央组建调查局毛主席兼局长，情报部属调查局领导，下设若干分局）。屡遭磨难的大鹏同志，1941年开始在晋绥搞情报工作，在整风审干期间，又蒙冤于“特嫌”受到隔离审查，且不准与家人相聚达八个月之久。他提出种种保护白区工作干部的正确意见，均未被采纳。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终于为邹大鹏同志一一作出公道的评价，在逆境中他也一如既往，以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把组织安排视为天职。

1944年夏秋之交，中央又拟调他前往胶东区党委作情报部长工作。任务是搜集山东和东北地区的情报，并派人找寻抗联残部与之建立联系；建立延安至胶东途径华北敌占区之可靠交通线；建立胶东至华东之海上交通线，为“七大”之后中央有些负责干部需经此路线前去华东、东北做好准备。他感到此行虽有曹里怀等数人，然而任务艰巨，风险颇大，但还是欣然接受了。临行前，周恩来副主席约他参加在杨家岭自己住地——窑洞里召开的三次座谈会，出席会议的除刘澜波、宋黎外，还有中组部代表王鹤寿。他们在会上详尽地叙述西安事变之后筹组东北救亡总会及在北平成立之始末，阐述了其宗旨、任务，认为绝大多数成员是好的或较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不应予以怀疑，把整党期间在党校学习的皆以“特嫌”编于“特别支部”是错误的。周副主席一一做了

记录，并说：“邹大鹏同志就要走了，‘东总’真相也已大白，‘临别赠言’我当予以重视。”

赴胶东之前，因毛主席工作繁忙，委托叶剑英（参谋长）等同志分别与他谈过话。当途经晋绥军区时，在军区领导要求和经中央的同意，他在军区驻地停留数日间，频繁与分局有关干部接触，一方面做思想工作以消除整风审干积下的怨气，同时又留心了解华北地区之敌情。经中央批准，随员和家属暂留晋绥，十二月只身渡黄河前往胶东。路经晋绥八分区时，正值敌人扫荡过后，窑洞皆被破坏，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干部战士不得不改住地窖；缺粮无菜，生活极端困苦。这时，疲劳加严寒，大鹏同志又染上重感冒。更为艰辛的是当进入敌占区，沿同浦路行进时，不但需改装平民，而且夜间遇到敌堡还得匍匐前行。反复闯关卡与敌周旋当中，邹大鹏同志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出色的文韬武略。在敌占区过关卡之外，在走路、住店都经常与小股零星敌伪官兵遭遇，有时令他们猝不及防，但敌人对这位传奇式人物甚为恐惧。因工作需要，大鹏同志对伪军除以言慰之，并晓以抗战救国是国人之大义的道理。他身负重任，延安至胶东之行，一路上与敌人斗，与严寒、饥饿、疾病斗，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如期完成中央所赋予的侦察任务。

1945年我党“七大”闭幕之后，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西欧战场希特勒的垮台，侵华日寇的灭亡指日可待。据此，便决定抓紧向日寇占领下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派遣敌工干部。果不出中央所料，“八·一五”日寇降服。于是奉八路军总司令部命令，向大城市挺进。胶东部队首脑机关准备进驻青岛之际，中央于8月29日电令明确指示：晋察冀与山东均应派得力干部带电台进驻已开进东北之苏联红军的后方，随时向中央报告情况。已在胶东区党委搞情报工作的邹大鹏同志，接到电令后立即着手组织力量，准备从海路进军东北。此对，适逢从延安取道胶东赴东北开展工作的吕其恩、柳运光、吕塞（又名吕其恕）三人先期到达胶东驻地。共同研究决定，组织了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大鹏同志任工委书记，成员有吕其恩、于克、柳运光、吕塞四人。又从东海军分区独立团抽出一个连的兵员，同时组织干部陈迈谦（陈云涛）、王德真、

李光、段品三、李进国、隋从新、张先文、徐仁清、王成学、王春太、初克己、张树汉等同志随行。并配备电台一部，台长为韩均德（韩彬），摇机班同志十余人。8月末集结于刚解放的烟台市，筹划乘船渡海北上。工委对外宣称：“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司令部”。邹大鹏同志为政委，吕其恩为司令员（七大代表，建国后曾任哈尔滨市市长），于克为副司令员（原胶东区党委城工部部长，建国后曾任吉林省省长），政治部主任为柳运光（七大代表，曾任大连地委副书记）。

先遣队首要任务以全力搞船和物资。柳运光、吕塞二同志在烟台一渔行找到吕其贵（吕塞的本族叔弟）搞到汽船，由吕塞带一个排的兵力为先遣，从海路赴大连探路。在两天仍未有回音的情况下，全体成员分乘两艘汽船经一昼夜的艰苦漂泊抵达目的地——王家岛（吕其恩的老家，原属庄河，现为长海县辖区）。趁夜突袭驻该岛的伪警察分所，活捉伪警长毕、杨二人，缴获全部武器。接着在岛上架设电台，及时地向胶东区党委和延安中央社会部报告了情况。中央回电，令“抓紧在庄河登陆”。9月7日邹大鹏同志一方面派出有侦察经验的李光化装渔民乘船出岛，潜入庄河县城搜集情况；一方面在王家岛就地走访群众，访贫问苦，用带来的米面救济群众。在岛上还召开批斗伪警大会，分化瓦解伪职人员。群情激昂，出现青年踊跃参军的新局面。

邹大鹏等同志根据报告侦知苏军尚未进驻庄河；国民党正在该地公开活动，伪县长及其操纵的警务队在“静待中央”接收，遂利用伪县长关德权与家住王家岛的汪伪烟台市警察局特务科主任姜某之间的“亲密关系”（关知道他是国民党“军统”山东行动委员会第三支队的情报员）一事上做文章。所有随员和战士乘用水上警务船和两艘汽船于打拉腰子口岸登陆，派出小分队缴获该警察分所枪械。并令伪屯长吕某同伪警赵某和伪县长在电话里通话，佯称“国民党第五十一军渡海作战先遣支队前来接收庄河，应速派车来港欢迎！”事虽

突然，但对他们却是既敏感又很具诱惑力的。伪县长为防不测，连夜召集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孙某，执委刘某、伪县府科级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对策，并指派伪警务科长于某率警察数人前去侦探虚实。敌人虽狡猾，但在人民武装面前也难逃脱应得的惩罚。最后，还是被缴械了。

解放庄河当天，邹大鹏同志通过支队电台将这一消息分别上报胶东区党委和延安中央社会部，并建议速增派大部队沿支队路线挺进东北。同时，接获中央电令：与所属地区苏联驻军司令部取得联系，立足于庄河，扩大队伍……在沿海组织船只，筹足粮食，迎接山东待命出发的四万大军和地方干部；适当向外扩展，为后续部队登陆创造条件。于是，加紧行动，很快地缴获了庄河县境内六个伪警察署的枪械，武装了近千名新入伍的战士，壮大了先遣队。

1945年9月12日，庄河区民主联合政府宣告成立，解散了维持会，结束了日伪在庄河十四年的统治。为贯彻中央指示，以庄河为据点，分三路相继向东、北、西扩展，收复安东，力克岫岩县城。当拿下皮口、普兰店、瓦房店三镇后，组建了新金县民主政府。1945年11月邹大鹏同志调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12月，东北局机关拟撤出沈阳迁往本溪之前，他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身体虚弱又一次病倒。由潘汉年同志为他找到贺诚同志给予诊断，认定病情较重，不宜随机关转移，遂留下。经调治，病情渐有好转，即赶往本溪。不久又随机关迁去抚顺和梅河口。这时国内局势吃紧。国民党在美国的援助下向东北调兵遣将，大举进犯各大战略城镇。东北局机关的任务更加繁重，邹大鹏同志几乎每天都在彭真、林枫同志处工作，开会至深夜。国民党军侵占沈阳、长春后，党为了取得重要军事、政治情报，1946年2、3月份，邹大鹏同志亲自化装潜入长春市内，深入虎穴侦察到重要情报，为我军于1946年4月14日在周保中、林枫同志的指挥下，一举攻克长春，消灭驻军铁石部队的重大胜利，作出了贡献。但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迷心于内战，气焰十分嚣张，在美国的援助下，继续由海陆空向东北增兵。当敌军攻占山海关、锦州等要地，东北地区形势更趋紧张，国民党挑起了全面内战。为贯彻中央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党政军于1946年6月撤出长春。东北局机关，民主联军总部

均设于哈尔滨，继续指挥整个东北地区的军事活动。这时邹大鹏同志除担任社会部部长外，还兼任民主联军总部秘书长、东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交际处长等职。工作再忙他也抽时间找干部谈心做思想工作，深受党内外同志的拥戴。在东北地区工作过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如高崇民、陈先舟、车向忱等同志与他相处得亲密无间。每次开完会，他总要用自己的专车把他们送回家。1948年在筹划围攻长春的战役中，他出任长春市工委书记，10月19日长春解放又被委任为长春特别市市长，一年后又调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后任军委联络部部长和调中央某部工作。

邹大鹏同志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尤其注意团结党外同志。关心他人胜过自己。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对下属更是关心倍至，与他共过事的新老同志无不称道。如在西安事变立过战功，原东北军骑兵六师少将师长刘桂五将军，于1938年4月挺进东北时光荣殉职后，一直默默无闻。后来在邹大鹏与刘澜波的关怀与建议下，陕西省人民政府于1961年7月25日庄重地追认刘桂五将军为革命烈士。

邹大鹏同志是我党情报战线上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他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了一生。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输送干部上前方的一段历程

徐攻玉

解放战争时期，大连地区由于苏军军管，避免了国民党政府的“劫收”。从 1945 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就派各解放区的大批干部来大连发动和组织群众，迅速完成各级的建政工作。在中央、东北局和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制订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培养干部，支援解放战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充分利用大连地区的安定环境，举办各种学校和训练班，训练和造就了大批党、政、军、经、文各类人才，陆续输送到东北各地和南方新解放区的部队和地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争取全国的解放，建立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对这段历史我有过亲身的经历。

我是在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我军刚解放瓦房店时，由当时地下党员、我的中学老师张逸秋介绍，参加陈云涛（陈迈谦）率领的民主联军第五支队的。10 月中旬，接收了曾被恶霸势力统治的公安局后，我被任命为总务科副科长。（陈云涛在大连市政府为副市长，张逸秋在金县政府当秘书长。）

1946 年，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议，在全国挑起了内战。东北我军以“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撤离了铁路沿线和一些重要城镇。到秋冬时节，国民党军队侵占了辽南大部分地区，直抵石河苏军岗外。在这严峻的形势下，组织上为了培养干部，于 1947 年 2 月抽调我和干事张金铎、技术员冷传章三人，到大连警察学校学习。

大连警察学校，又名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是 1946 年冬与从安东（丹东）撤进来的学校合并成立的。它是当时大连市委培训党、政、军干部的重要教育基地。校长是边慎斋（边章五），教育长是陈美福和一位姓朱的同志。我们编在六队，是学政治的。课程有《新人生观》、《社会发展史》《唯物辩证法》和当前形势等科目。这个队共分八个班，每班十多人，全队约百人。学员大部分是从全市公安系统抽调的连排级干部，多数是解放后新参加工作的，也有一

部分是抗日老战士和安东来的尚未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我中学同学顾明善等人)。我们六队队长姓姬，政治指导员是左风波，都是营级的抗战干部。校址就在岭前小龙街，现军医学校那里，路南的多栋小楼是日本人遣返回国后空出来的，我们就一个班住一栋。

我们的学习生活很紧张，管理也较严格，家住金州的学员，星期天也不准回去。不过，我们的学习情绪还是蛮高的。学习的方式是讲授和讨论，既学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又联系革命工作实际，越学越觉得心明眼亮。特别是对当前形势的研究讨论，使大多数同志对解放全中国充满信心。同时感到我们所以能在这样安定的环境中学习，正是由于千千万万战友在前方英勇战斗换来的，所以，我们既珍惜这次学习的好时光，又想着战斗的前方。学习上，同学们不但踊跃发言，争出学习板报，发表学习心得，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还在学习空隙。练唱革命歌曲，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校园内真是歌声不断，意气风发，大家准备随时投入新的战斗。正当大家专心致志学习时，五月七日，学校突然召集我们全队开“上前方”动员会，由教育长代表学校宣布了东北局和大连市委的决定：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前方需要大量干部，充实各方面力量，因此，决定让六队提前结业，全部开赴前方。并且规定，由于时间紧迫和机密，大家都不要回家和到原单位辞行，会后立即整理行装，当晚出发。

上前方！这真是既诱人又吓人的字眼。当时，我们学习和工作都和前方有联系，也随时准备根据工作需要上前方。但这毕竟是我们革命征途上的一大转折，到真正要上前方时，又不能不有所震动。我们六队，不管是老战士还是新干部，大部分都在大连市内安了家，工作环境也一直是安定的。现在突然要抛家别亲开赴尚不知去向的前方去战斗，思想上怎能不涌起巨大的波澜，但能得到去前线的机会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回到宿舍，立即收拾行装，把不便携带的物品，装箱寄回家中，并写

信向亲人辞别。

傍晚时候，我们乘上卡车，直奔大连海港，登上了停靠在码头上的一艘苏联货船。船上除了我们全队人员，还有别的单位上前方人员，人数比我们还多，并且有带着吉普车的高级干部。因是货轮，客舱很少，我们都是住在货舱，用自己行李打地铺。只是在船上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六、七个人，不用说，他们开小差了。可见，战争对于一个人的考验是严格的。随同我们一起上前方的还有几位既是干部家属又是工作人员的女同志。

轮船在夜幕降临后起锚开航，岸上万家灯火，随着船行而缓缓远去。我们大家倚在甲板栏杆边，无不思绪起伏，叨念着：别了，大连，胜利后再见吧！夜幕中看不清巨轮驶向何方，但总的目标是定了一上前方。

直到夜深，大家才回到舱底躺下，听着波浪拍船，谁都没有睡沉。第二天，大家迎着朝阳到甲板上，看到海上日出的壮丽景象，心境也平静多了。晚上，船在一个港口停靠了。这时，我们发现码头上的人都讲朝鲜话，原来是到了北朝鲜的镇南浦港。出国了！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大家都是既困惑又兴奋。由于当时是秘密的军事行动，组织上不让我们下地自由活动。约近半夜，我们集体下船，紧接着登上停在码头上的火车货厢。火车很快开动，通过平壤，不停地向北奔驰，直到天又黑了，火车才停下，这才知道到了朝中边境的满浦镇。这里是鸭绿江东岸，隔江就是我国吉林省的辑安县（现集安县），是我军辽东部队在四保临江之后新解放的。在满浦镇下火车的只有我们队，原来其它单位人员已从别处转赴哈尔滨等前方去了。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来到鸭绿江边。江上只有两只小木船，我们分批乘渡，在桨橹吱嘎声中，从朝鲜又回到祖国的辑安城。

辑安城虽然才经战火，街市比较破败，气候也较大连冷些，但踏上自己的国土，大家心情都较安定。组织上让我们在兵站休息。三天后，领队的政治指导员左风波同志向我们正式宣布：上前方的目的地是长白山下的临江。现在要徒步行军三天，到六道江再乘火车前往临江城。大家一听到要徒步行军几百里路，为了顺利行军，忍痛把不太必要的物件抛弃了，把棉被里的棉花也掏出来

送给了驻地附近的老百姓，个个只背着简单的被单或毯子、牙具等轻便物品登程了。

我们从辑安动身，沿着已不通车的铁路和公路线向临江进军。刚走起来觉得挺轻快，一路歌声嘹亮，步伐整齐。我和其他两位同志是前哨，走在队伍前面，我们一边探寻着路径，一边快步前进。走了一天路，大家都有些累了，就在老岭山下一个村庄宿营。

第二天，我们三个人仍然做前哨。从村民中打听到要在老岭上过铁道隧洞，所以，我们提前一个多钟头先出发。走到老岭山下，果然发现眼前山高林密，一条铁路从山根进入一个大隧洞口，隧道内黑洞洞的，线路有爆破残迹。我们壮着胆子，点起预先准备的“松明子”（带树脂的松枝），小心地向隧洞中走去。在隧洞内走了约半个钟点，“松明子”已经燃尽，只得摸黑沿着铁道线继续向前走。这时，我们已处于大山腹中，洞内是阴冷的，黑得出奇，手放在鼻子上也看不见！又静得出奇，除了我们的脚步声和喘气声，没有任何一点其它的声响。我们担心会不会踏上敌人埋设的地雷，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而行动却是高度机警的。想不到突然“呼哧”一声，走在前面的张金铎同志倒下了。我们大吃一惊，以为是中了什么埋伏，细一听，他在呻吟。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掉到一个洞里摔的够呛。我们赶快摸过去，找到了铁路线中间的洞口，伸手把他拖上来。原来，这是隧洞中为躲避火车而设的“待避洞”，他走在上面看不见才掉进去的。幸好并没碰上什么，只是负了点轻伤。为了防备不测，我们更加小心地用木棍点地摸着洞壁前进。走了约一个多钟点，忽见前头有一个小光点，越走近，那光点越大，后来终于满洞光亮，可以看清脚下的道轨了。我们真像经黑夜迎来了黎明那样，朝着洞口跑了出来，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可是，使我们十分惊疑的是：遥望山下有一行队伍正朝我们走来，渐渐近了，细细辨认，却是我们队的人员。这把我们弄糊涂了。原

来老岭海拔过高，铁路隧道分两段：一段是从山根入洞，在山腹中转了个三百六十度，使铁路在原地升高到山腰；第二段是从山腰再入隧洞，才得以穿山而过，到岭的那一边。我们实际上是误进了第一段隧道，在隧洞中冤枉地转了一个多小时，只不过升高了几百米，仍在原来进洞口的上方。会合队伍后，我们又一起进入第二段隧洞。这段隧洞较短，但由于山高，温度较低，隧洞中又出水，虽是5月，洞中冰冻仍未化，黑暗中很不好走。在隧洞中摔倒的人不少，有个抱孩子的女同志，把孩子都摔到冰窟窿里了，真够艰苦的！穿出隧洞后，大家都累的很，好多人竟卧到岭坡草地上不愿起来了。这一天，下得大岭来，宿营在铁厂站附近。第三天，我们警惕地穿过敌占区通化市外围，由鸭园站转向东北，沿浑江前进。这时，大家都感到腰酸腿痛，迈步艰难，出现了一些掉队的，行军速度慢下来了。但为了如期到达目的地，大家还是互相照应着，在山野江边行进。直走到天黑，先后来到了通火车的六道江站。在这里登上火车，火车头是烧水材的，车速很慢，但总比步行舒适多了。火车走了一宿，天亮时到了终点站——临江城。

临江城，这就是1946年冬国民党军猖狂进攻时，我辽东和东满地区仅剩下的长白山附近四县的一个未被敌人侵占的县城，也是我军四保临江战役用许多烈士的鲜血和生命保存下来的一座名城！那时，她是中共中央东北局辽东分局和我军辽东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有中央领导陈云同志坐镇在这里。我们来到临江，真像是儿女回到母亲身边那样亲切。这个城后倚长白山余脉，前临中朝界河——鸭绿江。城市不大，街上很多军人往来，备战气氛很浓。组织上把我们安排在城东郊一处房子里，分局组织部负责人特来看望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同志。我们一面继续学习，一面等待分配工作。

在临江休整了一段时间，便开始分配具体工作。多数人分配在战斗部队里，我和丁大中、王杰、马晓风等十多名同志，却在六月中旬，先后被分配到辽东军区司令部联络处，即情报处做敌后情报工作。这对我们来说是想不到的事。我们在思想上有上前线杀敌和献身的准备。却不愿远离领导，隐姓埋名到敌人横行的敌后去孤军作战。不过，这是革命需要。怎能讲价钱呢！在和柳峰

科长谈话后，就回队辞别了学友。

到七月，我军又收复了通化市，中共辽东分局和辽东军区司令部遂迁到那里，我们也就一起到了通化市。在这里又集中一段时间学习政治和情报业务，然后就分散开。我是八月接受到敌后寻找落脚点和搜集敌人军政活动动向等具体情报任务，而去沈阳、锦州、鞍山等敌后一带活动的。经过了许多想象不到的艰险，先后完成了这段解放战争中的特殊任务。

后来知道：曾和我在金县公安局共事，一起到警校学习，又同上前方的张金铎同志，分配到安东兵站，后来转地方工作；而冷传章同志则分配在四纵队，不久光荣牺牲，令人痛惜！其他同志大部分在东北各地转战全国，不是成为革命骨干，就是英勇牺牲在战斗岗位上。

时间过得真快，回忆解放初期，大连动员的战士和培养的干部，成批上前方的豪迈情景，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当时英姿勃勃、意气风发的青年，现在健在的均已年过花甲成为革命老人了。不过，当年响应党的号召，投身革命上前方的激昂场面，是叫人永远不能忘记，也不该忘怀的啊！

(作者是原大连金光化工厂厂长，党委副书记，现已离休)

李长年被俘后二三事

郭兆林口述 长海县政协整理

我和李长年是在朝鲜战争期间釜山战俘收容所里相识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朝鲜人民军就解放了朝鲜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人口，李承皖军队以及参战的美国陆军节节败退。于是美国纠集十五个国家，打着联合国军旗号，于9月15日，由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在仁川港大规模登陆。这时，朝鲜人民军大部被切断在朝鲜南部，损失严重，处在被南北夹击的境地。很快，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美国空军不断侵犯我国领空，轰炸我边境城镇，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毛泽东主席发布了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命令。10月25日，新中国的优秀儿女，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途，赴朝参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经过四次战役，将美国和李承皖军队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到三八线。可是，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而敌我装备上的差距却日益悬殊，加上我空军和海军初创，美军完全控制了制空权和制海权。1951年5月，打第五次战役时我军损失很大，分散在异国荒山野岭上的志愿军干部战士，受伤的不能行动了，没受伤的也处于疲劳和饥饿的境地，致使他们无法抵御敌人的大搜捕。几天以后，美军的囚牢里一下子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志愿军战俘。我就是在这最后一次战役中被俘的。

几经周折，1951年8月份，我被转到釜山战俘营第六收容所。在那里，我认识了李长年，并且得知被关押的不仅仅有战场上被俘的志愿军，而且还有被无辜抓来的祖国的渔民同胞。通过狱中与敌人的斗争，李长年表现得勇敢出色，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他是怎样被俘的

1951年5月27日，天下着大雨，风急浪高。李长年等九名渔民驾驶着木帆船在海洋岛东南海域捕鱼时，突然发现一艘军舰朝他们驶来。这时，渔民们赶紧撑满篷帆，向海洋岛方向猛驶。敌舰开足马力追赶，木帆船终于被追上了。敌舰靠拢渔船，几个美国兵跨了上去，强行将船上九名渔民全部押上敌舰，并拖着木帆船，向朝鲜南部驶去。舰舱里，哭的叫的响成了一团。见此情景，李长年冷静地说：“抓去也是死，不如想法逃。”美国兵封锁严密，没有办法逃出去。李长年想起舰艇上好象装备着水雷，便在脏乱的舱里找了块铁器，就喊叫敌人。比划着要解手的样子，乘机溜到舰艇尾部甲板上，拚命地撬水雷。美国兵听到响声，向他开枪，随后冲上来几人。将李长年拖走，用绳子捆绑在一个大铁柱子上。九名无辜的渔民，被押到南朝鲜的白翎岛。到了陆地，敌人先是把他们毒打一顿，然后审问一些有关旅顺和大连的情况。两天后，他们被转押到仁川，后又从仁川用汽车押到釜山战俘营第十收容所。九名渔民被挨个提审，敌人用了许多花招和刑罚逼供，李长年始终不予回答。敌人无可奈何，最后将李长年单独带走，押到了第四收容所。

敌人的花招不好使

到第四收容所后，敌人先是用软的手段。一次，美国特务用一辆吉普车把李长年拉到一个山坡上，他们很客气地把他领到一个带有围墙的大院里，门口挂着一个刻有“亚洲商司”的大牌子。李长年首先被带去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拿出一些水果、罐头和香烟招待。李长年吃饱之后，三个会说中国话的美

国特务带他到了另外一间屋。屋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服装和各种各样的证件，还有飞机、大炮和军舰的模型。这时，敌人拿出红军的军衔问李长年认不认识，带这种军衔的人有多少？指着各种模型问是否在大连和旅顺见到过。李长年想，这里是一个打着商业旗号，专门从事特务活动的地方，便绕道跟敌人磨嘴。他拿起一个潜水艇模型说：“我在大连看见日本人有这样的东西，日本投降那年被飞机炸沉了，以后再没见捞上来。”特务们本想从他嘴里得到点什么，听了这话，哭笑不得地又拿来手表，皮鞋、西装和许多钱说：“只要肯把情况说出来，愿意到美国去也行，到台湾或留在南朝鲜都可以，如果想打鱼，可以送你一条机器船。”李长年镇静地装着糊涂。特务们没有得到一点情报，便抱最后一线希望，把李长年带到海边上，指着几条木壳船问：“中国的船是不是这样的？”李长年一下子明白了敌人的用意，机灵地说：“我们中国船两边都写着‘抗美援朝’四个大字（实际没有）。”敌人听后不久就将那些木壳船写上了“抗美援朝”。李长年还捉弄着敌人，告诉他们说：“你们那双手太嫩了，必须在海水里泡，然后在石头上磨。”敌人当真照他说的办了。

在四所住了半个月，每天都被强迫着去劳动，过重的劳务加上吃不饱，许多难友染上了重病。有一天，听说敌人要给检查身体，难友们告诉他，检查身体就是要抽骨髓、抽血，给美军伤兵用。夜里，李长年从窗子钻进厨房，拿起酱油瓶大口大口地喝。回到床上后，不能安睡，连咳带喘，黑痰吐了满床满地。第二天，敌人看他染上了肺病，也没有检查身体，便把他赶出了四所，送到了第六收容所。

第六收容所关押的大部分是志愿军被俘的伤病员和患传染病的重病号。在这里，每天都有警察和宪兵手持木棒强迫大家去听耶稣教传道。有一天，一个宪兵来拉李长年去听教，说什么，“当俘虏是上帝的意志，互相残杀犯了罪，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救。”李长年气愤地说：“什么狗娘养的教，我不信那一套，上帝要是能把石头变成馒头，让我们大家吃得饱，我就去，要是不能，我不如睡觉！”难友们听了哄堂大笑。进来的宪兵一看形势不妙，狼狈地退出门外。在传教士的幌子下，敌人不敢明斗，暗地里却注意了李长年的行动。有

一次，李长年撕下耶稣教的《圣经》擦大便，结果被特务看见了，说他污辱了神圣的上帝，把他拉去毒打了一顿。李长年被打得浑身是伤，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他的行动，难友们看在眼里，都很敬佩，大家轮流给他送水送饭，给他擦伤。

参加“共产主义团结会”

一天傍晚，我凑到李长年身边探问伤势。他很吃力地睁开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我。我对他说：“你是好样的，跟敌人斗，就应该有骨气，不能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不能在敌人面前屈服。”李长年有些激动，探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说：“我跟你一样，也是打渔的，以后你就叫我李老汉。”从那以后，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一起谈身世、唠家常，给他讲一些对敌斗争的故事。平时，我让傅万生同志注意观察他，帮助他。经过我们观察和考验，认为他的确是个坚强的人。我串联了六所的“共产主义团结会”会员，研究了一下，决定吸收李长年同志入会。我们搞了个简单的宣誓仪式。誓词大概是：我志愿做一个光荣的“共产主义团结会”会员，不怕敌人迫害，不怕流血牺牲，为党和毛主席争光，为祖国人民立功，不管遇到任何情况，决不叛变。李长年宣誓完后，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老李，这回可算有组织啦，今后我就听你的，跟着你们干。”我对他说：“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终有一天会战胜敌人，胜利返回祖国的。”

他处处走在斗争的前面

李长年加入“共产主义团结会”后精神上有了寄托，更加勇敢地进行对敌

斗争。无沦是组织上有什么事情，他都争着去干。开会的时候，他主动在门口监视敌人；晚上，他常常冒着危险，去发传单、送情报；所里每来一名新同志，他都要去看一看，鼓励他们与敌斗争的勇气；他还常常给大家送水送饭。有一天，一个姓丁的中国难友，因为捅烟筒不知怎么得罪了警察，结果被打倒在地不能动弹。李长年看到后，操起床头的木棒，串联几个难友一起把警察按倒在地，狠狠地打了一顿，并警告他说：“今后你们小心点，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1952年2月，美李集团同蒋帮特务分子，为了达到扣留和屠杀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目的，策划了一个在战俘身上刻字的阴谋。同年四月开始，他们又在志愿军战俘队伍里搞了个“坚决回国”和“不愿回国”的大甄别。“共产主义团结会”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全体难友与敌人展开反刻字反甄别的斗争，组织大家打着红旗，高唱国歌进行抗议，提出反饥饿、反迫害、反刻字、反甄别的斗争口号。在这场斗争中，李长年始终站在最前面。他带头绝食示威，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将红旗插上房顶，多次到铁丝网边去进行秘密联络。在反抗的队伍中。他站在最前列领着大家高呼口号。为了声援板门店停战谈判，争取全体被俘人员早日回国，“共产主义团结会”和朝鲜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计划在“八一”建军节这天举行越营大暴动。中朝两国被俘人员秘密组成联合指挥部领导这次暴动。李长年主动要求担任联络员工作。但由于走漏了消息，敌人事先加强了警戒，枪支弹药没有运进来。因此，联合指挥部临时决定改变计划，与敌人公开斗争。1952年8月15日早晨，中朝两国难友用石头、木棒与全副武装的美李看守特务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打死了一些敌人，包围了大队部。敌人开来坦克，拉来大炮进行镇压，中朝难友们伤亡很大，暴动没有取得胜利。但是这场暴动却震撼了敌人。

挺身顶替“李老汉”

暴动后的第二天，敌人开始大逮捕，很多难友被抓进监狱。敌人发觉集中营里有秘密组织，也探听到领导人名字叫“李老汉”，便开始查抓此人。由于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斗争后，集中营里比较混乱，敌人没有掌握各所的准确人数和姓名。我先后以“李炯”和“李老汉”的化名，一直留在六所领导和组织斗争。暴动后的第二天傍晚，十几名警察、宪兵和特务闯进第六收容所，他们走过来走过去，逐个地察颜观色，没有搞准究竟谁是“李老汉”，于是高声地喊叫：“谁叫‘李老汉’，快站出来！”当时没有一个人吭声。李长年这时坐在地铺上大口大口地吸烟。敌人又声嘶力竭地喊：“‘李老汉’，站出来！”敌人凶恶的目光一一扫视着难友的脸。李长年沉不住气了，他磕尽了烟袋灰，站了出来：“我姓李，我叫‘李老汉’，走！”敌人如获至宝，把李长年从上到下看个遍，两个特务上前将李长年带走。随后敌人又将傅万生等三人抓走。走到门口，全体难友一齐站起来，高声嘱咐：“不要怕，要有骨气！”

李长年被抓走了。敌人开始对他很客气。一天，他被带到一间漂亮的小客厅，里面有一个美国军人和一个黄发女郎，他们一同站起来，用熟练的中国话说：“李先生，请坐，请坐。”随后又拿来一些糖果叫李长年吃。李长年早已习惯了敌人的软硬两手，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有什么话快说，不必来这一套。”美国军官笑着说：“只要你把你们组织名单交出来，然后发表一篇演说，保证今后不再闹事，你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李长年坚定地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懂什么叫演说。”敌人问道：“那你为什么要组织暴动？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李长年反驳说：“你们随便抓人，虐待俘虏，这才是违法。大家吃不饱受迫害，就应该反抗。”美国军官无言以对。稍停了一会，一按电铃，窜出两个警察，杀气腾腾地把李长年给架走了。在刑讯室里，李长年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刑具。他先被吊在一个梁子上，三个凶手轮流用皮鞭、铁条和竹板抽打拷问，李长年被打得昏死过去。敌人在他头上泼了一盆凉

水，他才醒了过来，咬紧牙关，还是只字不吐。于是，敌人又是一阵毒打。李长年被打得死去活来，全口牙都被打掉。第二天，敌人继续审讯，逼他交出组织名单，叫他在保证书上签字，李长年不予理睬。敌人没办法，又使用了残酷的电刑，仍无济于事，一无所获。李长年以顽强的意志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敌人最后又将他打入了水牢。李长年在齐胸深的水牢里，坐无法坐，靠墙钉子扎，只能靠仰卧在水面上休息。几天后，敌人又把他关进一个铁丝网小笼子里。笼里站着不能直腰，躺着不能伸腿，铁网刺朝里，累了稍稍依偎就被扎得满身是血，只能终日缩成一团。据说，这里夏天能把人晒得头昏眼花，冬天能把人冻得浑身僵硬，即使能活着从铁笼里出来，也都是遍体鳞伤，十几天不能动弹，只有一口气。有的出来后，腰腿和手长期伸不直，终身成为残废。

李长年等四名同志被抓走后，“共产主义团结会”的全体成员，专门开会研究营救办法，发动全体难友写抗议书，闹绝食，组织示威，要求释放“李老汉”。在难友们的压力下，加之敌人发现抓错了人，所以只好把李长年等四人放回了收容所。

一马当先除叛徒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为了破坏“共产主义团结会”组织，抓到真正的“李老汉”，敌人派遣一批特务打扮成战俘模样，混进战俘营进行侦察。可是，都被我们识破哄出营外。尽管这样。敌人还是威胁利诱了一些动摇变节分子。在斗争的艰苦时刻，内部出现了叛徒，严重地威胁着组织的安全。六所有个叫黄海泉的人，是原国民党九十五军的一个上士，解放战争中被我军俘虏，后来又进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在朝鲜战场上被敌人俘虏后，一直表现很坏，公开地进行反动宣传。当他掌握到“共产主义团结会”组织和我的身份后，几次想逃跑投敌，都被我们截住。经过多次教育，他死不回头，反而大骂难友，猖狂诬蔑我们的党，煽动一些人和他一起去台湾。于是，经组织研究，决定除掉

这个民族的败类。一天傍晚，我把李长年和傅万生叫到身边，一起研究除奸办法。李长年很有信心地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俩，你放心，我们有办法。”他俩合计了一下便回去睡觉。大约深夜两点多钟，黄海泉起来又想逃跑，李长年和傅万生早已等在门外，用绳子勒死了这个可耻的叛徒。然后，他们将他吊在房梁上。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报告了美国当局并提出了抗议，说：“中国有个俘虏，因忍受不了饥饿和迫害，昨晚在太平房里上吊自尽了。“要求美国当局必须给予很好的安葬。警察赶来见人尸僵硬，只好派来一辆汽车把尸体拉出营外埋葬。

反甄别斗争后，我们先后被转到第五所。在五所里，有个叫周东亚的人，一天到晚发牢骚，诬蔑党的政策，反对抗美援朝，公开叫喊拥护蒋介石，要求去台湾，几次要逃走投敌未逞。李长年得知后，主动要求组织上批准干掉这个叛徒。经过“共产主义团结会”研究批准，由李长年和陶均善等人执行。又是一个深夜里，李长年巧妙干净地干掉了叛徒，并且当夜就派人通知美方管理人员，说有个重病号叫他们赶快派救护车。当车到后，几个人就把尸体扔进车里，被敌人拉走了。第二天，我们一早就派代表去与美方管理人员交涉，让他们把拉去的重病号送回来治疗。敌人为难了，只好说：“这个人病太重，没等拉到医院就死了。”给敌人搞得狼狈不堪。

还有，一个曾在志愿军里当过排长的被俘人员，投敌逃跑到铁丝网跟前时，被李长年发现，疾步拦住，厮打一阵后，李长年用六六粉将其眼睛弄瞎，带回了所。以后，我们把这个人带回了国。

他是难友的榜样

李长年不是从战场上被俘入狱，而是一个普通的打渔人被无辜地抓进战俘营的。他吃尽了战俘营的苦头，受到了各种刑罚的折磨。他的坚强勇敢和机智斗争，使釜山集中营里的难友无不敬佩。在其它各所里也有不少人知道六所有个长海县的渔民，无辜被抓而又在集中营里表现得很勇敢。有的所里“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者，还经常用李长年的事迹去教育被俘人员，鼓舞他们的斗争意志。在集中营里，李长年先后荣立一等功二次，三等功一次。“共产主义团结会”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向李长年学习。

回国前的斗争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信金日成与彭德怀，建议双方交换伤病战俘。这已证明美方走投无路，不得不恢复板门店和谈会晤。3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朝鲜停战问题发表长声明，其中说到“应立即遣返在彼此监禁下愿意回国的战俘。”四月初，釜山战俘营秘密接到济州岛传来的这一消息。接着，由我和王化英、陈景华三同志负责，秘密成立了“回国支队先遣队”。李长年是先遣队队员之一。到了规定的日期，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交换的场地是在板门店的一块空地上，中间用石灰粉划了一道白线，白线两边站着交战双方的警卫人员和救护车。各国记者们端着照相机，争抢镜头。当我们到了交换地时，立即撑起手中的五星红旗，强劲地挥舞。李长年和难友们一起走到各国记者面前，脱下临走时发给的衣服，一齐向敌人扔去，穿着短裤，露出一条条、一道道、隆起的、凹下的伤疤，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

后记

李长年是长海县海洋乡渔民。1906年2月生。解放前，在海洋岛曾流传着

李长年盗取日本人和有钱人的财物，为老百姓打抱不平的故事。解放后，他一直从事海上打渔生产。1951年5月在海上被侵朝美国海军无故抓进战俘营。1953年首批遣返回国。回国当时曾在东北军区第二十六陆军医院一分院疗养，1954年2月回海洋岛，继续从事海上打渔生产和当搬运工人。1958年5月因病不幸去世。1965年经中共长海县委和中共长海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委员会批准，追认李长年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整理者按：本文口述者郭兆林同志，是当时釜山集中营“共产主义团结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被俘前是我志愿军一〇八师司令部炮兵主任。在朝鲜第五次战役中被俘。他同李长年在对敌斗争中相识，并一起被遣返回国。现为本溪市物资局离休干部。

反“升科”斗争与宋凤桥

马 群

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后，国家政权落于地方割据的军阀之手，国虽以“民”称，民却仍受重压，其中以农民所受之压榨尤为惨重。民国初年的奉天省，农村破产，农民生活每况愈下，以至许多农民无以为生计，而官府所定的捐、税，名目频添，数额倍增，其中经过“打地”（丈量地亩）从而进行“升科”（经过丈量，土地亩数比前次丈量面积有所增加，“钱粮”一田亩税便随之增加），这是官府盘剥农民惯用的手段之一。每次“打地”便给农民带来一次灾难，“打地”一打再打，“升科”一升再升，农民负担年重一年，生活日苦一日。

民国九年(1920年)，奉天省派员由复县官员协同至复县东北部今新金县双塔镇元兴、岗子店一带“打地”。官吏们受到财主、乡绅宴请，接受他们的贿赂，到地里走马观花地一看，便宣布其土地亩数与前次丈量亩数相同，如此自然勿须“升科”了。而一般民众无钱行贿“打地”官员派人到地里随意一“丈量”，便凭空捏造说土地面积比前次丈量多出若干，于是便要“升科”。受欺的民众有苦难言，有冤无处诉，最后忍无可忍，在农民车福功、孙护等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升科”斗争，

参加这次斗争的人数共有一两千名。他们将五六名“打地”的官员全部捉起来上了绑绳，经研究决定，将其丢进碧流河中。在向碧流河方向进发的途中，闻讯赶来的农民纷纷加入队伍，声势之大，从未有过。这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惯用各种卑劣手段欺压勒索民众而中饱私囊的虎狼官吏，这时个个吓得面无人色，丑态毕露，有的哀求饶恕，有的放赖不走，其中有一名要水喝，愤怒的民众骂道：“半途上哪里有水给你们喝？到碧流河管你们喝个够就是了！”饱受他们欺压的农民钱文喜问他们说：“你们还认得我吗？我就是被你们打骂勒索的钱文喜啊！”当人群走出距岗子店约二十华里的后磨盘山（在

今新金县墨盘乡)时,区官(按当时其地属复县四区辖)杨某率部下持枪赶到,阻住民众的去路。他慑于数千名民众的威力,不敢施用武力,也不敢严词厉色,而是用极其奸狡的手段将民众骗了回去,并于当夜即将“打地”的官吏偷偷地放走。

起而斗争的民众,为了将“升科”彻底反掉,也预料到官府对此次行动必定要进行报复,于是便磋商以后的对策。

时,栗寺沟(今属新金县双塔镇)有一位地方闻人,姓宋名凤侨,字浦仙,幼读私塾,后曾入复州自治研究所学习,清末时曾为复州议会议员,为人仗义执言。足智多谋,在民众中颇有声望。时正家居无事,民众便与之研讨反“升科”斗争事宜。清末时,复州境“铁道迤东突起黑会,土人以集众结党抵抗官府”(《复县志略》),这是宋风桥所深悉的,因而主张组织黑会。此意深合民众意愿,于是共同拥戴宋风桥为黑会的会首,宋风桥也当仁不让,欣然允诺。黑会成立后,强迫当地财主献枪枝弹药。一般富户们因常受“打地”官员勒索,也愿帮助黑会反掉“升科”而量力捐献。不久,黑会共得枪三十余枝,其中有抬枪、洋板枪、洋炮等。宋即经常操练会众,准备在官府诉诸武力时便以武力对抗。复县知事吕继纯曾派人谈判,谋图通过谈判使宋风桥解散黑会。而宋风桥却果断地宣称:“‘打地’、‘升科’之事一日不废,黑会一日不散。”接着他还亲自领导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以示斗争到底的决心。

宋风桥虽代表民众意志,敢于领导民众同官府较量。但却缺乏政治警觉,轻信了官府。在信誓旦旦的谎言掩盖下,以解散黑会便废除“升科”为条件,双方达成了协议。黑会组织自此便宣告解散,宋风桥也误认为反“升科”斗争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回乡隐居。可是官府却并不就此罢休。为了进行报复,复县知事于当年10月便派人到处搜捕宋风桥。宋风桥获悉这一消息,方知自己

上当受骗，非常气愤，于是连夜又组织黑会，准备与官府再次斗争。但，仓促间重新组织起来的黑会，人数不多，力量单薄，于李家卧龙（在今新金县城子坦镇境内）一带，与官府派来进剿之军警进行一次战斗，结果失败。宋凤桥逃至当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的关东州貔子窝（今新金县皮口镇）。1921年，由于复县知事的要求，日本统治当局将宋凤桥逮捕引渡至复县。审讯时，宋凤桥慷慨陈词，以确凿之事实，历数“打地”、“升科”为民众之大害，并揭露官府过去之欺诈行径。吕继纯虽无言以对，但仍将其定为死刑。未久，宋凤桥被枪杀于复州城外之永丰寺东。

一场骇人听闻的惨案

花儿山乡文化站稿

德臣 开仁整理

日本帝国主义行将倒台，祖国山河即将光复的前夕，花儿山乡西部的拉树房村、南王村、西北山村一带百姓，遭到一场令人发指的搜捕和摧残。受嫌疑和惨遭酷刑者三十余人，被活活打死的两人，被屈判绞死的一人，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目不忍睹。

事情发生在 1944 年春节，农历正月初二。地处伪“满洲国”和“关东州”租界交境的姜屯，当时设有伪“满洲国”大连海关瓦房店分关姜屯分卡。卡内有一个雇员，名字叫田修民，人们都叫他“田海关”。正月初二那天，有外来拉树房的人，发现他被砸死在鹰野果树岚子的北沟里。刘长仙得知后，立即向伪快马厂会警察派出所报告。于是，一场灾难，随之降临到人们的头上。

日伪普兰店警察署、快马厂派出所的刑事、警察、巡捕、联络员（腿子）等，倾巢出动，大肆搜捕、传讯所谓嫌疑分子。刹时间，黑云压城，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凡是当天去过果树岚子的人，全是重点“嫌疑犯”，其中包括小买小卖或串亲送礼的人。拉树房屯年仅二十三岁的刘长升，因当天上午去买过苹果，即被抓去，连续酷刑拷打。他受罪不过，遂于正月初九招供，并被带领回家取证物——血衣。因他是屈打成招的，不是事实，所以全家里外都被抄翻，也未找到，于是又硬说是被其兄刘长全和其妻把血衣藏起来了，就连同不满周岁的孩子一起被押到大衙门刑讯拷问。刘长全被绑到刑凳子上，皮鞭抽，凉水灌，他惨叫难忍，就借上厕所大便，磨蹭抵抗。日本人要给他上电刑，他不顾一切，死死搂着日本刑事大龟的

脖子不放，要和大龟同归于尽。大龟无奈，只得罢休。正月十三日下午，刘长全亲眼看见其弟刘长升全身瘫软，被抬回牢房，不一会听到有人喊，他死了。日本刑事见事情败露，悄悄地把刘长全及其弟媳和小侄放回家去，并告诉说，刘长升已送医院治疗(实则已被打死)。可是当天傍晚又接到通知，让去普兰店领尸。当尸体抬到家时，见到刘长升全身已被打烂，手腕上勒有深深的血印，满脸全是烧伤。真是惨不忍睹。死者的妻子在拘留期间，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不时地被拷问，眼瞅着来回过堂被严刑拷打的丈夫，她是怎样一分一秒痛苦地度过的，可想而知了。

同刘长全兄弟一样惨遭拘留、拷打的，还有拉树房的孙连群、王滋福等人。孙连群当天被抓到果树岚子现场，狗腿子把他逼急了，便倔强地顶撞说：“就是你们打死的！”狗腿子恼羞成怒，孙被打得更凶，胶皮带蘸凉水抽，压杠子，棉衣被打得粉碎。王滋福竟被打得连用烟火烧身都没有知觉，直到正月十三日刘长升被打死后，才放出来。

姜屯的牛家三兄弟，牛克德、牛克玉和牛克功，在拘留所里蹲了一个多月暗牢，屋子里一团漆黑，潮湿的水泥地，十冬腊月无铺无盖，寒风刺骨。一顿饭只给不足二两的苞米面饼子，一块咸萝卜和一碗凉水。牛克德是挑八股绳的，因卖点苹果遭了嫌，被绑在凳子上拷打、灌凉水。灌满了肚子再压杠子往外挤，还用整扎香火烧其腋下。真是灭绝人性，残酷至极。

丁屯的丁福玉、王屯的冯日新、拉树房的邵成玉父子，以及从复县境内抓来的二十多人，均惨遭酷刑。开始能听到人们的惨叫声，继而听到的是呻吟声，后来只听到刑具和敌人的威逼嚎叫声，被刑人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个个鼻口窜血，死去活来，可谓残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田海关到底是被谁砸死的？从正月初二开起，虽经十几天来的刑讯逼供，但始终没有弄个清楚。后来由于苗福田的密告，又屈死了几条人命。

据传，柞树派子的苗福田和刘成海家是邻居。苗刘两家不和。苗为人奸诈，狠毒。见此案株连这么多人，感到有机可乘，于是为泄私愤，便向普兰店警察署告密，说田海关是刘家兄弟害死的。

苗向警察署告密后，还让其十三四岁的儿子带路，领着刑事范公一到鞍山新盛铁工厂，把正在那里做工的刘成全抓回。同时又拘捕了老二刘成江、老四刘成祥。老大刘成海闻讯逃走，幸未落网。刘成江被捕后，押了九天放回，以后音信不知；而老三、老四则惨遭毒打。最后老四刘成祥被活活打死；老三刘成全被判死罪，转送旅顺大狱下了死牢，并于 1945 年 5 月，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倒台前，瘐死狱中（有的说是被日寇绞死的）。这真是一场骇入听闻的惨案。解放后，苗福田因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在土改时伏法，是罪有应得的。

（新金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击毙日寇安住

王世安

在日本殖民主义者侵占“关东州”的黑暗岁月里，日寇为了强化其法西斯统治，设立了庞大的统治机构，单是警察机构就有警察署、警察支署和警察官吏派出所，还有多如牛毛的宪兵、刑事、巡捕、狗腿子，监视中国人的“不轨”行功。他们动辄就给无辜的人民群众扣上“马贼”、“红胡子”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严刑拷打。什么灌凉水、上电刑、用火烤、夹笔杆等酷刑应有尽有。但是，压迫愈重，反抗愈烈。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旅大，施行法西斯统治的第一天起，旅大地区的人民群众就开始与之斗争，而且斗争的怒火越烧越旺。

1929年2月14日，靠镇压中朝人民起家的关东厅地方法院院长安住时太郎（曾任日本统治朝鲜总督府判事），在审理孙云德案件时，率领审判官川畑源一郎和长岛卯十郎、检查官池内真清、书记荒木格雄、翻译大崎茂马、巡查神谷利平及警卫等一行十余人，去貔子窝管辖内的碧流河乡塔寺屯进行现场勘查。

抗日群众华耀堂、孙德忠、孙永芳等获得消息后，立即在隋德长家集合，商量如何严惩这群早为人民恨之入骨的疯狗，拔掉安住这个狗牙。于是就在隋家院里布下了天罗地网。部署刚刚停当，安住疾步在前，神谷紧跟于后，伴随着一群恶狗，大摇大摆地走进隋家大院。砰，一声枪响，从西厢房飞出一颗子弹，安住一声怪叫，扑倒在地，脑浆外流，当场毙命。神谷从腰间拔出手枪，刚要回击，砰砰，又是两枪，子弹射穿了神谷的右肘，手枪掉落在地。鬼子们嚎叫着逃出大门，连滚带爬地钻进附近的一所破庙里。警卫们只是举枪乱射，不敢露头。

华耀堂、孙德忠、孙永芳等抗日群众，趁敌人混乱之际，机灵地撤离大院。他们只用去三颗子弹，十几分钟时间便完成了惩罚安住的计划。然后朝复

县方向走去，迎接新的战斗。

当鬼子们重整队伍，胆战心惊地摸进大院时，大院却静悄悄地等待着他们来收尸。鬼子们见丧了头头，再也顾不上勘察现场，就如惊弓之鸟，惶惶地逃回大连了。

群众听了这一喜讯，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此后，貔子窝警察支署派出大批警官来到碧流河乡，严密监视这个与庄河、复县接境的“匪巢”地区。可是，华耀堂等仍活跃在碧流河中游一带，杀富济贫，抗击日寇，所到之处，群众人心大快，敌人却闻风丧胆。

(新金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旅顺监狱回顾

(日本) 古贺初一

徐宗志译 王士震校

译者的话：从 1894 年甲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在历次侵略战争中，对我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旅顺白玉山北麓的那座“旅顺监狱”，就是历史的见证之一。

这篇回顾文章，是我当年旅顺医专日籍同学古贺初一先生写的。他从 1944 年 5 月到 1945 年 7 月，在旅顺监狱任医官一年零三个月。四十多年过去了，他现在在日本松山市牧病院工作，是一位精神病科医师。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我们之间有书信来往。1984 年，旧《官立旅顺医专同窗会志》第 20 号会志里，有古贺先生撰写的这篇文章。他将亲历、亲见之事加以实录，对狱中的恐怖、暴虐和残酷，均有一定程度的暴露。但是，由于作者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对文内某些部分的描述，不能苟同，不过为了不忘记过去的历史，振兴中华，实现四化；也为了中日两国人民，能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世代友好相处，特将该文按原意译出，以供治史和教学工作者参考。

毕业之前，天气乍暖还寒。校方已经接见过我们全体同期同学，征求了本人的就职志愿。但结果，我竟中了第三志愿那个不走运的签，分配到旅顺监狱工作。起初满以为，问田校长的夫人，是我的老乡，因此在毕业分配问题上，我不至于这么倒霉。现在，校方既已作出决定，也就万事休矣，无可奈何了。

四月里，我回（日本）家乡一次，直到月末，我才去赴任。由于当时监狱里，被囚禁的中国人很多，所以同我一起分配去的，还有已故的张国才同学。医专的同学可能有参观过旅顺监狱的吧，那座大墙里面，当时囚禁约有一千五百多名囚犯。我到职之后，狱方口头上说要任命为技师，可这完全是一种敷衍，过后在委任书上写的，只是个医务官。对此，我虽发过牢骚，但也无济

于事。但是住上了唯一的一处部长级的官邸，其环境之幽雅，房间之宽敞，倒使人稍微得到了一点安慰。

这个监狱，长期以来没有专职医师。狱方希望能从我校毕业生中选拔人才，担当此任。有位姓小岛的医师，是熊本医大毕业的。他在大连分狱当医生，又到旅顺监狱出诊，好像是身兼两狱之职。这次我们来了，才填补了空缺，狱方自然感到莫大的满足，不过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优厚待遇。记得当时狱中有总务、保安、供应、财务、教务等课。监狱长是东北(北海道)口音的日高氏，他在执行最重要的保安工作时，经常耸肩瞪眼。我们两人到任后，才正式成立医务课。由于我们初做这项工作，全然不得要领，如堕五里雾中。后来经与张国才同学共同探索，才逐渐熟悉，走上了轨道。当时的监狱里还是和旧时代一样，犯人穿的都是上下一抹红的囚衣，只有被认为表现比较好的，才给穿蓝衣青服。在临近战争末期(1945年)的时候。监狱里也更加法西斯化。对上司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什么人权、自由，全被剥夺了，囚犯们只有默默地去干强制性劳动。而吃的，由于粮食不足，只能得到少量麦子饭(大麦做的)或栗子饭(橡子面做的)，饭里又只加一点少许盐水或蔬菜等。因此被囚者个个营养不良身体消瘦，染上了肺结核等多种疾病。药品和医疗器械都很简陋、奇缺。重病囚犯抬到医务室后，也只在形式上作了点诊疗，此外别无他法。遇有患龋齿的，因麻药很缺，就不作麻醉，即用钳子或钉起子硬拔。对患痔瘕的，也只稍为作点周围麻醉后，便就强拉缝合。医务课附设六七个病房，只有二十几张床位，经常是超满员的。这些危重病号，就在病房里呻吟着，即使熬过了今天，而明天是死是活又怎么知道呢。对这些病房，虽都做了认真的查房，但个个都是重症，实在无计可施。特别是遇着有些病号缠住我苦诉不休时，也确实使人产生怜悯之情。在临近死期的时候，只有男性下属人员帮助料理一下，由于管理不周，卫生很差，弄得脏乱不堪，再加上尸臭味，因

此成群的苍蝇，顺着铁窗缝隙钻进来。同样敏感的乌鸦，也竟然成群落在病房的屋顶上。

囚犯中，日本人约占十分之一，其余多是中国人。他们很多是无辜的，是冤枉地以莫须有罪名被强行抓进监狱的。在我任职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曾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件，自杀者有之，杀人者有之。如有一名囚犯，因不堪忍受长年累月的监狱生活，就跳入狱内的一口圆形大井，自杀而亡。还有一个日本犯人，在白天用锐利的剪子，刺杀了在后门值勤的朝鲜人看守，抢得钥匙，夺门而出，逃入山中。引起狱中一片惊慌忙乱。后来，警察、消防团等一齐出动，进行搜山围捕，费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抓回。被刺杀的那个朝鲜人看守的尸体，即交由母校向笠教授进行解剖，我作为助手，至今记忆犹新，怀念不已。

关于肉刑

这里也与日本国内一样，许是德川时代的一种残余。诸如拷打五十到一百板子的体刑，是司空见惯的。满、蒙等地的要犯，都是从大连分狱转送过来的，大概有一两百名。每一个受过这种笞刑者的臀部，都被打得皮开肉绽，一片紫黑色，肿胀得血肉模糊。可以想见，这是看守们象怀有杀亲之仇那样，狠心地用皮鞭毒打成的。这些受刑部位，不久便化脓溃烂，苍蝇争噬，产卵其上，久而生蛆，四处乱钻，最后拱出蜂窝似的许多孔。还有些受过笞刑的囚犯，从分狱押过来时，已经生了蛆，同厕所里的蛆一般大。没有比消灭这种蛆更难办的事了。面积大，有孔穴，成百成千条蛆钻在里边，用镊子钳取，几乎不管用。这种蛆又非常敏感，只要稍微一触动，就往里钻，像蟹子洞那么深的地方，巧妙地躲藏起来。当时用注射器装上红药水、来苏尔液或双氧水等药物，又灌注，又涂抹，全无效果。当认识到一方数次进行注射、涂抹仍白费劲时，最后只好撒手不管了。战争结束时，从山口出来一个巫婆，蛆呀蛆呀的，

对蛆虫破口大骂。可见消灭蛆虫是如何的困难，真是非笔舌所能形容得了的。还在学校的时候，我曾参加满洲开拓医疗团，到远处去巡回医疗。记得同期同学中，有现已故去的平田君和 T 君等。我们从土坟中掘出一个完好的颅骨，当即带回宿舍。我仔细一看，牙齿都完整无缺，估计年龄也只有二三十岁样子。拿来作解剖用，实在很抱歉，对不起中国人。但当时，我一是出于好奇心，一是为研究医学的需要，用来作标本。距离监狱约三百公尺的地方，有一片很大的坟地，这里永眠着成百成千的英灵。可能现在已经变样了，但当时这些土坟，不知是风吹雨打，还是狗扒猫拽的，许多尸体的手足和头颅都暴露在外。在医务室里搞勤务的一位年长的下属人员引导下，我到那里把认为合适的颅骨，拣回狱中。颅骨肉还附着很多腐肉，蛆虫就钻在里面。这些腐肉还非常坚韧，怎么也剥不下来，作为生体试验，虽已不中用了，但可用来做灭蛆试验。为了杀死这些蛆虫，先用毒性药硝斯道，青酸钾配成溶液，再把衣类物浸泡其中，然后用它把颅骨的空隙填塞上，再放进二十公分深的罐子里，埋入地下。十天后，我一边祈祷能杀灭蛆虫，一边往外挖。只见蛆虫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迅猛地多了起来。其生命力之旺盛，真令人惊叹不已。时值炎夏，不便再作试验，还是等到寒冬季节再搞吧，于是就将那些颅骨，送还原地，但届时竟把它遗忘了，终未实现这桩心愿。

旅顺监狱里，女囚犯很少，大概不到十分之一。奇怪的是竟有七八名日本尉级军官，她们都是军官学校毕业生或动员入伍的学生，是被提交军法会议后判了罪而坐牢的。她们在狱中很守规矩，并能完成看守各栋牢房的辅助任务。我记得囚犯中还有一些下士官（军士），可能也是从关东军遣送来的，人数与上述尉官差不多。

执行死刑

同学中有参观过的，或从军队复员到监狱工作过的，他们自然都知道执行死刑的具体情况。现在我仅将任职一年零三个月期间，狱方执行将近二十名囚犯死刑的实际情况，概述如下。

旅顺监狱的重罪犯，大多数是从满、蒙等地送来的。执行死刑，并不象日本国内那样，必须经司法大臣批准，而完全是听从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我当时不知道死刑囚犯究竟有多少，也不敢想去知道，因为这可能是只有监狱长及其亲信才能确知的秘密。每次执行死刑，总是突然宣布的。由于没有医师在场，便不能执行，因此监狱长都在执行的头一天，就下达命令，确定具体的时间。每一次执行死刑，有时是三人，多的时候有五六人。虽然这已经是惯例，执行多次了，但是，在一接到这种命令的时候，我即会浮想起那种令人痛心的凄惨情景，几乎夜不成眠。连我都这样，那么对不知明天将如何的死刑犯人来说，会想些什么呢！他们对死的恐怖，又将是怎样呢！这些要被处死的中国人中，很多都有妻子和儿女，但狱方禁绝一切会晤，他们只能在单人牢房里，孤独地过着日日夜夜。据说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在执行死刑的前夜，为使囚犯与世惜别，要提供一点特别的饭菜给他们吃。可当时我不清楚，狱方果真能供给向囚犯暗示即将死亡的膳食吗？教务课的人，有称教诲师的，都是住持。他们概是对死刑囚犯反复进行过超脱生死、无私忘我的教诲了吧。到即要行刑时，死刑犯人的脸上被蒙上象草帽一样的东西，穿着红色囚服，带着手铐，由三四名看守押送，向着坡度很小的土丘上走去。不管哪一个死囚，对这一条微斜的坡道，都是深恶痛绝的，有些人发出悲恸的哭叫声，步行踉跄，以致被强行拉上刑场。我记得刑场就在围墙东角的一隅，是一块稍高一点的土丘上，那里的围墙也高出一截。刑房是二层楼建筑，上下两层各有十张草垫那么大小，呈长方形。临刑时，狱长、医师及各课长都并排站立在二楼阶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便把死囚拖到阶下，由站在中央的监狱长宣读罪状的要点，接着便严肃地宣布判决：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处以死刑，立即执行。为了走走形式，按惯例还要问过死囚是否有异议或需要申诉之类的话。这些都是通过翻译进行

的，大概只有五分钟左右时间。最后就开始行刑，囚犯被拖到一公尺见方的木板上，戴上手铐，蒙住眼睛，套上吊首刑具，再用纽带把脖颈系紧。这些完了，我便快步下楼，等合页一开，死囚就从活板上落下，立即检查死囚心声停止情况，并向监狱长举手报告。这间刑房的高度大概有四公尺，死囚吊落时脚不着地，距离约有三十公分。由于一经吊落，死囚的舌骨即便骨折，这时，鲜血和分泌物如同涎沫一般渗流而出，鼻腔里也喷出带血的鼻涕，蒙面纸已经渗成深深的紫血色。在心音停止期间，人像刚钓上来的鱼一样，左右前后猛摇晃。为防止这种晃动，有三名看守，从三方面拉着从犯人腰间系出来的绳子。我在这个阎罗殿中，随即把粘满血迹和分泌物的胸间部分衣服扒开，在心音部位放上听诊器，以测知心音的变化。常有这样的现象，呼吸即使停止了，但心音由于有自主性，常能继续搏动八分钟左右，等到出现吱、吱这样血液的流动声，搏动也就没有了。这段时间大约有一两分钟。心动完全停止，心脏就失去了机能，证明此人已经死亡，于是我就举手向监狱长递送信号。第一具尸体装棺转移之后。就等待下一个。惨，真惨；一具、二具，以至五具，必须连续地测听下去。面对着如此生身死体，我痛切地感到自己担任此种职务是多么的不幸，真叫人难以忍受。那条作绞刑用的大麻绳，已经相当旧了，证明它已经吸尽了多少人的鲜血啊！听说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10月，在中国哈尔滨暗杀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日本在朝鲜设置的最高统治长官）的朝鲜英雄安重根氏，也是在这里作为“刑场之露”而被结束了短暂的生命，并埋葬在前述的那座土坟里。对于死刑的是非，姑且不论，只说绞刑，实在是太残酷、太惨无人道了。我想，象美国等地那样，使用电椅子，不是比较适宜么！写到这里，我又浮想起在电视中看到的，作为甲级战犯的山下将军及其他一些将校们，走向绞刑台的情景。这大概是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的事，地点在菲律宾的门天鲁帕。他们也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土丘上，一个接一个地向吊首的台上走去的。

我是昭和二十年（1945年）7月16日到阜新步兵部队任队见习军官时，离开旅顺监狱的。这期间所有死囚的尸体，几乎都被运到母校的死尸房去了。

大连机械制作所罢工事件的演变过程

杨志云

1925年12月21日，南沙河口大连机械制作所（今大连重型机器厂）中国工人罢工。发生罢工的直接原因是：12月21日下午，石传锦、尹子宽等代表中国工人，向厂方日本工长，交涉梁玉高不该歧视并挑拨破坏工学会以及改善中国工人生活待遇等问题时，日本工长不仅态度粗暴，拒不接受提出的要求，甚至以“不愿意干就退厂，解雇”的话进行威胁，肆意谩骂工人代表。因此引起了工人群众的公愤，认为日本工头和梁某竟然以退厂解雇相威胁，那么就退厂给他们看看。于是大伙便跟着石传锦等一同退出厂子，回宿舍去了，致使车间作业立时停顿。

这次罢工事件的突然发生，是日本资本家、工头和梁某等所不曾预想到的。

当天下午六时许，傅景阳打电话到中华青年会找到沙河口水工会开会。当时在场的除我和傅景阳外，还有秦茂轩、高纪云、唐宏经、王立功、唐继善等。会上，首先听取了石传锦关于交涉和退厂情况的具体经过，然后就如何进行这一罢工斗争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决定：

一、坚决支持罢工斗争，并由工学会出面向厂方交涉；

二、明确罢工斗争的原因，应把事件发生的责任，归咎于梁某的挑拨离间，歧视工学会会员和破坏工人改善生活待遇，以及日本工长粗暴蛮横的态度；

三、坚持复工的条件；

四、交涉应以厂方最高管理人员为对象，着重打击梁某及日本工头的嚣张

气焰；

五、鼓励罢工工人的勇气，不要被厂方及梁某等人的威胁利诱所动摇破坏。

12月22日，厂方通过《泰东日报》登出文章，说工学会鼓动工人罢工，要挟厂方，企图歪曲事实，以制造矛盾、混淆视听，向工学会施加舆论压力。原来厂方的稿件是由梁某等买通该报记者侯小飞发表的。当天上午，共青团和工学会负责人见到《泰东日报》发表的新闻后，认为必须加以反驳，不应沉默，并且要详细说明原由，驳倒对方，以正视听，争取社会上的同情和支持。同时还就如何疏通报社的关系，作了研究。当即由秦茂轩根据石传锦等口述，起草稿件，并由杨志云、傅景阳和秦茂轩负责去见原《泰东日报》编辑长傅立鱼，请傅氏大力支援。傅立鱼在中华青年会（任会长）同我有师生之谊，对中华工学会会长傅景阳（又是共青团大连特支组织委员）也一向重视，对秦茂轩（共青团员，全国铁路总工会派来协助大连中华工学会开展南满工人运动）更有同乡兼亲戚的关系，因此表示不仅愿意在报纸上帮助，而且也愿意向厂长进言，能重视中国工人的合理要求。当时傅立鱼挂电话给《泰东日报》编辑沈紫曦，记者范克强，希望他们支持工学会，并且能在稿件送到后，立即用同样大小的字号，同等位置的版面，刊登出来。工学会的稿件是12月24日在《泰东日报》上发表的。对梁某一伙贿赂日本工头等的卑鄙行为，都作了揭发，争取了社会上对工学会的同情和好感。

在报纸上公开进行说理斗争之后，傅立鱼氏曾用电话同厂长联系，表示愿为调停，不使事态扩大和恶化，使厂方和工人都少受损失。并说明将由傅景阳代表工人与厂方接洽。厂方对傅立鱼氏的从中斡旋，深为欢迎，也愿意接受傅景阳为工会谈判代表。

12月26日，谈判开始。厂长对傅景阳的态度还算客气有礼貌，并且对改

善工人生活待遇问题，表示厂方不久将通过内部预算手续给予提高，保证能使工人满意。同时希望傅景阳，今后如有什么事，可以找厂方总负责人联系，要求工人能尽快恢复上工。

谈判中所争执的，就是解雇石传锦等人的问题。傅景阳曾坚决表示不能同意，而厂方对此也坚持不变。

傅景阳交涉回来后，经过共青团特支和工学会负责人的共同研究，大家认为解雇工人代表，有损工会威信，不能迁就。但是，石传锦等本人对此却认为问题不大，只要工人群众的生活待遇能有所改善，就可以给厂方一点面子，就是说，厂方允许他们回去，他们也坚决不回去，凭自己的手艺、技术，到哪里找不到饭碗，不能因几个人的吃饭问题，而受厂方的要挟，影响到全体工友。

共青团和工学会都对此次罢工，事前没有充分准备，同时对斗争的领导，也还缺乏经验，如果不有理有节，一味坚持下去，收拾恐有困难。因此决定，由傅景阳答复厂方，在厂方保证改善工人生活待遇，不听少数奸人挑拨歧视工学会会员，而在石传锦等人主动不愿回厂的条件下，结束这次罢工。

此次罢工，由退厂到复工历时十数日，其经过情况和演变过程，大致就是这样。

南沙河口大连机械制作所，有党员李盛阳一人，是 1926 年夏初入党的，划分在工学会支部内。1926 年末，我离开大连后，听说该厂党员有所发展，党组织也有所扩大，因那是邓鹤皋同志负责的时期，详细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市委党史征编一室史石供稿；作者系当时共青团大连特别支部书记，中华青年会干事，现已故去；本文写于 1960 年末）

关于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情况及其它

门恩福

在印刷工会成立之前，大连就有增智学校的组织团体。这个学校是毛义亭创建的，李仲刚和林升亭曾先后担任过该校的校长。学习的课程有文化、算术、日语等。当时印刷界大多数工人都没有知识，迫切要求学习一些文化技术，能懂一点日语（实际上谁都不愿意学它），少受些鬼子的气。在增智学校学习的印刷工人有董秀峰、王守国、魏长奎、门向阳（门恩福）、王凯臣、吕功甫、房德明（房日新）、王世平等二十多人。在该校学习时，大家深感不方便，希望印刷工人自己能够办个学校。另一方面，当时大连每逢“双十节”都召开大会，举行庆祝活动，每年还有春秋两季陆上或水上运动会，这些集体活动都要求以团体名义参加，可是印刷工人没有团体组织，只能随同增智学校一起参加活动。并且当时在大连存在的比较先进的团体组织，如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中华青年会、增智学校等，对印刷工人的影响也很大，使他们认识到，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就有了靠山，大家团结起来，力量才是不可抗拒的，才能少受日本鬼子的气。

1924年春季的一天，东亚印刷厂工人董秀峰起草了一封类似请柬的材料，借用增智学校的誊写印刷工具，油印了数十份，发到关东报社、泰东日报社和满洲日日新闻社的印刷所以及东亚印刷所、小林印刷所等单位，邀请各厂的工人代表到增智学校去开筹备会，商讨有关成立印刷工会和夜校的问题。到会者有二三十名。董秀峰、赵悟尘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大意是说明成立印刷工会的原因和好处。会上，还研究了活动经费问题，决定用工人自动捐款和会员缴纳会费的办法来解决。同时还确定工会的名称为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选举

了会长及各部的负责人。

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印刷工会的合法存在。就以成立工余学校，学习文化、联络感情，增进知识的名义，来掩盖敌人的耳目，并通过傅立鱼在衙门起出了许可证。在各项工作筹备就绪后，于同年的春天（天气已经暖和了），在工会所在地——近江町（今同兴街）前协元利旧址召开了大连印刷职工联合会成立大会。这次大会不仅有印刷工人代表参加，而且还有其它团体的负责人参加，如大连中华工学会会长傅景阳来大会致词祝贺。到会人数约有二百名左右。会上，赵悟尘、董秀峰等人相继报告了印刷工会成立的经过、意义和希望，并宣布了赵悟尘为印刷工会首任会长（以后董秀峰、曲士刚等相继担任会长），副会长兼秘书董秀峰，组织干事门向阳，宣教干事魏长奎，文教干事王守国，体育干事王文汉，会计王凯臣，交际是谁记不清了，顾问为傅立鱼。职业介绍所是后来增设的，负责人是吕功甫。此外还有数名委员，共同组成委员会。各个厂、所都设有小组。

我记得在印刷工会成立的同时，就成立了“工余学校”，教师是义务制。有一百多名学生。学习课程有汉文、算术和英文、日语等。同时还开展星期天讲演，邀请比较有名望的人，如赵悟尘、董秀峰、傅景阳、杨志云、傅立鱼等人，来作讲演。有时候工人也上台发表感想，以此来提高工人们的政治觉悟和爱国思想。

我记得印刷工会成立不久，曾出过一个旬刊，名字忘记了（可能即《曙光》——编者），是油印的，八开大小，由王守国负责，大约办了一年多时间。稿件大部分来自工人中间，内容多是介绍工人们失业、挨打受骂的痛苦生活情况，揭露日本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的罪行，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意识，增加对日本鬼子的痛恨。也摘录一些外地捎来的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如介绍全国工人运动情况。这个刊物，工人都可以看到，就是不叫日本人知道。

印刷工会主要通过各种方式，向工人宣传参加工会的好处，如参加工会后，生活困难的，可以得到救济；无钱治病的，可以得到帮助；没有工作的，

帮助他介绍职业；子弟来念书，只收半费；会员看电影，只付半价……并不时揭露中日工人待遇不平，日本资本家和工头欺压工人等，强调我们只有团结起来，参加工会，大家抱在一起，才有力量同他们斗争。工会就是通过这样的宣传，来提高工人的觉悟，激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使之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因此，参加印刷工会的人，就愈来愈多了。特别是在第四次中华运动大会以后（因为在这次运动大会上，印刷工人夺取了优胜旗，对工人们鼓舞教育很大，进一步认识到团结起来就是力量的真理），印刷工会更加兴旺，总共一千多名工人，约有七八百名加入了工会，缴纳会费的有四百人左右（会费都经我手）。从此，印刷工会开始设部，原来的干事都改为部长，组织机构壮大了。

最初，会费按会员的工资百分之一缴纳，后来改为每人一角钱。

“五卅”惨案发生后，英、日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工人和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到大连，全市的工人、学生个个义愤填膺，在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下，由当时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大连中华青年会会长、原《泰东日报》编辑长傅立鱼出面，青年会、工学会、印刷职工联合会等团体发起，组织“沪案后援会”，各团体分别选出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领导旅大各界人民声援上海受难同胞，进行反帝爱国的正义斗争。6月21日下午，在永善茶园（今人民剧场）为殉难诸烈士召开了追悼大会，与会者达数千人。会场气氛庄严肃穆，周围墙上挂着巨幅挽联。傅立鱼、林升亭等人先后在会上讲话，我们深深受到了教育，爱国反帝的怒火在每个人的心中炽烈地燃烧着，落泪者不乏其人。会后各个团体举行了示威游行，每人手持小旗，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打倒工贼”等口号，并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募捐活动。印刷工会的干部还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到商店、街头等公共场所进行劝捐活动。我们将募集来的钱送到伏见台（今广和街）中华青年会，然后寄往上海。

1925年满日社拣字科十几名工人由于反动工头殴打徒工而掀起罢工斗争。

当时我曾同印刷工会会长董秀峰，一方面鼓励罢工工人坚持斗争；另一方面劝阻其他小印刷厂的工人不要到满日社那里去做工。但由于工人中间出现了个别动摇分子，结果这次罢工仅仅坚持四五天就被敌人瓦解了。

1926年的春天，在福纺罢工期间，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曾同大连中华工学会一起，组织工人捐款，支援罢工工人。我们印刷工会的干部，还到福纺纱厂附近的农村进行宣传，劝告农民不要受资本家的骗而去工厂做工。这样就有力地支持了该次罢工斗争。

“五卅”惨案后，大连成立了党的组织（具体时间在1926年1月——编者），负责人是杨志云。当时杨告诉我们说，他是来闲住的，而工学会会长傅景阳对我们讲，杨是我们请来的义务教员。杨志云来夜校上课时，经常同我们接近，有时我们也怀疑他究竟是不是义务教员，钱从什么地方来？日子长了（大约半年之后），相互了解了，于是杨志云说自己是上海总工会派来的。后来他竟带来一些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书名都忘了）给我们看，有时他也给我们讲解，使我们懂得了很多革命的道理，更加热爱祖国、仇恨敌人了。当时学习的方法是，一边“闲扯”一边讲，内容有：工人是怎样受苦啦？如何受鬼子欺负啦？海港是我们的，为什么要受日本鬼子管啦？等等。我们提出问题，杨志云就一一回答。他从国家制度腐败，讲到袁世凯卖国称帝，讲到“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他还说，我们同朝鲜工人、日本工人干同样的活，可我们的工资却比他们低，这是怎么同事？这就叫不平等。他还告诉我们，要争取平等，工人就须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力量大，才能同他们斗争，不受他们的气。

1926年春，有一天，工学会会长傅景阳找我们印刷工会的领导干部（五六个人）讲，杨志云是党员，觉得你们挺好的，想接纳你们入党。问我们是否愿意。当时我们非常高兴，个个都表示愿意。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的样子，在我们集体宿舍里，在坐的有赵悟尘（是否有他，记不太准），董秀峰、魏长奎、王守国、王凯臣和我等六人，杨志云又来了，并且问我们，你们入党不害怕吗？不怕蹲牢狱吗？我们说，不怕，要怕就不搞工会了。杨志云当即把我们几个人的名字记下，后来报到了上海。他又对我们讲，既然入党了，定要遵守党的纪

律，不能把党的事告诉任何人，就是父母妻子也不能告诉，对同志的困难要想办法帮助，如果被捕了，无论怎样也不能泄露党的机密。最后他又叮嘱说，以后见到日本鬼子有什么举动，做什么事情，要经常向他汇报。

杨志云是我们这些人的负责人，但给我们写信联络事情的是董秀峰。

我们入党后，就注意周围的人，谁对开展工会活动很热心，谁表现积极、进步，就把他的情况如实汇报给杨志云。经杨同意，我们再同这些人谈话，介绍他们入党。以后加入党的共有二十余人，其中有高阁臣（高长凯）、吕功甫、张希文，其余还有谁，我都记不清了。当时是否成立了组织，也记不得了。

1926年冬天，又从关内来了两位同志到大连做地下工作，并吸收了新党员。同时任命魏长奎为大连团组织的负责人。并派他到福昌公司做组织宣传工作，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工人解决困难；物色思想进步的工人入团入党。

1927年5月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时，印刷工会曾派范增荣（王守国）、赵乐三（马相轩，当时是印刷工会的组织干事，不是党员，现在双城五家子乡新兴管理区工业大学印刷厂农场劳动，关于这个情况，也是他对我说的）去参加。大会主席团有陈独秀、李立三、邓鹤皋、马超凡、何香凝等人。王守国在会后先回来了，而马是路经上海后返连的。当马到达大连时，大连的党组织已被敌人破坏了。

1927年7月间，在码头有一名团员被敌人逮捕了，由于受刑不住，供出了魏长奎，次日魏就被捕了。第三日，书记等人也被捕了。这以后，我离开了大连，情况就不清楚了。

（史石整理，市党史征编一室供稿）

简忆旅顺高公师范部

葛治谟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旅大地区（关东州）期间，为推行奴化教育，在金州各伪会办了普通学堂（初小四年制）。于金州东门外还办了“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全是男生），南门外办了“金州城南公学堂”（全是女生）。中等学校有金州农业学校、金州商业（后改工业）学校、金州高等女子学校等。

旅顺高等公学校（简称高公）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旅顺办的一所中等学校，内分中学部、师范部。两部招生对象全是“关东州”所管辖各学堂高等科二年毕业的中国学生。我曾在旅顺高公师范部读过书。

旅顺高公师范部的前身是旅顺师范学堂，1932年4月与旅顺二中合并为旅顺高等公学校后，改称师范部。1943年又与中学部分开，独立为“旅顺师范公学校”（中学部为旅顺高等公学校）。

旅顺高公师范部（校）主要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关东州）推行与扩大奴化教育，培养公学堂高等科的教员。同时，也可考入师道（即师范）大学继续深造。学制皆为四年。课程分为文化基础课和师范专业课两种：文化基础课有日语、汉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等；师范专业课有教育史、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同对，还设有英语、音乐、美术、习字、体育等课程。

旅顺高公师范部（校），共有50余名教职员工。师资素质比较好。所任各科的先生（即教师）多从大学毕业，最差的也是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当时我们一班的班主任佐伯××先生（担任历史课），就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教我们地理、音乐的伊藤先生是高师毕业的。生物先生小仓××、体育先生小野田××、美术先生三浦××等，都是专业学校毕业生。我们在一年级时的代数课，还是50多岁的校长先生新里朝明亲自教的。还有一些先生的名字已记不清了。上述都是日本先生。担任汉语课的中国先生有潘绍

武、金纯泰和老王先生等。他们对学生要求严格，讲课细致认真。

旅顺高公师范部（校）共有 12 个班级，400 余名学生。男女生分别编班。男 8 个班（一至四年级各 2 个班），女 4 个班（一至四年级各一个班）学生全都在学校寄宿。

校舍位于旅顺当时的新市街（现太阳沟）三层大白楼（现我陆军某部医院），外观雅致，内部设备齐全。学生教室分普通和专业两种。专用的有音乐教室、理化实验室等。还有一个大礼堂和室内体育活动场所。同时，还有学生的宿舍和大食堂。男学生除住在大白楼的三层楼（北寮）外，还有一部分住在一个距校舍一、两千米远的二层红砖小楼宿舍（南寮）内。

旅顺高公师范部（校）规定，凡是被正式录取入学的学生皆可享受“官费”（即公费，每月每人 11 元）。但款不发给本人，由校方统一控制使用。主要用于伙食费、旅行积立金等方面。

学校还规定，学生毕业后，必须服从统一分配，最少得干三年教员工作，即尽三年“义务”后，方可另谋职业，否则得按规定偿还在校期间所享受的“官费”。

旅顺高公师范部（校），还有学生“同窗会”，几乎每年要活动一次。请已毕业的校友来校作报告，并听取在校学生代表汇报学习情况。同窗会开完后，收集材料出版同窗会刊以资留念。

每年新生入学和四年级毕业时，除学校统一举行隆重的入学、毕业典礼之外，还按地区、按原毕业的公学堂为单位，分别搞欢迎新生和欢送毕业生的茶话会，相互交谈，互相勉励，甚有教益。

学校每年还举行一次体育大会，并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旅行、参观游览等活动。

有几件值得回忆的事：

重阳节登老铁山

1943年旧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校方组织二年级（男）全体学生“远足”，去登旅顺老铁山。主要带队的日本先生是小仓××。清晨出发，一路上非常紧张，谁若稍有违纪，不是挨骂就是挨打。几十里路老是这样“行军”，真的抗不了。对此，同学们都很气愤。到达老铁山顶时，天已过晌，又累又饿，全身大汗，小仓先生又逼我们集合，脱下上衣作操。这样，同学们就更为反感，但也没有办法，只得勉强地把操做完。吃饭了，几个“号手”与带队的日本先生在一起，其余同学全都三三两两的，分散在山顶各处。当时，我们几个人所带的午饭还没用完，便传来了话：“喂！同学们，走啊！回校洗澡去。”就这样，带头的一走，我们也收拾了晌包，起身向山下走去。有的还边吃着干粮边急忙走着。当我们走到老铁山中坡时，同学们便由四面八方会集到一起了。此时，在山顶上响起了集合号声，“怎么办？”“别管他。”“走！”人群中你一言，我一语的，就继续走下山去了。山路难走，草荆缠人，浑身是汗，心里又急又慌，当走上平坦大道的时候，同学们这才松了一口气，觉得还挺有意思。

回校后，便都进入学校的浴池（澡塘）洗澡了。正在洗澡当中，那带队的日本先生小仓和三浦，气势汹汹地闯进澡塘就骂，“马鹿（混蛋），你们还洗澡？”“级长，王××君，来！”我们这才知道坏事了。同学们便急急忙忙，澡没泡好身没擦干，就着衣走出了澡塘。

快到开晚饭的时间了，日本先生便把同学们全集合到学校大礼堂。一律按日本操练的坐法（蜷腿伸腿，偏半腕），一动也不准动，稍动一点不是打就是骂。日本先生从级长嘴里没问出个结果，老是向同学们查问哪个是“跑老铁山”的号召者和领头人。同学们都不吭声。实在无法，日本先生又采取个别质问的办法，一个人一个人的叫到另外房间里去。可是被叫去的同学回答的都

是“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宁肯忍受一切打骂和污辱，也不肯吐出半点真情。这样，把我们折磨到深更半夜，还是没有个结果。于是日本先生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

高粱面“窝窝头”引起的“大祸”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旅顺三涧堡抢修飞机场时，一些学校被强迫停课拉去“勤劳奉仕”（做劳工）。当时有我们学校三年级和旅顺中学、大连西岗公学堂的学生。我们干的是繁重的挑泥抬土的力活，吃住都在工地上，几十个人挤在一个没有炕也没有床的大屋子（日本海军兵营）里，既是宿舍又是食堂，就地吃就地睡。时值炎热的夏天，白天干活，累得腰酸腿痛，晚上躺在地板上，跳蚤咬蚊子叮，成宿也睡不好觉。日本先生住的是大屋旁边的一个单间小屋，睡的是铁床，吃的是大米白面。我们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和稀粥。大便干燥胃难受。有一次轮到我们七、八个人进炊事班去做饭（每周轮一次）。因为同学们每顿都吃高粱面，实在抗不了，想吃一点高粱米饭。于是，我们炊事班同学把这个意见转告了日本先生三浦等。开始他们不同意，说是吃高粱面省粮，吃高粱米费粮。后来，答应说，把库存的高粱面吃完后，再争取吃点高粱米干饭。这样，为了使同学们能够尽快吃上高粱米饭，一天晚上，我们就有意地把窝窝头的量加大，又多蒸了一些，除按人分发外，还分给同工地劳动的大连西岗公学堂的小学生们吃一些（他们的定量少，吃不饱）。

同学们天天吃高粱面，早已够了，连小窝窝头都吃不了，何况大窝窝头呢！有的只吃了一点点，有的干脆一点也没有吃，大家不约而同的把“大窝窝头”高高地堆放在日本先生住屋的门外（门由内向外开）。日本先生吃完晚饭

推门外出，一推门推不动（有窝窝头在外挡着），再用力一推，只见窝窝头堆了满地。立即发起火来，“‘马鹿’，这是谁干的？”日本先生先是找级长盘问此事。不大会儿，又将我们炊事班同学召集到屋里，老是追查“蒸大窝窝头，将窝窝头扔在门外，到底是谁的主张？”可是任凭怎么问，怎样威胁，谁也没有说。

为这事，整整闹了一夜。翌晨，吃完早饭，日本先生就叫我们值炊班同学收拾行李。不一会儿，日本海军的卡车来了，叫我们上车，同时也有另外几个同学也上了车。我们与车下的同学相互招手告别。卡车高速地向旅顺市内方向驶去。我们都在猜想，究竟要把我们拉到何处去？

车，最后还是直接把我们拉到学校。天快晌了，在校生上午课还没有结束。让我们把行李搬到学校一楼走廊放着，不准乱走乱动。午饭后，又将行李搬到宿舍（南寮）去。从那以后，只准待在屋内，除吃饭、上厕所外，哪儿也不准去。可真是每天三个饱，几个倒。书，看不进去，只好在床上躺着。有时同学之间还趣谈一番：“更好啊，不上课，不干活……”，“咳，给饭吃就行！”。有的同学说：“准备吧，这个书是不能让咱们念了，回家吧。”这样，待了两、三天后，便有不识之人，由日本先生领着进来。有的同学被叫走了，一连几天有六、七名同学一个个地离开了我们。只去不回，谁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被旅顺警察署传讯去的。剩下我们这六、七个人，在宿舍里天天发大闷。突然有一天，我们的家长陆续都来了。有的是父母亲，有的是亲兄弟，通过他们才了解到，是学校与我们家乡的伪会、小衙门联系，通知家里来的。家里人都吓坏了，不知我们惹了什么祸。来后，都给我们好一顿说：“为什么不好好念书，偏要去惹祸？”我们向家长们谈了实情，他们嘴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却都同情我们。

家长们就在我们宿舍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和我们一起被叫到校长室去。校长进行了很严肃的训话，大意是：你们的子女，心大大的坏了。嫌高粱面窝窝头不好吃，还浪费，到处扔。日本皇军，在南洋打仗，吃草根、吃树皮，高粱面也吃不上……今后，要劝告你们子女，好好读书，老老实实的“勤

劳奉仕”。

第二天家长们回去了，又过了两、三天，学校用车把我们这六、七个同学，又送到旅顺三涧堡去“勤劳奉仕”。后来知道，被个别喊走的那六、七名同学（至今还能记得的有衣庆兰、曲寿仁、谭学圣、孙吉祥、薛宝珍等），他们在旅顺警察署拘留了一个多月以后，便被强迫遣送到大连“特勤队”去做劳工了，从此，他们被停止上学了。

晚上“点呼”，闹得先生无法

旅顺高公师范部（校），全校学生都寄宿，不准学生任意外出。制度规定，每天晚上睡前由舍监（值宿）先生负责进行逐个“点呼”（即点名）。学生宿舍的寮长，先通过各宿室的室长把同学们集合于走廊排好队，等待寮长和舍监先生来“点呼”检查。有时，突然电灯熄灭，一片漆黑，这时走廊里便大吵大闹起来。什么水桶声、口哨声，“鸡”叫“狗”咬声，脚踩地板声，等等，什么怪声都有，轰动了全楼。“点呼”点不成了，气得日本先生从三楼（宿舍在三楼）往下走。走到二楼之间，上面水桶的水就泼下去了，弄得先生满身是水，十分尴尬。我们刚入学时，遇到此事，殊觉惊奇，后来常了，就不以为怪。原来灯光熄灭不是停电引起的，而是同学们有意顶断了电门的保险丝。

我是1942年4月考入旅顺高公师范部的。到1945年8月时，我们四年级同学应“学徒动员”，正在“大连船渠”（现大连造船厂的前身）做“勤劳奉仕”。我和几个同学从事“铆工”。“八·一五”那天中午12点，日本天皇在广播电台里宣告无条件投降，我们真高兴极了，当日下午就停止干活。待

了三天，也没有回旅顺学校。到 19 日，同学们便从大连分手，各奔家乡。旅顺高公师范部（校）的寿命也就结束了。

（作者系金州区党史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

金州“益友社”

孙玉良

一九三五年秋日，金州会长曹世科，为了保存地方史料，以备异日采用，成立益友社于金州会楼上。以赋诗作画为名，每月集会一次，印有《益友》月刊，已出五期，分贻同人。翌年夏，日本警察署禁止集会结社，说是甲午战争诗中有反日情绪，并将所印刊物全部索去，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曾蒙阎献廷举人观光莅止，有诗云：

丙子首春，曹君冠甲，同张伯川、毕大拙、毕维藩、孙玉良、孙慎之、董荃忱，结书画社，踵竹林七贤之遗风，老朽幸得参加，率赋短章，以留鸿爪。

辉煌四座尽琳琅	雅集群仙共一堂。
俯仰古今参画稿	唱酬诗酒快飞觞。
凝目妙笔烟云绕	拂面春风翰墨香。
老眼欲舒何处是	高楼日出瞰扶桑。

回忆金州农业学堂

崔揆武 卜钟声 谷庆福

金州农业学堂，是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在旅大地区创建较早的一所老牌学校。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九·一八”或“七七”事变后入学的。由于我们从小受的都是殖民地奴化教育，因此，思想空虚，根本没有什么理想可言，高小毕业后报考什么学校，完全听从长辈的旨意。农家出身的，自然和“农”字亲，于是，就有很多人报考农校，这也成为报考该校的人竞争激烈的原因。报考者当中，家庭较富有的，都指望孩子学成后回家，自己经营个果树园，或者搞点养蜂，养畜、养禽什么的，以发家致富；一般穷困农民家庭，因父辈们几代目不识丁，受尽剥削和压迫，企望后代出个念书的，至少可以“光宗耀祖”，宁肯自己忍饥受累，也要供孩子念完这个学校。笔者就是这样的穷学生之一。但不管哪个阶层出身的青年学生，都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想法。由于校园生活的轶事很多，现拣其主要的回忆如下。

1905年，日本战胜沙俄，取代了俄国在旅大的统治。为了进一步推行其侵略政策，掠夺我国东北的农业资源，在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旅大地区，首先办起了农业学堂。兴办农校，与其说是为发展本地农业，不如说是为储备农业技术人才，为掠夺我国农业资源，最终为“繁荣大东亚共荣圈”服务更为确切一些。从该校毕业生的分配去向和该校的发展历史来看，无不与其侵略步调相呼应。这也说明教育服务于政治的鲜明阶级性。

一、校史沿革

该校正式创建于1923年春，学制三年。在此以前，从1915年开始，曾作为二年制的“农业科”，附设在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建校后，则与南金书院一个校舍，两块牌子，直到1932年，才迁到北三里庄新建的三层教学楼。1942年，学制改为四年（从1941年入学的新生算起），由乙种官立学堂升格为甲种官立学校。

1938年前，每年只招收一个班。1939年开始，每年招收两个班，每个班50人。学生来源，是从各民政署辖区内的公学堂（高小）应届毕业的男性学生中录取。“金农”又是旅大地区唯一的一所中日学生“共学制”的学校。为了使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日本文武职官员和移民子弟在义务教育之后能够继续深造，1927年后，就从各专收日籍学生的“寻常小学校”招收部分日人（包括朝鲜族和台湾籍的）就读。按3:2的比例招收中日学生，当年日人学生的缺招数，按成绩由中国学生递补。根据记载：1935年招收49名新生中，有日人19人。1936年，在校生137人中，有日人47名。1938年在校各年级中日学生分别为：一年级51人中，有日人5名；二年级47名学生中，日人6名；三年级50名学生中，日人10名。共读用日文编的各种教材，但日人学生名次排到前10名的很少。1945年日本投降，该校也随之解散。

二、机构与设施

该校隶属于关东州厅领导。学校职能部门有：校长室、教务处、总务处。校长负责全校工作；教务处主管教学和实习工作；总务处的任务是后勤和日常杂务。

创校后共经历了三位校长。第一任为岩间德也，第二任为山口二郎，他俩都毕业于上海同文书院，所以除通晓中文外并深悉中国的风俗民情，有“中国通”之称。尤其是岩间德也，对中国的丧葬婚娶、宗教礼仪等无所不知。他更

谙悉汉语，与中国人对话运用自如；并能用标准音读讲《论语》（可见日本为培养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是蓄谋已久的）。岩间德也在任校长的中后期，还兼任旧奉天省省长顾问，是本地日人中的头面人物，民政、警察署长都恭维他三分。最后一任校长为小池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农学系。三人都享有“高等官”文职最高官衔。

教务处由一名教头和近二十名中日教师组成。日人教师都毕业于日本各地的农业、兽医、林业、蚕业等大学，都具有本科和专科的学历。分别担任基础课、专业课教学。还有一名退役的军人，担任军事课教官。在日人教师中最残忍的一个是森下，根据日语谐音，学生都叫他“毛驴子”。中国人教师，创校初期只有一名，1940年后逐渐增到三人。是“东大”和“北大”中文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分别教国语和日人的汉语。

总务处下设一医务室，有一名中国人护士，负责给学生治洗沙眼和治轻伤小病。舍监一人，由一名中国教师兼管学生宿舍生活。

学校设施。三层的红砖教学楼内有办公室、教室、理化实验室、动植物标本室、礼堂。有一座十余个大寝室的学生宿舍。校舍，宿舍和其它附属建筑，总面积达三千二百余平方米。

在校舍主楼的上端，装有为教学服务的风向计，在教学楼外东北角一块空地上，还设有较规范的观测气象的“百叶箱”。南北走向，可同时容下2000人做操的操场，横在座南的校舍与座北的宿舍中间。内设跑道、足球、篮球、网球、摔跤等场地。校舍前，是植有各种花草的花坛；西侧是蔬菜园地；畜舍、鸡舍座落在园地的北面。与操场并排在西侧的，有近二十亩地果树园。花草绿树环抱于四周的校园共占地三百余亩。

三、教学与教育

学校是一所综合性的中等农业专业学校。课程设置有基础课：语文、数、理、化，动、植物等十门。专业课：普作、特作栽培、园艺蔬菜、果树、土肥、作物病虫害、畜产、林业等 14 门学科。都采用日本文部省指定的，与日本国内同类学校，使用统一版本教材。

上午授课，下午操作实习，以增长学生实际操作的能力。

针对着开设的课程和实习的需要，学校建有相应的实习基地。除蔬菜、果树、水田、旱田实习农场外，在养鸡项目中还备有电动孵卵器，在农副产品加工方面，购置了脱谷机、精米机、水果罐头加工等设备。

学生学了果树修剪，防治病虫害，一俟农事紧张或发生虫害，就在任课教师的带领下，在果园里从事剪枝，或喷施农药。农药也由学生配制。蔬菜园地栽种的各种粗细菜，以便学生实习，并备有当时较为先进的育苗温床，以促进菜果的早熟和提高产量。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经过实际操作验证，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为了奴化学生，学校抓住一切机会向学生灌输“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民族的灵魂、精髓”等思想。并且让学生“坚信不移”。目的却在于掩盖军国主义侵略的本质。

为了进一步灌输奴化思想，学校还举办学生轮流参加的讲演比赛会，并以此提高学生日语的口语表达能力。所谓修身课（以大和魂为标准的处世、待人接物应具备的品质修养）一直是日人校长亲自授课的。在其它课堂上的专业教学，也随时在宣扬日本和他们的“轴心国”。如林业课任课的日人教师伊藤曾说过：“童山秃岭”的国家不会富强。而日德两国，青山绿水，到处布满茂密的树木等等。但学生却从“逆反心理”出发，对他们的相互吹捧，都“嗤之以鼻”。

在校外还有“保道联盟”组织，是由官方民政署学务系代表和本城几个中

等学校管风纪的日人教师联合组成的。其任务就是监视各校学生在校外的行动，严防学生的反满抗日的举措，严禁学生到公共场所去，诸如发现有出入电影院的学生，轻者停学反省，重者开除学籍。

四、治校方针

日本在殖民地和各占领区，都推行“以华治华”政策。他们在这些地区办的中国人就读的中等学校里，也就奉行这一套治校方针。目的在于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分化瓦解民族精神。在学校里还倡导等级观念，低级学生必须绝对服从高级生，遇见时还得敬礼，因而高级生对低级生实行训斥，体罚是司空见惯的。这种等级观念的实质，是服务于政治上“以华治华”的需要的。除个别学生头脑简单，由于“施虐”而不得人心，多数学生的民族观念虽尚处于朦胧阶段，但能意识到同学间的“相煎”是日本侵略者当局的圈套，因而把体贴，照顾低级生视为兄长的义务，深受低级生的爱戴。在中国青年的强劲凝聚力面前，使日本当局在学校里推行的“以华治华”，显得无能为力，无法实现其阴谋了。

中国青年学生的凝聚力，还表现在火车上，或在校外的其它场合。中国学生（包括不同校籍），一旦受到日人、警察、巡捕的侮辱，便有人挺身而出，群起而攻之，绝不相让。在建校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就曾发生过数起殴打日人和警察、巡捕的事件，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其结局，多数是靠日人校长岩间的权威，平息了事。但在日寇的强化统治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学生动辄便被扣以“反满抗日”的罪名，许多“肇事者”被开除出校。

五、毕业生与“农业进步社”

自正式创校至旅大地区解放，学校随之解散的二十二个年头，加上前八年的二年制农业科，共送出二十届，一千五百余名毕业生。除少数人考入农、林业及畜牧兽医院校深造，极个别人从事日伪警宪走向人民的反面外，绝大部分都分在东北、华北等地的农、林、畜业的生产部门工作。其中，在伪满机关工作的有的当上技正（高工）、技佐（工程师），多数是技士（技术员）。

值得提及的是第二、三期毕业生耿立德、郑绍武与熊岳农校毕业的苍德玉，于1934年在旅顺合办的“农业进步社”。这是日寇统治时期在旅大地区比较先进的一家私人出版社，每月出版的《农业进步》月刊发行数最高达四万册，订户遍及东北各地。在大连、长春设分社，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五市设“派出所”，负责与各地进行业务联系。

《农业进步》月刊，专门刊登本地、外地专家学者的农业基础理论和生产技术经验等文章，并翻译介绍日本的农牧业技术资料，很受欢迎。后期又发展到兼制农药、猪瘟散、鸡瘟散，经销林、果苗木，菜种、蜂、菌种、农业书籍等业务。该刊传播的养鸡养蜂技术，一直延用到解放后一个较长时间。

解放后，该校有很多毕业生先后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各项建设工作，活跃在农、林、畜业生产和科技等战线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很多同志，先后被授予农艺师称号，其中有两位还获高级职称。

关于“南金书院”的由来

李浩田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地区的所有“公学堂”中，只有金州公学堂的校名缀以“南金书院”而称为“公学堂南金书院”。

金州古来就是辽东半岛的重镇之一。明清时代的辽南四州，首推金州。俗有“金、复、海、盖，辽阳在外”的说法。至于金州的行政区划，历史上虽屡有变动，但其管辖范围一直是不小的。据《南金乡土志》所载，当时的金州厅辖区东 180 里与庄河分界，北 100 里与复州接壤，划分为堆金、积金、雨金、南金、旅安五社和光禄岛，包括了现在的除庄河县、瓦房店市以外的大连市各区。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南金”的来由。

“书院”最早是私人读书、校书、藏书或讲学、授徒的地方。从唐代开始历代都有，到了宋代则已相当普遍。据史志记载，宋代的“书院”多属家塾性质的“私学”，以后才多“变塾为庠”，陆续成为“官学”的。书院长之职由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名士担任，普称为“山长”。另请教授等任教。书院的名称，一般都因人、因地、因事命之。书院的经费是由其拥有的“学田”支付。著名的宋代四大书院，白鹿洞、石鼓（一说为嵩阳）、应天府（即睢阳）和岳麓四所书院，曾有皇帝赐予的匾额、印本或学田。在我国历史上，自唐宋到明清都沿用了“书院”这种“养士”制度，形成为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不过，在千余年书院的发展过程中，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办学风气及组织管理等方面都有日益官学化的倾向。如负责书院的“山长”，由民间聘请改为政府授官主持。特别是明清时代的“书院”，虽说也多是地方官绅捐资，私人经办，但都必须接受府、州、县长官的监督，而与官方的府学、州

学、县学并存。在那种科举制的年代，书院也是“所工者惟文章，所求者惟科举”，大多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金州的“南金书院”，也是这种性质的一所县级书院，作为一种科举的考场和奖学机构而存在着。

金州南金书院是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由知县雅尔善所创建。当时“拨学田一千亩，征银70两”，在县学宫内成立。进士丁曰功曾监修南金书院，筹办南金学田。1815年（嘉庆二十年）改为明伦堂，书院遂废。1867年（同治六年），任金州厅海防同知的谈广庆联合地方文武官员范广文（训导）、王尚之（少尉）、安棣棠（副都统）等发起募捐办学，至1869年，在县学宫（孔子庙）内泮池东侧重建了南金书院。关于这一“南金书院”的由来，还可从1890年时，谈广庆所撰写的《南金书院碑文》中查到如下记载：

“金州向有书院，其地即在儒学之署。嘉庆二十年改其为明伦堂，而书院遂废。同治六年，余权篆斯郡，维时秉铎者范云波广文也，佐治者王尚之少尉也，整军经武者安棣棠都护书鉴泉协君也，余慨然于书院之废，欲创建而兴修之，适与余心如出一辙。由是冬分廉泉之水，用注学海之波。一时城乡绅董，海岛商民，以及满汉水师各旗，莫不踊跃捐输，争先恐后。噫！腋已集矣，遂择泮官东偏地，经董事诸君子，不惮烦，不惜力，登凭交集，昕夕从公，阅数月，而南书院告厥成功焉。”（标点为笔者所加）

“南金书院”是一所小型的书院。清末对规模较小的书院，不再设“山长”和“教授”，而由地方的学官兼理书院长工作，一般皆被称为“老师”。

“南金书院”的课业形式分为两种：一种称为“童生常课”，即未达到秀才的“文童”们来书院攻读四书、五经及八股文为主，每天授课或自学；另一种称为“文生月课”，由书院向考取“生员”的秀才定期讲课，并批改他们的文章和诗词歌赋等，以应付三年一度的“乡试”。

“南金书院”的考试定为每月二日（初二）和十六日举行。二日的考试称

“官课”，由学官（金州厅海防同知）出题；十六日的考试称“斋课”，由书院的老师出题。考试成绩按生员、文童各定为三等（生员分超等、特等、一等；文童分上取、中取、次取），分别给予一定数量的“膏火费”（即奖金）。斋课的“膏火费”由书院的基本财产“学田”收入支付，官课则除“膏火费”外，还由官府再给予同等数额的奖金，以示对成绩优秀者的奖励。

1894年（光绪二十年），因中日“甲午战争”而中断了南金书院的学业。接着，1900年，帝俄占领金州，南金书院的房舍也被拆除，利用其材料在金州东门外建立了为适应帝俄侵略政策而设的“俄清学校”（也叫“清俄学堂”）。

1904年，日俄战争后，由于“南金书院”成立百余年来对金州地区的文化教育影响很大，地方人士对这所“课考生徒，培养人才”的书院怀有深厚的感情，经由士绅刘心田等发起，很快组成了“南金书院校友会”，并各方募捐，在俄清学校的校址创办起私立的“南金书院私立小学堂”，以延续民族文化的传统。但这时日军势力已达到金州，并开始控制这所学校。他们规定“总教习”（校长）必须由日本人担任，还特地由日本外务省（外交部）派来了他们的“总教习”。

1906年9月，日本殖民地当局为进一步控制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将其改为官立，由关东都督府直接管辖。从此，他们将这所学校的名称先后改为“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将“南金书院”的名称与殖民地奴化教育机构——“公学堂”连缀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公学堂南金书院”这个别别扭扭名称的来历。

历史是公正的。“南金书院”这座古老的书院同它的民族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无论日、俄侵略者怎样用以为其奴化教育政策涂脂抹粉，或用以笼络我地方人士，麻痹我民族精神，都不能更改“南金书院”真正的由来。

（作者工作单位：大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大连市教育志办公室）

日寇统治时期的一次金银建风潮

郭习朴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旅大，建立了殖民地统治机构“关东厅”（原为关东都督府）。继而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财阀，接踵来大连开设洋行和银行。当地中国人民除极少数工商业者外，只有靠出卖劳动力，当苦力谋生，境况苦不堪言。

我的父亲郭精义，早先在金州城学生意。满徒后，在大连湾开设日用杂货铺。大连码头修成后，我父亲是最早一个到大连西岗区，旧名下洼子，开设油坊和杂货铺的。不久，又在码头附近开设一个大油坊，厂名叫福顺成油坊。后来工厂扩建，改名为福顺厚油坊。同时又在中山区开设福顺厚代理店、特产商、银号、木厂、浴池等。当时中国工商界人士为了自身的利益，共同组织了一个社会团体，叫大连华商公议会（原称大连公议会）。大家推选刘子衡为会长，郭精义为副会长。后来刘会长病故，才选我父亲为会长，李子明为副会长。

做生意要靠货币作流通手段。中国人习惯以银元为本位，用的是大洋钱小洋钱，而日本则以金元为本位。出于垄断和掠夺的目的，当时关东州内通用一种朝鲜银行印制的纸币，俗称“朝鲜票”或“老头票”（日本国内只通用日本帝国银行印制的纸币，“朝鲜票”亦不好使用）。拿我们的银元到州内日本人商店去买东西，他们不卖，得先把银元兑换成朝鲜票：可是用朝鲜票到中国人商店买东西，却可以，不卖也不行。1921年关东厅长官山县伊三郎突然下令，

要关东州内中国工商业者手中的银元，限期兑换朝鲜银行印制的纸币，到期不换，银元作废，禁止在市面上流通，届时如有发现使用者，以犯罪论处（银元被没收，人还得坐牢）。当时还规定，一元银币，兑换朝鲜票七角钱。这样，我们工商业者一百元钱的资本，只剩下七十元钱了，损失的三十元钱，无形中就给朝鲜银行剥削去了。于是引起了广大工商界人士以及人民群众的反对和抵制。大家汇集到大连华商公议会，一起研究对策。为此，我父亲郭会长，曾数次到旅顺，向关东厅官员申述民意；讲理不成，又申请放宽执行兑换纸币的限期。日本官员答复说，这是日本天皇的旨意，政策既定，谁也不得违抗。从此，大连闹起了“金银建”风潮，有赞成金建（金本位）的，也有赞成银建（银本位）的，两派进行了斗争。日本人也有拥护银建制的，主要是开设油坊、特产商的资本家；中国人也有拥护金建制的，主要是那些追随日本人做生意的买办阶级，或在日本洋行里做事的。在新闻界也分两派，如大连新闻、每日新闻，是赞成金建制的；泰东日报、关东报，是拥护银建制的。如果有负债欠钱的，也应以朝鲜票偿还，否则，到衙门打官司，拒绝用朝鲜票付债者就得输。总的来说，赞成金建的人数多，占上风。

当时，公议会曾把这一情况，向中国中央政府和奉天张作霖，都反映汇报过，并要求政府出面，同本当局交涉。但是，他们只顾自己，不顾人民疾苦；他们不想管，也不敢管。于是大家只好依靠自己的团结，共商对策，大连华商公议会内，整天议论纷纷。

这时警察署突然派了四名武装警察，前来对我父亲说，警察署长命令我们来保护郭会长的生命安全，因为近来市面不太平，坏人很多。实际上就是把我父亲看管起来了，目的是叫人看了害怕，不敢为金银建问题起哄闹事。打这以后，我父亲到哪里办公，警察就“保护”到哪里。记得有一次，在我家码头东油坊柜上，警察在柜台外站着，我父亲在柜台里很严肃地对他们说，我是买卖人，没有仇人，没有人要暗害我，请回去报告你们的署长，我不需要保护，如果再这样保护下去，我的买卖也下能做了，什么事也不能办了，群众看见警察害怕，谁还能接近我同我办事，请你们转告署长，谢谢他的好意。从那以后，

日本武装警察撤回了，可警察署又改派便衣警察，暗地跟踪监视。再者，关东厅下令把副会长李子明驱逐出“境”。李会长无奈，只好全家搬到营口，住在日升栈代理店。我父亲闻知后，领着我到营口去探望。那时我虽然才八岁，但至今记忆犹新。

从营口回连后，华商公议会以全市工商业者的名义，在泰华楼菜馆，设宴招待关东厅官员。山县长官以及各部部长和全体官员都参加了。我父亲为了调和气氛，疏通关系，特向官厅日本翻译说，请求山县长官照顾中国工商业者的实际困难，能缓期兑换纸币。可是，日本翻译故意不照我父亲的原话翻译，却以强硬的言语对官厅长官表态。结果，一个大件菜没有吃完，就全体起立，秘书官代替山县长官发言，说今天是你中国工商界人宴请我们官府长官的，餐厅不是办公的地方，有事你们明天到官厅去办理，有话再讲。宾主不欢而散。次日，关东厅下令，对全市不赞成金建的人，全部逮捕，关押起来问罪。

我父亲身为大连华商公议会会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遂组织请愿团，准备到东京向日本政府请愿。因山县长官是日本天皇的亲戚，日本有公、侯、伯、子、男五大爵，山县长官是伯爵，不告御状，不向大正天皇请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时组织工商各界人士共八十余人，华商公议会成员每家派一名代表参加，大家共同推举我父亲为请愿团团长，带领全体成员赴日。福昌公司经理相生由太郎，全靠剥削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起家，后来发了大财，在日本当选为代议士。国会里有发言权。由于他的营业，全是雇佣中国人苦力，所以他也赞成银建制，支持我们到日本去请愿，并且他和其他几位有影响的日本人，也加入了请愿团，为我们作向导。我是六岁丧母的，因为父亲只我一个男孩，余下都是姐妹，所以我父亲到哪办公都领着我，那年才八岁，父亲也带我赴日本。

请愿团组织后，我们先到奉天去见张作霖，再一次要求他支持和援助我

们。他说的很好听，却没有行动，结果请愿团八十余名团员，次日买火车票时只剩下六十人了，其余人思想有顾虑不参加了。

请愿团在出发前一天，全市工商界代表人士，在泰华楼菜馆为请愿团出国举行了欢送宴会，宴会上大家情绪热烈，正在边议边吃时，突然后面飞来一粒子弹，从我父亲耳边扫过，打在门框上。在这同时，全楼电灯熄灭。这时，菜馆人员一面打电话报告警察署，一面打电话请电业局来修理。不久，警察来了，侦查结果，子弹是从对面二楼打来的。对面楼是广生行化妆品商店，他家的雪花膏、花露水最出名。经搜查，凶手没有抓到。广生行与泰华楼相对，马路中有两条电车道相隔，坏人不知从何处逃走。

次日，市工商界在火车站欢送请愿团。请愿团到达奉天后向张大帅告别，并再一次要求他支援。接着我们便乘安奉线火车到安东（今丹东），然后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那时朝鲜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成“第二日本”了，姓日本姓，读日本书，说日本话。自朝鲜乘船到日本，在神户港下船，换乘火车经大阪，到达东京。

请愿来到东京，找了个最大旅馆住下。我父亲即把请愿文件送到外务省，请外务省转交内务省。由于没有见到外务省大臣，就把文件交给秘书官。他叫我们等候听信。可是一直等了两个多月也没有消息，也不见官员来接见我们。于是我们到外务省询问，回答说，大臣公事忙，不在。我们再到公馆找，守卫人员不给传达。六十多人的吃住费用，虽然是大连工商界共同出资的，但住长了，也实在花不起。如果找不到首长，没有个答复就回去，山县长官更不能容忍我们，说不定生命财产都得全部完蛋。就这样走也为难，不走也为难，我父亲非常苦闷焦急，便带领骨干人员去参观日本名胜古迹。一日，我们到当时日本最大的公园，日比古公园游览。那天正好下细雨。出公园上汽车，司机是日本人，知道我们请愿团要找外务大臣。这时，正好后面来了一辆大型汽车，司机指着说，这辆就是外务省大臣的专用汽车，车内坐的可能就是大臣。我父亲便叫司机加快速度，赶上去。双方汽车都刹住，我父亲下车直接递上名片，并对大臣说，我是中国请愿团的，有请愿文件交到外务省，已由秘书官收下，不

知大臣见到否？大臣说，没见到，只见到报纸登载，说关东州中国工商界人士要到日本来请愿，不知你们请愿团何时来的？我父亲说，我们来了两个多月了。大臣说，我到官厅查找你们的文件，以便处理。日本人相生由太郎联系几名有钱有名望的日本人士也作了一些工作，在国会上反映了关东州内中国工商界的一些情况。另一方面又找了内阁中有权威的官员，求他们向大正天皇反映中国请愿团的情况。我父亲花了不少钱和自己的古董，去运动这些官老爷。后来大正天皇下诏，召见中国工商界请愿团团长郭精义，由大臣领入宫廷，说是大正天皇要亲自问话，处理这个事件。由于关东州的重要战略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基地，因此天皇很重视，在接见之后便下达命令，把关东厅长官山县调回本国，关东州内实行“金、银”并用政策，不管哪个国家的钱，都可通用，可以到国际市场和大连钱钞取引所兑换，要把大连建设成为自由贸易港，外商来往自由，特别是要发展中国人在关东州内的私人工商业，政府可以多收税款。请愿结束后，请愿团即启程返连。

记得刚到东京不到十天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吃东西吃坏了肚子，深夜十二点以后拉裤子，父亲领我到便所内浴盆换洗衣服。这时有人从旅馆窗户跳入，手中持有我父亲的相片，到处搜找请愿团郭团长。由于那时我们正在便所内更换衣服，没被找着，后被旅馆人员发觉，报告京都警视厅，来了警察人员，可那个坏人早已跑得没有踪影了。这件事我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

请愿团在回国之前，首先打电报给华商公议会，告诉了胜利的消息以及回国的日期。等我们乘船回到大连时，全市工商界人士和许多市民都在码头欢迎，情绪很高。

不久，我父亲又到奉天向张大帅汇报请愿团的一切经过，并以书面材料向南京政府汇报胜利的情况。

我父亲在去日本之前，曾在大连北大山通（即现在往胜利桥去的大街）久保田牙科医院，医治过牙病，同时镶了金牙套。自奉天回来后，感到金牙套不合适，吃饭时常常牙疼。于是又去找久保田院长修治。当时只有久保田、日本女护士和我三个人在场。我站在父亲前面，父亲对院长说，你这次给我镶的牙套不合适，吃东西痛。院长说，不要紧，可以修理，给你再打上一支止痛针就好了。当时我见久保田拿一个很小注射针管，管内的药水是黑紫色的，给我父亲注射在牙床上。后来有人宴请我父亲，地点在大东酒家楼上（我也去了，是和司机一起在楼下吃的）。没到一个小时，我父亲就说回家。到家后，什么话也没有说，就不省人事了。我继母知道我父亲是牙痛病，有人猜测是患牙疔，可以弄偏方吃（用蛇蜕泡烧酒漱口）。可是亦不见好。后来给送到铁路医院，院长是日本人纯上医学博士。他亲自负责抢救，在十个手指头上放血检查，只见血都变成黑紫色了。院长说，病情很严重，你们来晚了，不能治了，回家吧。就这样，我们刚回到家，父亲就故去了。那时我父亲才五十六岁，平时身体健康，什么病也没有，故去那一天正是 1922 年 11 月 13 日。

父亲去世那年我才九岁，对社会上一切事物没有经验和知识，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经过几十个春秋，深感父亲的死，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事情正好发生在请愿胜利、山县调职之时。

我所知道的满洲兴业银行

孙耀庭口述 黄本仁整理

一、满洲兴业银行的性质

伪满洲兴业银行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得力工具。它是根据 1936 年（伪满康德三年）12 月 3 日，伪“满洲国”敕令第 172 号而成立的特殊银行，于 1937 年（伪满康德四年）1 月 1 日正式开业。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把东三省的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省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广信公司以及旧军阀官僚储存的金银，大部分被抢走运往日本。同时对张氏父子控制东北时发行之奉票，以及永衡官帖、广信公司官帖等，宣布作废，禁止流通，代之以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之纸币。从表面上看来，币制是统一了，实际上这种纸币是不兑现的，根本没有金银硬货作物质基础。币面虽然印着可以兑换朝鲜银行发行之纸币，而朝鲜银行券券面上，也印着可以兑换日本银行发行之纸币，如此一个一个地转，最后转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央银行那里。这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日本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根本就不能兑换金银硬货，同样是不能兑现的纸币。这种没有物质基础作后盾的纸币强行发行，而且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关系，确是史无前例的。这充分反映了伪“满洲国”政权的傀儡性和经济上完全处于附庸的地位。

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之不兑现纸币，1936 年是二亿五千四百二十四万三千元，到了 1941 年激增到十二亿六千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元，增长了百分之三百九十六点二。它发行的辅币（铸货），也由 1936 年的二千零四十四万九千元

增加到五千五百四十九万七千元，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一一点四。

伪满洲中央银行为了便利一般金融业务和筹集长期低利资金以开发各种产业，要求设立一个专门金融机构为其服务，而满洲兴业银行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建立的。1937年1月1日起经伪“满洲国”政府批准，将原满洲银行、满洲商业银行、正隆银行、辽东银行及其分支行，全部合并于满洲兴业银行。

《满洲兴业银行法》第一条明文规定，“政府为了金融之圆滑，供给开发产业的必要资金，故使之设立满洲兴业银行也。”该行《营业指南》上亦说：“满洲国建国以来至今六年有余，产业之开发，经济建设与进展，均有惊人成绩，而随同产业开发之进展，资金之需要亦飞跃的增加，筹划此项资金，即系我国金融界所负担之重大使命，顺应此项重大使命与责任而所诞生者，则为我满洲兴业银行也。”

据上所述，满洲兴业银行建立的原因和它的建行宗旨、业务内容，都已表达得一清二楚了。

二、 满洲兴业银行之组织概况

1937年12月伪“满洲国”政府宣布所谓撤消治外法权，将原“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完全接收，所有设在原“满铁”附属地的各种金融机构，均被合并于满洲兴业银行之各分支行。

1938年11月，伪“满洲国”公布《新银行法》，对东北地区的银行进行整顿。原来具有发行纸币特权的朝鲜银行，具有汇兑特权的横滨正金银行，以不动产为特点的东洋拓殖会社等金融机构，因为它们在金融界影响很大，所以在这次整顿时，对它们原有的职能和活动范围，均作了适当的限制，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满洲中央银行对东北金融的管理作用，也相应提高了满洲兴业银行之威信和扩大了它的业务活动，使满洲兴业银行成为名符其实的满洲第二大银行。而其它银行，均属一般普通银行，不再享有任何特权。到1941年末，东

北普通银行有“日系”银行十所，“华系”银行十七所，“欧美系”银行三所。各地普遍设立了兴农合作社、金融组合和无尽会社（即专办零存整取、整借零还业务）等金融机构。

满洲兴业银行虽然名义上是官民合办的（股份有限限制），但实质上却是有官无民，本身不能独立行事，完全听命于伪“满洲国”政府经济部的。根据《满洲兴业银行法》规定：“总裁、副总裁、理事、监事均由政府任命之。”（第九条）；“对总裁、副总裁、理事、监事有违反法令章程或经济部大臣的命令时，经济部大臣有权可将其解任之”（第三十四条）；“政府可在监事中指定一人为常务者”（第十二条）；“经济部大臣对有关该行业务之监督或有关公益事项可发出必要之命令”（第三十一条）；“总裁、副总裁，理事、监事的报酬及津贴由政府定之”（第十二条）；“凡变动银行章程，处理赢余，合并或解散等决议，未经经济部大臣之认可，一律无效”（第三十三条）；“经济部大臣得设满洲兴业银行监理官，使之监理银行之业务”（第三十六条）；“监理官可随时检查该银行之金库、账目及文件”（第三十七条）等等。以上各条表明，经济部大臣是满洲兴业银行之主宰者。但掌握真正实权的，并非经济部大臣，而是日本侵略者委派之经济部次官，经济部大臣仅是徒有虚名之傀儡。

满洲兴业银行的领导层，表面上虽是伪满政府任命，但实际上也全由日本侵略者控制。该行设总裁、副总裁各一人，理事五人，监事三人，任期都是三年。首任总裁是富田勇太郎、次任是冈田信。副总裁首任是松原纯一、次任是葆康。首任理事为松田义雄、一色信一、高桥武夫、乌潭生等，次任理事为箱绮文雄、斋藤宣吉、桑尾胜雪。孙征、德楞额。首任监事为启彬、张本政、永井四郎，次任监事为色部贡、魏宗莲、岸严。日本侵略者为了欺骗东北人民，也指派了少数中国人充当该行的理、监事，但这只不过是摆摆门面而已。他们

有职无权，遇事无不仰承日本主子之鼻息。

满洲兴业银行设有总管理处，名曰本部。经过多次变动，最后定为十二个课，即秘书课、人事课、监察课、考查课、资金课、普通金融第一课、普通金融第二课、特别金融第一课、特别金融第二课、鉴定课、计核课和庶务课。各课课长人选，非日本人莫属，没有一个是中国人任课长的。业务实权均操于日本人之手。

满洲兴业银行营业网之设置，在 1937 年开业当时，总行在长春（伪满称之为新京），下设分行三十六处，支行十处，分支行共四十六处；到 1942 年 3 月末止，分行增为五十一处，支行仍为十处，分支行共为六十一处。全行行员人数，1937 年开业时行员为八百零三人，雇佣员三百六十五人，合计为一千一百六十八人；到 1942 年初，行员增加到一千四百九十二人，雇佣员增加到九百二十六人，共为二千四百一十八人。

三、满洲兴业银行之业务内容

满洲兴业银行的股本定为三千万元，尔后又增加到六千万元。其中伪“满洲国”投资一千五百万元，其余则以民间股东形式认购，因而名曰官民合办的股份有限制。

满洲兴业银行为掠夺东北人民之血汗，大量发行满洲兴业债券，以取得无本低息之资金。该行根据《满洲兴业银行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可以在其缴讫资本金额的十五倍发行满洲兴业债券。”利用发行债券所获得之资金，开放高利率有抵押之信贷。吸取这种资金越多，放款也越多。这种债券的还本，规定为固定期间五年以后，五十年之内偿还之。这实际上变成了在五十五年之内偿还，并且是以抽签形式分期还付本金的。这种满洲兴业债券，还本时间之长，打破世界上各资本主义国家债券的最高记录，从而也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进行经济掠夺之贪婪野心。

满洲兴业银行又以“回收游资”为名，开办有奖储蓄形式的储蓄债券。但其吸收的资金，远远不能与兴业债券相比。兴业债券 1938 年第一次发行额为一千万元，到 1942 年上半年发行额已增到一亿一千四百三十五万元，而其还本额只有八十五万元；而储蓄债券 1941 年下半年起先后发行十次，金额共达二千七百八十万三千元，其还本额为五万六千元。

满洲兴业银行在普通存放款方面，到 1941 年末，各种存款共达九亿八千五百零三万八千元，超过该行股本的十六倍多。如加上各种债券所吸收的资金，总数是十一亿二千六百二十八万余元，超过缴讫股本的十七倍多。

满洲兴业银行在放款方面，1941 年放款总额是十亿九千一百九十八万六千元。其中包括票据贴现四亿四千五百二十二万元，借据放款七百零八万七千元，往来存款透支一亿四千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元，公用放款四千二百六十四万五千元，整放零还放款二千八百七十八万四千元，定期放款三亿三千九百七十五万元，票据贴现七千八百四十六万四千元，押汇放款四百二十一万一千元。仅在 1941 年下半年这个极短时期内，该行收入利息就达三千二百八十五万余元，而支出利息只有一千零十六万三千余元，利息差额收入竟高达二千二百六十八万七千余元。其盘剥经营之狠，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低息存款高利发放的做法，就是该行进行“钱扒皮”的一种经常手段。放款利息多高于存款利息的一倍以上，如长期存款利率每千元日息一角，活期存款每千元日息二分，特别活期存款每千元日息六分，而放款利率千元日息竟达二角，最低亦在一角五分左右。而低息存款则占该行存款额的百分之六十六。

再就满洲兴业银行流动资金来看，1941 年末，缴讫资本是三千万元，而存入伪满中央银行的存款是二千三百四十万七千元，库存现款是一千一百一十八万六千元，合计为三千四百五十九万三千元，超过股本四百五十九万三千元，而其信贷总额却将近十一亿元。信贷资金来源不是利用股本，全凭吸收存款和

发行债券的低利资金。该行庞大的信贷数字，看起来是动用了庞大的现款，但实际上是以支票换兑、无本取利的巧妙办法搞起来的。在吸收存款中间，有长期、活期的不同。存户经常是此取彼存，一般不会同时提取，即使交易需要，亦很少动用现款，而是采用支票换兑的办法。支票换兑，一般是放款增加，存款亦增加，很少动用现金的。在信贷存立时，也多是转账拨入借款人的存户内，只起转一笔账的作用，丝毫不影响其股本金额。借口吸收游资，实际上就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掠夺。伪“满洲国”实行金融统制以后，在业务上更是无人与之竞争。从表面上看，满洲兴业银行资金雄厚，而事实上，它并无多大资金，全凭欺骗掠夺、榨取人民的财富而积累起家的。

满洲兴业银行的存放款与同行比较，可以看出其发展速度之快。据 1937 年上半年统计，全东北各银行总存款是六亿八千一百四十六万元，其中满洲兴业银行是二亿一千一百一十三万七千元，占百分之三十一。放款方面，东北各银行是五亿八千八百三十一万元，其中满洲兴业银行是一亿八千六百二十八万四千元，占百分之三十一。点六六。到一九四一年年末，全东北各银行存款是二十三亿四千四百零二万六千元，其中满洲兴业银行就有九亿八千五百零三万八千元，占百分之四十二。全东北各银行放款是三十亿三千二百三十二万三千元，其中满洲兴业银行就有十亿九千一百九十八万六千元，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七六。由此可见满洲兴业银行在全东北金融界所处的重要地位。

四、 满洲兴业银行“开发产业”的真相

满洲兴业银行从它开业的那一天起，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经济侵略的得力工具。就满洲兴业银行所谓发放的信贷用途来分析，一九四一年总信贷额为十亿九千一百九十八万六千元。其中工业贷款占百分之三十一，矿业贷款占百分之八点二，建筑业贷款占百分之十九点一，商业贷款占百分之十八点八，特产业占百分之七点三，其它行业贷款占百分之十五点六。这就不难看出，满

洲兴业银行是以开发工矿业为重点，其目的就是以“开发产业”为名，行疯狂掠夺我东北丰富资源之实。

日本帝国主义从 1937 年到 1941 年在我东北矿工业方面开发有较快的发展，什么特殊公司、准特殊公司、投资公司等名目繁多的企业组织相继成立，出现未曾有过的所谓“产业勃兴时期”。如 1937 年，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投资额总计是三亿五千二百三十二万元，到了 1942 年则猛增到四十一亿八千九百一十五万元，较前个五年超过了十倍多。这些资金大部分是由满洲兴业银行所榨取的厚利来支付的。特别是 1937 年 12 月创立“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后，将原有和新建的钢铁业、煤炭、矿业、轻金属工业、汽车、航空机制造业等都集中归该公司统一经营管理，成为综合性的企业组织。日寇企图把我东北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基地，为其侵略扩张主义服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利用满洲兴业银行榨取来的资金，从开发东北产业逐步转向扩充国防资材的生产，也就是军工生产。把东北地区的财力物力完全提供于日寇的侵略战争，作为它强有力的后方军需补给基地。与此同时，满洲兴业银行为了维护其所谓除开发矿业外，还要扶持什么交通、通信、农牧业的发展，因此对农业、粮食业和中小工商业进行贷款。1937 年工商业信贷资金为八千九百七十八万七千元，到 1941 年增加到二亿零八百二十五万九千元。从表面上看，这是有利于农、工、商业的发展的，但实际上满洲兴业银行是坐收佣金之利，从中掠夺了大量财富，以供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作为庞大军费所需。

满洲兴业银行还在房地产业上投资而获得了大量钱财。对建房主可按建筑费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给予长期信贷来吸引顾客，竣工后将全部建筑抵押给银行，并从中获取高额利息。

日本侵略者为了应付庞大的军需开支，1942 年在日本国内发动了“报国百

亿元储蓄运动”，满洲兴业银行亦积极配合，发起“国民储蓄实践活动”。仅1942年下半年一个极短时间内就吸收储蓄款十五亿元。总之，满洲兴业银行除开办长期存放款业务外，各种有利于殖民者之金融业务，它都积极经办，没有哪家银行能和它竞争。

满洲兴业银行名义上是“满洲国”之银行，而行中一切大权均操诸日人之手。行内各项制度完全日化，连日常讲话亦完全用日语。华籍行员大都位于下层，工资待遇均较日籍人员低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还时时受到歧视和压迫。如行中有设备良好之大食堂，但只准日籍人员就餐，严禁华籍行员入内。类似这种情况很多，此中苦况，非局外人所能知者。

注：

①本文口述者孙耀庭原在满洲兴业银行大连分行担任襄理职务。

②本文所有“引语”和统计数字，均摘自1937年至1943年出版之《满洲兴业银行金融月报汇刊》。

（大连市工商联文史办公室供稿）

一起政治谋杀案

史 志

1947年3月，正当解放战争处于如火如荼之际，在大连县小平岛区栾金村发生了一起政治谋杀案。年仅29岁的小平岛区青年大队长、共产党员李庆和，被反动分子残酷杀害。经人民公安机关积极而缜密的侦查，迅速地破获，凶手无一漏网，均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水井里的浮尸

1947年7月24日，大连县小平岛公安分所副所长刘洪德正准备到栾金村去，见一个群众急匆匆地向派出所跑来，进门就喊：“所长，我早晨到村西菜园水井去挑水，见里边漂着一具尸体……”。

刘所长立即将情况报告给大连县公安局后，带领民警赶到现场。当他们把尸体捞上井台时，县局局长邵相俟带领侦辑股长刘长青等也迅速赶到。尸体被装在一条麻袋里，头部由硬器击伤，面部模糊不清，口内塞有棉团，绳子紧勒颈部，双手、双腿均用绳子捆绑着。经群众辨认，正是三月间失踪的小平岛区青年大队长李庆和的尸体。

消息一经传出，群众纷纷要求“捉拿凶手！为死难者报仇！”

李庆和同志于1946年春担任小平岛区栾金村青年大队长，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月调小平岛区任青年大队长。他在任职期间，立场坚定，敌我分明，斗争勇敢，是当地有威信的青年干部。同年3月2日下午，李庆和到区里参加区政府召开的“鲁南大捷”座谈会，天黑后从小平岛公安分所

回栾金村，从那以后，人们便再未见到他。区长发现李庆和失踪后，曾组织干部、群众到处查访，但是四个多月来一直未有下落。

经过对尸体的检验和对案情的分析，认为李庆和的被杀，不象是一般的刑事杀人，很可能是一起政治谋杀案。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严惩作案凶手，县公安局当即决定，由侦缉股长刘长青、治安股副股长羽明负责，组成六人侦破组，迅速开展侦破工作。县局局长邵相俟同志强调：“一定要抓紧时机，及早破案，打击敌人，安定民生。”

查找第一现场

侦破组的同志分析：李庆和身强力壮，非一人可以杀害得了，一定是一伙人纠合作案！再从对尸体检查和现场的情况来看，凶杀李庆和的第一现场也不是井旁！于是决定深入侦查，先查明第一现场，发现破案线索，进而突破全案。

栾金村菜园，解放前是大汉奸张本政的菜园子，占地十几亩。园中一口直径三米的浇菜用的水井，离菜园里的南北小路有 15 米。在菜园的西南 35 米处，有看管菜园用的一处房屋，解放后改建为食品杂货店——栾金村青年合作社。菜园离住户集中的村子很远，合作社的周围又别无其它房舍，那么第一现场会不会就在这里？

刘长青来到菜园里，一边环视四周，一边思索着。他在井旁蹲了下来，仔细地反复查看裹尸的麻袋、麻绳和一块坠尸用的石头。他发现麻袋、绳子，都是新使用的，绳子的两端是用刀子割断的，因而联想到这麻袋、绳子是不是青年合作社出售的？于是，侦破组的同志对青年合作社经销麻袋和麻绳的情况，认真地开展了调查。经青年合作社职工的回忆和查对底账，三月份前没有出售过麻袋。但经个别走访，终于在一个卖土杂品的售货员那里得知：“今年三月底在盘点货品时，发现少了一条麻袋，到现在也没有下账。”根据这一情况，

侦破组的同志经过详细分析研究，认为这一线索很重要，青年合作社很可能就是第一现场，而杀害李庆和的凶手，也很可能有青年合作社的职工。

访问姜老汉

刘长青和羽明同志带领侦察员们，身着便衣，串门越户，到田间，去海边，找群众谈，与村民唠，几乎遍访了全村男女老少。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农反映：“村里姜子玉有一次和我闲谈，转弯抹角地漏了一点李庆和被杀的情况，可又没说清楚，能不能对你们讲就不好说了。”

这一情况引起了侦破组的极大关注，为进一步弄清情况，刘长青和羽明一起找到了姜家。见姜家是村里距青年合作社最近的，五间草房，姜子玉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汉。老汉见有人来，忙打招呼让座。刘长青和蔼地说：“我们是区里的，想请你老人家谈谈李庆和被害的事。”姜老汉一听，面色顿时显出惊讶之状，停一会儿说：“我年岁大了，不知道外边的事，也不去问，只听说老李家的大小子让人给害死了。”羽明忙接着说：“你老人家若知道这个事，就请你给我们讲讲吧。”老汉犹豫了一会儿，欲言又止，最后矢口否认：“我什么也不知道呀。”说完便收拾起院里的农具来。刘、羽见状，只好离开了姜家。

第二天大清早，刘长青和羽明身着警服又来到了姜家门口，正赶上姜老汉拿着锄头准备下地，看见门前站着两位警官，仔细一看，原来是昨晚来的那两个人，便忙让进屋里。“我们今天是向老人家道歉的。昨天我们是到别处工作，顺便到你这里，本想请教，可又没说明身份。实在抱歉，请多原谅。”刘长青这一席话，说得姜老汉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都怪我们不检点，要谈李庆和被害的事，哪能在院子里谈，难怪你有想法。”羽明再一次表示歉意。

“这话确实不假，一来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和全村的人都处得挺好，得罪了谁都不好；二来要是我看错了，说错了，对别人也不好；三来说了之后，若是传出去，我就更不好办了。”姜老汉说出了心里话。

“只要你把知道的情况给我们说一说，我们一定给你保密，你就放心好了。”羽明迎合着。

姜老汉脸上显出了放心的样子。慢慢地回忆道：“今年开春，有一天我去合作社买东西，在合作社里有人和李庆和争吵，李庆和出去后，有人在里边说‘李庆和这小子不讲人情，非整死他不可！’听那话音是俺村的郭永通。”姜子玉停了片刻又接着说：“估计是今年三月初，我半夜出去解手。看到菜园子里有手电筒光在闪动。仔细看有几个人在大井边上，好象是在往里扔东西。当那几个人走过来时，我见里边有一个好象是村里的林启忠……”

拘 审 刘 仁 德、刘 树 荣

当侦破组从老汉那里获得了重大线索后，接着农会主任包恩昌把在群众中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侦破组作了汇报：“青年合作社的会计郭永通和农民刘仁德、刘树荣、郭光臣经常到林启忠家去。行为鬼鬼祟祟，有时林的老婆还在外面望风。”又反映说：“近来，刘仁德、刘树荣表现很反常，每当见了村干部，都躲着走。再是，村里发现了李庆和的尸体后，青年合作社会计郭永通和郭光臣也去向不明。

侦破组对所获的情况，经过分析，断定青年合作社会计郭永通、社员郭光臣此时此刻去向不明，他们很可能就是杀害李庆和的凶手，为逃避惩处而逃匿；村民刘仁德、刘树荣和林启忠，可能是他们的同伙。于是，侦破组与小平岛分所决定，以向李庆和遗体告别为由，组织全村青年围绕李庆和的遗体环行

一周，从中注意观察二刘的动态。

当刘仁德、刘树荣混夹在群众队伍里缓缓地走近李庆和的遗体时，见刘仁德面色突然变白，双腿颤抖起来，绕行不到半圈，竟一下瘫倒在地，被群众拉起后蹒跚地继续随行着。刘树荣虽极力地控制着自己，假装镇静，但当其走到李庆和的尸体旁，两眼刚一触及尸体便即刻移开，不敢正视，表情极不正常。这种极为反常的表现，使侦破组确认原来的判断是正确的。经请示县局领导同意，决定将二刘进行拘留审查。

传讯林启忠

在拘留了二刘的同时，侦破组鉴于林启忠原是一个普通农民，自结识了郭永通和刘仁德等一伙以后，与之拉拉扯扯，逐渐变得荒唐起来。为尽快突破这起谋杀案，即传讯林启忠，以便打开缺口，扩大线索。

林启忠被带进了县公安局的传讯室。他见室内端坐着几名警察，个个衣着整齐，态度严峻，不觉打了个冷颤，神情十分紧张。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你坐下。现在你把自己所做的坏事向政府交代！”坐在正中的刘长青声调平稳地发问。而林启忠却颤抖着双腿说：“我，我没做什么坏事……”“那么都是谁常到你家，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刘长青追问了一句。林脸色发青，吱唔地说：“没，没有。我家没有人去过。”刘长青一拍桌子，厉声说：“撒谎！”这时，看押警士按事先安排进门报告：“报告，郭永通已经……”刘长青把手一摆：“知道了，把监所看好！”这报告和回答含含糊糊，林启忠听后，低垂的头上竟滴下了汗珠。骤然，他站了起来，有气无力地说：“我讲了，政府能宽大我吗？”“只要老实交代，政府一定从宽处理。”刘长青坚定地回答。这时，林启忠边流泪边说：“我去年被刘仁德拉拢参加了国民党，今

年二月里郭永通、郭光臣、刘仁德、刘树荣在我家说：李庆和在区上不讲人情，他在村里住，我们没法活动，一定要整死他。后来听郭光臣说，李庆和是他们四个人打死的。怎么杀害的我不知道。”

擒凶犯案情大白

根据林启忠的交代，姜子玉的旁证，县公安局对刘仁德和刘树荣由拘留立即转为逮捕。经过突审，二犯供认了全部犯罪事实，逃往外地隐匿的杀人主犯郭永通及其同伙郭光臣也被追捕归案，一起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政治谋杀案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在 1946 年 12 月，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一一三党部骨干分子刘醒明潜入栾金村，先后秘密发展郭永通、刘仁德、郭光臣、刘树荣和林启忠等人加入国民党，并布置他们搜集情报，暗杀共产党干部的任务。因小平岗区青年大队长李庆和立场坚定，敌我分明，工作认真，斗争性强，成了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最大障碍，便多次策划杀害李庆和，以向他们的上司报功。从 1947 年 2 月中旬开始，他们一连数日在林启忠家密谋，曾拟用毒药毒死，用炸药炸死或用枪打死等，都因没有得到机会而未能得逞。3 月 2 日晚，郭永通、郭光臣、刘仁德和刘树荣四人聚集在青年合作社，正逢李庆和从那里经过，便借捡到两头猪，问如何处理为由，将李骗到合作社办公室。郭永通将大门锁上并在院内放哨，刘仁德趁李庆和不备，用木棒将李打倒，刘树荣用破枪筒朝李头部连击，郭光臣狠掐李的脖子。李庆和身死后，他们又把棉花塞在李的嘴里，用麻绳紧紧勒住李的脖子，捆住双手双腿，将李的尸体装在麻袋里，清扫了杀人现场，销毁了杀人凶器。当凌晨 3 点左右，他们将李庆和的尸体抬到栾金村的菜园投入水井之中。

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终将逃不出复灭的下场，这便是历史的必然。

(大连市公安局史志室供稿)

一支反动武装是怎样转变为革命武装的

——记解放初期对金县公安局保安队夺权改编的斗争史实

徐 攻 玉

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山东八路军在党中央“进军东北”的号令下，为解放祖国的这块大好河山，在九月间相继自山东渡海来辽南地区。先遣的胶东部队在陈迈谦、赵恩光等同志领导下，先后进驻了皮口、庄河、普兰店、瓦房店等县城和较大的市镇。但是大连、旅顺、金州因有苏军根据“中苏条约”驻守，所以我们的军队，一时没能进入。当时，金州城除驻有苏军外，还有当地一些伪职和绅商头面人物组织的“维持会”，以及经苏军允许存在的金县公安局和保安大队。参加保安队的基层人员多是一些当地职工，学生和失业游民，而领导权则被几个兵痞恶棍所把持。公安局长是苏军任命的刘希文，他原是苏军使用的一个翻译，任职后只顾捞钱，不大过问局中事务。保安大队长邓德山，是个实权人物，过去曾在山东参加过反动军队，做过买卖，学会一套掌握武力，拉帮结伙，纵恶作弊，祸害群众的手段。日本投降前夕，他在山东老家混不下去了，就跑到大连来避风，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日本投降后，经他在金州搞小生意的儿子邓本礼的谋划，在金县搞武装。邓德山也瞅准了金县是块肥肉，就从寺儿沟带了几个人来到金县，当即拉起几十个人，谎称是朱德派来的八路军，从而骗取了苏军的信任。九月十三日，苏军司令部同意让他们维持社会治安，并发给部分步枪和手枪，由苏军带领他们到原敌伪金州警察署去缴了日本警察的全部武器，接管了治安权，成立了金县公安局和下属保安大队。邓德山任大队长，他的儿子邓本礼当上一中队

长，他的弟弟邓维美当了三中队长，亲信薛维伦当了二中队长（后来和苏军配给武装的“维持会”自卫队合并，由赵寿梦任二中队长）。

就这样，使金县保安队从一成立起就成了名符其实的邓家兵。当时公安局名义上是“维持会”的所属部门，实际兵权就在邓家父子手中，“维持会”根本管不了。而保安队虽说是公安局的下属部门，邓却是公安局的“太上皇”，一切都是邓德山说了算。由于保安队拥有武装，他们一伙又都流氓成性，虽然代替了日本统治者，可仍骑在金州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做了很多坏事，压得群众抬不起头来。邓德山正事不干，天天骑着高头大马，身后护兵马弁一大串，招摇过市，向群众显示威风，十足的“山大王”气派。他们纵赌嫖娼，盗取金州“内外绵”工厂（金纺）大量棉纱和棉布，还从各处窃取大量皮革和汽油，把公物变成私财。甚至贩运烟土，毒害人民，至于无故欺压老百姓，强取暴敛的事，就更难以说清了。他们还仇视共产党，恶毒地进行反共宣传，阻拦我方人员进出大连，并串通国民党，天天盼待“中央军”来接收，以便找到更稳当的靠山。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为早日解除金州人民的痛苦，使金县得以彻底解放，从而打通进出大连的通道，使更多的干部和物资可以平安过境，支援整个东北的解放斗争，辽南部队决定在十月十日，武力接收金州。那天，驻普兰店的我军一部，由支队司令员赵恩光率领，乘卡车进入金州。经过短时间的战斗，控制了三座城门，同时解除了公安局保安队大部分武装。但由于和苏军司令部没有联系好，金县保安队驻南站的一中队又伏击了我军指挥部车队，使我军人员和物资受到较大的损失，并引起了苏军的出面干预，致使这次军事接受行动归于失败，我军退回普兰店。

从这次失败中，我党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认为在苏军驻军的条件下，我们采取公开的军事手段去接收金州是不现实的；只有采取灵活手法，打通苏军关系，运用政治策略，才能适应当前的斗争形势。于是作出了由辽南部队和大连党组织重新组织力量，以隐蔽的身份，和平打进金县公安局。逐步从内部掌握保安队，变反动武装为革命武装的重大决策。

1945年10月13日，由当时进驻瓦房店的我东北民主联军五支队司令员陈迈谦带领一部人员，去大连、金县做政治接收工作。其中有负责人原瓦房店中学教师、我地下党员、最早参加我军瓦房店司令部工作的张逸秋和原胶东六师十四团教导队代理队长刘新义，还有一部分八路军老战士刘正国、刘诚信和新参加司令部工作的徐攻玉等人。我们是在傍晚时，从瓦房店司令部乘汽车出发的，当晚到普兰店我军大队部。在那里住了一宿，又补充了部分去大连和金县的人。大家都把军装和武器留下，换上便装，于十五日晨向金州出发。在我军普兰店大队部前上的车。陈迈谦司令员和一名苏军中尉翻译乘坐在前头的一辆黑色小轿车上，张逸秋、刘新义和徐攻玉等约近二十人都坐在后面的一辆大客车里。

汽车沿着去大连的公路前进，到石河时有苏军设的岗卡，不能通过，经随行的翻译联系，很快，车被放行。不久便到了金州城南门外。张逸秋、刘新义、刘正国、刘诚信、许泽义、杨福生、徐文兴、王三福、徐攻玉等人当即下车。陈迈谦和其余十来个人便通过金州开赴大连（陈迈谦来大连后改名陈云涛，和韩光等同志组织建政工作，在大连市民主政府成立时，任副市长）。

我们在金州南门外下车的人，由张逸秋、刘新义带领找了个饭馆吃了饭，就派出许泽义去找前已联系过的周旭东。周是我地下党员，在日本投降后，从哈尔滨随苏军司令部来金州，任翻译兼金县公安局司法科长。因为当天没有找到，大家只好在南站找了一家旅店住下。第二天找到周旭东，联系通后，周旭东亲自到旅店看望大家，并和张逸秋、刘新义商定，以我们都是周的朋友的名义插进金县公安局去安排工作。于是由周找来客马车把我们这些人拉进金州城，并当即在东街的金县公安局（亦即保安大队部）里见到了大队长邓德山。周旭东当面作了介绍并说明了意图，邓德山表示欢迎。听人说：邓德山谁都不怕，就怕苏军翻译周旭东。这样，我们就被安排在邓德山住的那座房子里，和

邓的卫队人员住在一起。

我们来到金县公安局并没有立即分配工作，只是由张逸秋、刘新义通过周旭东同苏军司令部和邓德山分别联系、磋商，一时还没有头绪。这时距上次武装接收发生战斗时间仅一周左右，邓德山虽碍于周旭东的关系不得不收留我们。但他在思想上并不是没有疑虑的。邓的护兵就曾向我们透露话风说：“八路若是再来打，就都崩了他们。”我们听了这些话，既深刻认识到这批恶棍同共产党八路军的仇恨，同时也不免在心中暗笑他们的愚蠢：现在八路就坐在他们的炕头上，这些反动家伙却还在说大话呢。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机会，通过个别接触和谈话，了解了一些当地的和他们集团内部的情况，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们在金县公安局住了两天后，组织上又从大连派来一批我党骨干力量到金县。这批人中除了李建东等同志来金县组织职工会，建立党支部，准备开展建政工作外，还派了原胶东军区团的特派员王善兴和李建民、高树功、肖智永等近十人，仍是通过周旭东的关系进入金县公安局，和我们会合住在一起。这时，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已安排张逸秋转到金县维持会里去工作，公安局的武装工作全由王善兴同志负责。他很快和苏军司令部打通了关系，被任为公安局副局长。王善兴和刘希文、邓德山等人经过接触和争执，将打入公安局的我方人员全部安排了工作。为了掌握武装，绝大部分人都安排在保安队的各个中队里，如刘新义为第二中队队副，刘正国为第三中队副，刘诚信为第二中队小队长等。同时考虑到部队给养方面也需要有人掌管，就安排徐攻玉到局总务科去管理后勤资财。这样，党对金县公安局保安队武装的第一步工作：派革命力量打入反动武装组织的任务算是初步完成了。

但是这也仅仅是第一步。因为我们虽在形式和名义上是采用和平方式打进去了，而且从副局长以下都有了一定的负责职务，可以进行一些工作了，可是实际大权仍在邓德山一伙的牢牢掌握之中。他们处处作梗，不让我们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并且敌视革命，顽固地坚持他们的反革命立场，继续保持土匪恶霸作风，纵容他们的亲信为非作歹，祸害人民。王善兴虽身为副局长，也没有多

少决策权。邓德山还经常借故同王善兴争吵，甚至为无理要求释放他聚赌作恶而被扣压的亲信，竟用枪向王善兴逼要看守所的钥匙。对这样反动成性不知悔改的人，看来，不摊牌是不行了。好在我们打进来的同志，一开始就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而且比较扎实，大家都能以身作则，埋头实干，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注意和基层干部战士交朋友，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主张，争取了部分中层力量。尽管邓德山他们顽强对抗，我们还是在基层干部战士中扎下了根，并且通过教育培养，一部分人已成为我们的朋友。如对素质和表现都比较好的二中队队长赵寿梦，一中队小队长马若和、王家立、二中队小队长王建廷等人，就是通过我们派进去的同志，从联系阶级感情入手，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耐心地讲解党的政策，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功绩，阶级斗争和为人民服务的道理，结合当前形势和邓家父子的罪恶行为，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使他们认清了邓德山的丑恶本质，逐步争取到我们一边。同时，关星甫、李建东等同志已组建了中共金县县委会，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还组织了职工总会和农、青、妇各方面的群众力量。张逸秋在维持会中也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和团结了当地工、商、文教等方面的上层人士，建政工作已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但是仍由邓德山掌握的保安队武装领导权的问题不解决，县内各项工作都难以顺利进行。为推进建政工作的迅速开展，县委决定要彻底解决邓德山父子和他的反动武装问题。经过周密准备，在取得苏军金州警备司令部的同意和配合后，各方面的工作都较成熟了，于是，一场决定金县人民命运的向反动武装头子——邓德山一伙夺权的斗争开始了。

1945年12月6日晚，金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善兴同志布署了夺权行动计划，向派进各中队的共产党员和骨干力量做了战斗动员。兵贵神速，十二月七日晨，苏军司令部先用吉普车以开会名义把邓德山单独召到警备司令部收容起来，随后把他的儿子一中队长邓本礼也拘留了。在这同时，王善兴下令全城戒

严，以赵寿梦、刘新义率领的二中队做主力，迅速地包围了大队部邓德山的卫队和一、三中队的警卫班，兵不血刃地把邓家父子的警卫人员和他们的亲信完全缴了械，并把三中队长，邓德山的弟弟邓维美押送到苏军司令部。（邓家父子后由苏军移交给我辽南军区进行处理）。对一、三中队其余小队和分散在外地的武装力量，则下达了非王局长命令一律待命不动的死命令。至此，整个金县公安局保安队武装，已完全掌握在革命力量手中。随即党对公安局机关、保安大队、中队、小队等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大改组大调整：赵寿梦担任了公安局长职务，王善兴仍为副局长，党又派老红军陈远吉任副局长兼保安大队长职务。刘新义、刘正国、刘诚信、马若和等人当了各中队长，李建民等改任中队指导员，在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局机关中王建廷任治安行政科长，徐攻玉为总务科副科长（无科长），党在全局全队人员中，在整编的基础上，开展了政治教育工作，开始吸收新党员，建立正常工作秩序。这就使全局和保安大队成了全新的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的武装，终于完成了使这支反动武装向革命武装的转变。从而完成了接收金县公安局和保安大队的第二步任务。从此，党完全掌握了金县境内的革命武装力量，为建政开辟了顺利的道路。在条件完全成熟的情况下，1945年12月16日，经过各界人民选举，经苏军同意，金县民主政府终于成立了。县长是原当地维持会长曹世科，副县长是中共县委成员李建东，而从瓦房店带领我们一起来金县秘密接收的张逸秋则担任了新县府的秘书长。

至此，经历了两个月的艰苦工作，终于取得这场斗争的完全胜利，实现了党对金县的夺权建政大业！

（作者系原金光化工厂厂长，党委副书记，现离休。）

记蒋介石视察青年军

伍蔚文

抗战后期，为了增强抗日兵力，国民党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于是大批爱国青年奋而起，要求参加抗日救国。因此蒋介石就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相号召，计划在全国成立十个青年远征军师，每师一万人，共招收十万知识青年入伍。结果人员不够，只成立了九个师。据我所知，青年军二〇一师驻在四川璧山，师长是原来当过军长的戴之奇，后来改调潘华国；二〇二师驻在四川綦江，师长是罗泽闾；二〇三师驻在四川泸州，师长是原七十一军中将军长钟彬；二〇四师驻四川万县，师长覃异之；二〇五师驻贵州贵阳，师长刘安祺；二〇六师驻陕西汉中，师长肖劲；二〇七师驻云南曲靖，师长方先觉；二〇八师驻江西黎川，师长吴啸亚；二〇九师，师长温鸣剑。

这些青年志愿军战士，大部分是全国各地中学或大学投笔从戎的学生。其中有一小部分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子女及亲戚。他们都是公子哥儿，是不受军纪约束的特殊人物。连排长对他们也束手无策，只好装聋作哑听之任之。

青年军的武器装备和物质生活条件，是国民党任何嫡系部队都无法相比的，至于那些杂牌部队，则更是望尘莫及了。所有志愿军穿的军服，不仅质量最好，而且样式也是仿照美国军装做的，左臂上还有一个用兰色缎子红色镶边做成的臂章，中间绣的是一朵白色梅花，梅花外边是一个红丝线绣成的“V”

字（即英文 Victory 的简写，意思是胜利）。整个臂章上大下小，成一个心桃形。戴了这个臂章，在重庆坐公共汽车不用买票，真是神气十足。脚上穿的是皮鞋，走起路来咯达、咯哒响，更是趾高气扬。至于伙食，每天都是大鱼大肉，在当时连国民党其他部队的军官也没有他们吃得好。这一切都是我亲身所历，亲眼所见的，因为那时我正在青年军二〇一师当少校科长。

及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毛主席竟出人意料地应蒋介石的邀请，亲来重庆和谈。这就使国民党处于极端被动与尴尬的境地。真是刘备招亲，弄假成真，非谈不可了。虽然经过了很艰难曲折，但在共产党的诚意和全国人民的舆论压迫下，达成了“双十协定”。在协议中规定：抗日战争既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迫切希望休养生息，全国军队即应裁减整编。这是无可非议的。特别是青年志愿军，原为抗日才弃学而来，现在日寇既已投降，自应全部复员。国民党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无可奈何地只好决定青年军全部复员。后来，我还被所在师部派遣，护送湖南青年 100 多人复员回长沙。其实青年军并没有全部复员，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

在青年志愿军尚未复员之前，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为了表示对青年志愿军的关怀与慰问，决定对青年军进行一次视察。青年军那么多，而且分散在全国各地，他哪能一一前往？于是就选定了当时驻扎在四川璧山的二〇一师。因为该师是九个青年军师的第一，有代表性，而且距重庆又较近。

当该师接到蒋介石要亲临视察的命令后，既感光彩，又觉紧张，怕一旦没弄好，后果堪虞！所以师长潘华国连夜召集司令部人员开紧急会议，讨论研究如何警戒，如何接待，以及如何受检的问题。首先提到的是安全警卫问题。重庆距璧山虽路程不远，但所经之地情况复杂，不无危险，因此决定由参谋长王寓农指挥，责成参谋处情报科负责组织警卫连，并事先向委员长侍从室的特务人员请示联系。对由重庆至璧山的沿途情况也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查分析，并临时对该地区进行户口清查，看是否有可疑之人潜杂其间。又分析了那一带地方的政治情况和地形特点，还在青木关增设了一个临时检查处。加强了通讯设备，架设了专用电线。沿途各处又加派了军队，便衣特务更是来往如梭。在接

近二〇一师司令部这一段，主要是由师部负责。为了保险，司令部又决定委员长前来视察那天所乘车辆不经过璧山县城，对外界只说是城内街道狭窄，观瞻不雅，所以特派工兵营在城外新修了一段汽车路，绕过县城直达司令部。在距离璧山县城约半里路的地方，有一座小石拱桥，也事先由情报科协同工兵营进行了检查、加固，并派哨兵看守，以防意外，保证安全。

蒋介石的车辆队伍虽已决定不经过璧山县城，但是璧山县县长还是吓得屁滚尿流，早就亲自指挥全城老百姓将店铺粉刷一新，唯恐不整洁，挨斥责。到了蒋介石来的那一天，全城悬挂国旗，遍贴标语。所有商店除尽量摆出各种花色新奇的商品外，并且一律减价出售。一切闲杂人员，禁止在街上通行。县里的警察也是三步一岗，两步一哨，名义上虽不叫戒严，实际上与戒严并没有两样。这次蒋介石来璧山是专门视察青年军的，本来与该县无关，但他还是惴惴不安地在县城里忙个不亦乐乎，担心委员长一旦心血来潮，要到县城里巡视一下，万一出了什么岔子，那就不得了，怎能不害怕呢！

以上这些，都是关于警戒方面的，其次是如何招待的问题。因为当时我是二〇一师司令部庶务科科长，当然这个工作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身上了。师长是我的亲戚，自然很关心，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公馆里说：“这次的接待工作，不比寻常，你过去没有干过，所以要特别小心，谨慎！我已经当面向刘处长交代过了，叫他多帮助你。”我表姐也在旁插话说：“文弟呵！这次任务非同小可，成也是它，败也是它，你可不能轻心！”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件难事。我自普通学校出来考入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即到部队，从来也没有干过这样的工作，而且年纪又轻，见识也少，没有经验。这次是因师长新来，暂时没有人，就把我调来黄牛当马骑的。我哪里办过这样重大的招待？但事到如今，没有其它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豁出来干。因此我决定多向上级请示，多向别人打听。可是在这个范围内，谁也没有接近过蒋介石，不知他有什么习性？喜

爱什么口味？爱吃些什么菜肴？最后我只好去跟副官处刘处长研究，但他也是湖南人，不了解浙江的生活习俗。商量到深夜，最后我们提出这么一个设想：因为委员长一向提倡新生活运动，讲究节俭朴素，那么我们宁可把菜肴弄得实惠一些，花样品种不能搞得太多，以免遭受他奢侈浪费的斥责。第二天我们一同去请示师长，师长也拿不定主意，只嘱咐说：“原则上就是这样了，但还要准备一些临时应变的办法。”我记得那一天在蒋介石那一席上，只做了一个四五斤重的大鲤鱼，一个清蒸的全鸡，海味并不多。我们想，山珍海味对他来说，当是家常便菜，何况在璧山这个县城里，更弄不出什么高级海味来，所以倒不如来个“小家碧玉”，加上几个浙江名菜，更显得清香可口。在制作这些菜肴的时候，还得保密，不能明白告诉厨师是做给委员长吃的，只说是中央要人要来，暗中还派了两个情报参谋和几个副官进行监督，以防出事。对蒋介石的饭菜问题，我们虽绞尽脑汁，经过周密考虑、安排，但仍觉得难保无虞，所以事先又向侍从室官员反映、请示。他们说：“这个问题，你们事先应该尽量做到严密检查、监督，到时候我们还要进行技术检查，你们放心好了。”在烟酒方面，我们虽然采购了很多，但是太好的不敢摆出来，因为蒋介石本人不抽烟，怕他看到了要指责我们奢侈浪费，所以用的多半是美国货，如“飞利浦”、“骆驼”之类的烟卷。酒则是用的香槟、白兰地。那时在重庆啤酒还不大作兴。不过对他的随员们倒是用了一些高级烟酒。事先我们就训练了招待人员，叫他们好好侍奉这些人。告诉他们只要不在委员长面前，他们喜欢什么，你们就给什么；他们要什么，你们就到副官处去领，没有就马上去买，千万不能得罪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得罪了这些人，那么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们给你捅一下，你就受不了。

除了上述这些工作外，我们又设想：假使那天蒋介石突然高兴了，要去西温泉洗澡怎么办？如果我们事先毫无准备，岂不是措手不及，要遭到斥责吗？于是我们事先派人与西温泉联系，叫他们也作好准备，并预先公布这一天“休假”，不对外开放。同时我们又专门派了一个副官到重庆购买了一些高级游泳衣服、拖鞋、毛巾、香皂等洗澡用品。可是后来他们却没有去，这些用品也只

好报销了事。

到了六月中旬，除了积极准备警卫、招待各项工作外，直属部队也加紧了训练。阅兵式、分列式日夜在进行操练演习，准备那天受检。检阅台也修缮一新。及到六月十八日那一天，一清早青年军二〇一师整个司令部就忙碌开了。警卫部队从司令部开始，三步一岗，两步一哨，沿着公路一直向青木关方向作了严密部署。就是司令部的官兵，除因工作需要发给通行证准许外出者外，其他人员一律不许随便请假外出行动。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司令部的大小汽车出出进进，不是拉桌椅，就是运食品。司令部所有直属部队官兵，也整齐地列队于司令部大操场内，进行各种预演。那天正是一个大晴天，烈日悬空，重庆的六月，太阳真如火烤，人人都是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可是谁也不敢说热。

直到上午十一点左右，忽见司令部一个传令排长骑着一匹马，匆匆地来报告说：“委员长的车已经过了青木关，快要到了。”顿时全场紧张起来，原先就地休息的官兵，纷纷站起。到处听到“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都在整理队伍，检查服装。又过了几分钟，传达排长又急急忙忙地来报告：“委员长的车已到了璧山城外，立刻就到！”于是，全场就鸦雀无声，只见师长潘华国骑着一匹栗黄色高头大马，在操场内跑来跑去。不一会儿，从操场的西北角新修的马路上，驶来了好几辆黑色流线型小轿车。只听号兵吹响了立正号，所有官兵咔嚓一声站得笔直，肃然敬立，连大气也不敢出，全场静得一丝声音也没有。这时，师长一马飞奔汽车，汽车也停下了。前面几辆都是随员扈从，一直到第五辆才是蒋介石坐的车。他穿一身草黄色高级毛料军装，腰间挂着一把佩剑，衣领上左右各挂着一块闪光耀眼的金领章，上面有三颗突起的金星，说明他是上将，可人们都称他是特级上将。手上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站在车旁静听潘师长的报告。报告完毕，请示委员长检阅。蒋介石乃举手还礼，改乘敞篷汽车缓缓地驶过仪仗队及所有受检部队。接着登上检阅台，进行分列式阅

兵。这时部队纷纷调动，口令也是此起彼伏。检阅完毕，部队又面向检阅台集合排成四方形，聆听委员长训话。蒋介石一开始便说他自己对抗战有“高瞻远瞩”，及时地成立了十万生龙活虎般的青年军，所以迅速地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成立青年军的巨大作用，当然也是你们青年士兵对抗战的“伟大功勋”，值得嘉许。他虽然明知青年军对日寇不仅一枪未放，连日本兵是什么样都没有看到过，而他却白日说梦。接着他又说什么神圣的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国内“匪患”尚未根除，还要继续努力。不过，你们原是放弃了学业投笔从戎而来的，学习要紧，你们暂时可以复员。这是长远之计的事。这样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都叫我们打败了，区区的“共匪”是不足为虑的。你们尽可安心回去。要学习的，可以继续升学，各学校都有优待条件；能工作的，政府给你们优先妥善安排工作。这些我都已经命令全国执行了。只要你们有本领，治理国家的事多着，都需要你们青年人来担当。你们以后都是乃文乃武、继往开来的人。我曾经写过一首对联，不知你们记不记得？就叫：“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以后你们立身处世就要这么去做。这也是我对你们的希望和勉励。训话完了之后，由值星官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第二天，国民党的各大报纸就在头版上大登特登委员长亲临青年军二〇一师视察慰问的消息和训话的全文。接着部队带回营房，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的将校军官在司令部门口与蒋介石合影，我也在其中。

休息片刻后，举行宴会。蒋介石和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及少数高级随员，坐在检阅台正中的一席上，其旁有司令部将校军官、新闻记者等，大概有三、四席。蒋介石的饭碗筷子是由他的侍从人员带来的。在未入席之前，一个穿西服的随从，把一双牙骨筷子、一个金边饭碗及专用羹匙等放上席位，把原有的一套撤换下来。入座后并没有喝酒，蒋介石大概只吃了半碗饭，就从台上走下来，后面紧跟着师长、副师长几个人，走到士兵的席间，看看他们的菜肴，问问他们吃得怎样。裂开口露出一口金牙。他这样绕场走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席上。这时所有随从和司令部的官员大概也吃得酒醉饭饱了，青年军士兵也吃得差不多了，蒋介石起身离席，值星官大声呼“起立”口令。师长、副师

长及若干官员陪送蒋介石回到司令部楼上休息去了。

大约到下午四点左右，太阳已开始偏西，部队又集合在操场上，仪仗队也如上午一样摆列，蒋介石及随员从楼上下来，刚出司令部大门，号兵吹立正号，全体肃立敬礼。蒋介石举手答礼，走过仪仗队才登车上道返回重庆。我们战战兢兢“接驾”的这一差事，好歹算圆满结束，才抽了一口大气，放下心来！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市民革成员）

蒋经国给我的印象

伍蔚文

我和蒋经国原来不认识，但对他的作为和名声倒早有所闻。因为他在江西赣州当专员，距湖南很近，有关他如何巧抓赌博，处罚那些官吏，以及励精图治，扫除文盲等措施，当时确实是受人称赞的。在我的心目中，也认为这样的官员在国民党里确实少见，中国正需要这样的官吏。

我和他见面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这年暑假，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四省的“三青团”，联合在湖南南岳举办南岳青年夏令营，主任是湖南省“三青团”书记李树森和江西省“三青团”书记蒋经国。当时有四省大、中学校“三青团”的干部两千多人参加。我正在大学念书，也是“三青团”干部，因此也参加了这次夏令营。开营的那一天，当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湖南省“三青团”书记李树森（湖南省中将保安司令），江西省“三青团”书记蒋经国，以及两广的黄旭初、李汉魂等都赶来了。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蒋经国。虽然其中还有很多将领也是第一次见面，但我对他们却没有好印象。我总认为搞青年团工作的领导，本身就应该年轻一些，委派老气横秋的官僚和纠纠武夫来领导青年，实在是太别扭，太不恰当了，所以当时对蒋经国很赞成和佩服，因为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文官。那时他只有三十多岁，个子虽然不太高，但很结实，黄黑色的面庞显示出他曾受过长期的风霜锻炼，不象那些养尊处优的白脸书生，更不象那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他走起路来昂头挺胸，有朝气，极是精神。

在夏令营里他和青年学生一同起居作息。每天早晨起床号一响，青年们都迅速到操场集合，他也出来了，和大家一起作操。在我们听讲演时，他总是一听到底，不象另一些大官，陪同讲演者来到以后，不久就溜之大吉，无影无踪了。当时给我们作讲演的，确实也有些“名流学者”，如叶青、梁寒操、郑彦棻，以及一些大学教授等。其中使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叶青的一次哲学讲话。因

为大家都知道叶青曾被认为是共产党的理论家，是由信仰共产主义到反对共产主义而投向国民党改信三民主义的，应该是知己知彼有深刻体会的，所以大家无不聚精会神地听。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解释“无产阶级”这个名词时，“极其生动，颇有见地，令人深服”。他说：“共产党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那么什么叫无产阶级呢？以他们（指共产党）的说法，无产阶级就是没有生产工具的人。正因为没有生产工具，就只好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所以要起来革命。你们想一想，在中国没有生产工具的有哪些人？究竟有多少？木匠的斧头、锯子是生产工具吧！农民的锄头、镰刀也是生产工具吧！裁缝、瓦匠那个没有工具呢！所以说，要说真的没有生产工具的人，就只有叫化子了。他们才算是真的无产阶级。但是叫化子既无文化，又都是些好吃懒做的流氓地痞，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去学手艺，维持生活呢？难道一把剪刀、一把斧子也办不起吗？如果无产阶级就是叫化子流氓地痞，叫这些人来革命，能把中国搞好吗？我是不相信的……”话还没完，台下掌声雷动，齐声喝彩。说句实在话，我当时并没学过马列主义，所以也认为他说得好，说得有道理。现在看来，他确实是太幼稚太无知了。连“无产阶级”这个概念都理解不清。不过，也许当时他是故意歪曲来诓骗青年学生的。蒋经国当时也在旁听讲，我见他也频频点头。

蒋经国自己也给我们作过讲演。总的印象是，我觉得他对青年热情爱护，充满了对青年的鼓励和希望。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在讲演中强调青年宝贵、有希望时引用了孔子在《论语》中“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句话。他说：“这个‘畏’字，不完全是怕的意思，是敬畏的畏，是值得敬重的意思。你们想，你们现在大都是大学生，不久就要大学毕业了；在中学的，将来大多数也要升入大学，有了丰富的学识，将来治理中国不比我们现在这些人要好多了吗？难道不值得敬重吗？我个人是绝对相信你们要比我们这一代好的，所以应该敬重。古语说：‘后来者居上’，这确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不是这样

的话，社会怎么能够前进？怎么能够发展？恐怕现在我们都还在穿树皮、树叶，茹毛饮血呢！因此，说来说去，只有青年才是国家的希望，我们国家一定要重视青年。某些瞧不起青年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你们青年也要自信，自强、自重、自爱，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还有一次，记不得是什么活动，他又来了。我个儿高站在队伍排头，他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问：“你是哪个省的？”我说：“是湖南省的。”他又拍拍我的胸脯说：“好体格！身体真魁梧，有希望！”他又看看我胸前挂的那块湖南省“三青团”发的“力行”奖章，反复地望了我几眼说：“还是一个力行实干的干部哩，好好干。”当时，我不禁感觉到有一股暖流直涌到心头，觉得他对我充满了鼓励 and 希望，比那什么上将、中将大官热情、亲切、平易多了。每当我见到国民党那些大官时，我总是感到他们冷若冰霜，一副严肃的面孔，好象一点感情也没有，令人生畏。尤其他们对于青年更是不放在眼里，以为青年都是些幼稚无知的乳臭小孩，只有他们才是才智超人、经验丰富、世界的主宰者。对比之下，我怎能不佩服蒋经国的作风呢。因此，他对我的印象是很深很好的，至今未忘。

可惜的是他后来思想行动越来越向反面发展，受本身阶级地位的限制和狭隘的忠孝思想所支配，未能看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很好地与共产党诚心合作。统一祖国，真是可惜！

(作者现为市政协文史委员)

大元帅府近卫团长吴浩

吴 竟 成

吴浩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大元帅府的近卫团长，担任过孙中山的保卫工作。为推翻清朝统治，改造中国，振兴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我的叔叔，字虎臣，号中和，外号细阿福，1880年出生在无锡县陆区桥镇一个农民的家庭里。

吴浩小时候喜欢听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敬佩洪秀全。他性格刚直，又好拳术。到无锡城里金元隆茶食商店当学徒时，拜北门外泗堡桥前清武举人杨振海为师，学成一身高超武艺，矫健异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适逢清廷招募新军，便应征入伍，编入驻苏清军陆军第九镇三十六标为正目（相当于班长），吴浩除训练外，勤奋读书，广泛阅读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历史书籍，从而丰富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以后他又加入了秘密革命组织，积极从事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当时，清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响应民军起义，改编为新军——苏军，震动了整个江南地区。这时，在苏军任先锋营营长的吴浩，热血正旺，即秘密返回无锡本籍，设秘密机关于无锡北门外黄泥桥西堍直街的大吉祥旅馆内，招募勇士，筹集活动经费，准备在无锡组织起义，积极响应武昌起义，迎接革命军的到来。

秦毓鎰命令倪国梁所部民兵，和吴浩、秦元钊招募的勇士共四百人，编为守望队，巡行街道；命令许嘉澍、窦鲁沂、蔡容所集商团五十六人，编为进行队，驻公园，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华承德督率，进攻无锡县署，县知事孙友

尊迎降。再进攻金匱县，县知事何绍闻已经逃去，那天是农历九月十六日，即公历 11 月 6 日。

无锡光复后，吴浩所部除留一部分在无锡编为锡军三中队外，与苏州新招的一营人合编定为苏军先锋营，吴浩仍为营长。不久，苏军参加攻打南京城的战役。吴浩率先锋营赶往雨花台，攻打天堡城。清军提督张勋坚守南京，顽强抵抗。但是，先锋营的战士不畏强暴，英勇奋战，豪迈地喊出了“攻下天堡城，得到南京城”的战斗口号。

据当时参战的先锋营副目，现尚健在的吴刚老人回忆说：“天堡城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当时他们用的武器是德国制造的毛瑟枪，我军条件十分艰苦。”吴浩率先锋营加入作战后，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击溃了驻扎在天堡城的清军提督张勋所率的江防营。从而清军全线瓦解。农历十月十二日（1911 年 12 月 2 日），革命军攻克了南京城。

进南京城后，先锋营驻扎在陆军第四中学内。不久，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师二十六团。师长洪承典，扬州人。吴浩也晋升为二十六团团团长。黄兴在南京组织元帅府时，二十六团被选任元帅府近卫团；后又改为总统府近卫军。当队伍在攻打南京时，该团原由朱宝成团长统带。攻下南京后，朱宝成将队伍留在南京，准备北伐。他本人回到浙江，整顿留浙队伍。近卫军团就由第七师师长洪承典统带，由吴浩任团长。一、二两营驻在总统府，三营在外围。孙中山先生于 1912 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这时，吴浩尽心于保卫总统安全的职守，深受孙中山先生的赞许。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朝宣统皇帝宣告退位。由于立宪派及其他旧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及革命党人的妥协态度，孙中山先生被迫于 13 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荐袁世凯以自代。到 4 月，孙中山先生离开南京时，跟近卫军团官兵依依惜别，并讲了话，勉励官兵“要为真理而奋斗。”为奖励他们还赠予近卫军全体官兵每人军服一套，白竹布手帕两块，每块手帕中间印有“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八个魏碑体黑色大字，下旁印“大总统孙文书赠”一行小字，作为临别纪念。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以后，只发给南京军

队一个月的伙食费。由于军费十分困难，第七师解散，吴浩就带着二十六团参加了南京卫戍团。

第二年，吴浩率团归并徐州第三师，师长是冷 ，即冷御秋。师长冷和团长吴浩对下级十分关心，官兵同甘苦。

原来商定临时大总统任期是六个月，但袁世凯的野心很大，当上总统后实行个人独裁，立即从各方面向革命党人疯狂进攻，打击革命力量，并公然发动内战。

1913年夏，北洋军南下，“二次革命”爆发。在攻打韩庄时，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却不辞而别，讨袁的形势急剧变化。这时，吴浩的第十一团成为南京方面讨袁尖兵。吴浩将全团千把人马带到南京，担任南京卫戍团的任务，同时又扩充了兵员，成了南京卫戍司令。这时吴浩对内已是第五旅旅长，对外是司令。《民权报》主笔之一贺海鸣叫吴浩出面宣布“会通各师，取消独立”，在南京张贴布告。“会通各师，取消独立”的主张，是在团长以上军官到讨袁军总司令部开会时宣布的。布告贴出去后，南京还很平静。不料夜里十二点，贺海鸣又回来，自称讨袁军总司令，仍要独立，继续讨袁。这时，士兵误解“吴浩私通袁党”。贺海鸣说：布告，不是吴浩私通袁党贴出的，是有袁党的人混入了司令部冒充吴浩干的，我们已派密探出去，查出就地镇压。这样一来，南京就乱了。吴浩的五旅全部自动解散。以后，袁世凯得势，吴浩成了袁世凯军阀势力的眼中钉，他们到处尾随盯梢，伺机暗害。此时，吴浩在南京已站不住脚，在英国人保护下秘密到达上海。贺海鸣也走了。那天晚上旅部只剩下一个中尉副官金鸿声，一个上尉参谋钮德华，一个军需长、吴浩的兄长吴振，情况很危险。

吴浩秘密到达上海后，住在法租界，经常出入上海仁济医院，继续组织和联络人员进行讨袁活动。有一天，当吴浩从仁济医院出来时，突然遭到袁世凯

暗杀党的枪击。当时，吴浩身中三弹，倒在血泊之中，幸经仁济医务人员抢救，取出右腿上和下腹部的二发子弹，但另一发打在左背进入肺部，又穿过第三根肋骨的子弹未能取出，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时还留在肋骨中间。吴浩的枪伤治愈后，便从上海回到无锡乡下，继续从事反袁活动。1915年，袁世凯叛国称帝，在北京演出的一场帝制丑剧，遭到各地进步人士的反对。吴浩也在苏、锡两地积极活动，准备联络乡民，进行反袁起义。不幸被破获，只得仍返上海隐蔽。几年以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创办黄埔军官学校，电告在上海的洪承典，再由洪承典发信通知各地，原在南京的连长以上的人都到广东去，旅费到广东报销。吴浩接信后徘徊不定，金鸿声曾三次去陆区桥镇约吴浩南下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参加黄埔军校。由于吴、金两人的种种原因，广东未能去成。这时全国各地军阀当政，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吴浩对此非常气愤，重又回到家乡，过着隐居的生活。

1937年，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我国，日寇的铁蹄，践踏我国大地。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其占领区广大农村进行大扫荡。在陆区镇上抓了许多乡亲，吴浩因年老体弱，未能躲避，也被押往陆区小学操场。日寇用机枪对准乡亲老少，要他们指认抗日分子，可是谁也没有开口。这就更加激怒了日本侵略军，立即下令枪杀。幸经在场的父老们苦苦哀求，才免遭毒手。吴浩被打后扔在野外，后被人救回。但不久就含愤离开了人世，卒年六十五岁。停柩在家五年之久，直到1947年春才安葬于安阳山南麓。

肃亲王善耆在旅顺

孙 棫 蔚

辛亥革命期间，肃亲王善耆等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宣统帝逊国后，在川岛浪速的怂恿下潜居旅顺，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为恢复清室进行复辟活动。

一、世袭网替

善耆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嫡裔。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勇武善战，在清兵入关时，随同和硕睿亲王多尔滚转战各地，攻进四川，曾亲自射杀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于西充峡谷中。被封为和硕肃亲王，是清初八大亲王之一。

善耆祖父是第八代肃亲王华丰，历任内大臣、宗令。因火器营设厂制药占用肃王府地，华丰力拒之，招责“不知大体”，罢宗令和内大臣之职。1858年（咸丰八年）薨，谥曰“恪”。善耆父亲是第九代肃亲王隆勤，任宫内大臣。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疏请纳正言，裕财用，上嘉纳之。1898年薨，追封“良”。是年善耆承袭王爵，善耆就是这“世袭网替”的第十代肃亲王（俗称铁帽子王）。①历任民政部大臣、镶红旗汉军都统、军咨大臣等要职。

在支撑清王朝的八大皇族中，他的见识和实力都是首屈一指的。他除了王妃还有侧福晋四人，生了三十八个儿女，其中男孩二十一个。使用的奴仆有六百人，有三万公顷的土地，还有大牧场、大森林、金矿和煤矿等。

清帝退位后，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怂恿下，潜往日租借地旅顺。在日本

军直接操纵支持下，宗社党进行了两次“满蒙独立活动”。为图复辟，运筹谋划，费尽心机，最后，梦想成空，家产几尽，1922年2月薨于旅顺，废帝溥仪追封为“忠”，终年57岁。其长子宪璋承袭王爵。

二、与川岛浪速相勾结

善耆非常赞赏日本的“明治维新”，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提倡洋务。但是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却是地地道道的亲日派。他同日军勾结，其中穿针引线的人物就是被称为“中国通”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狂热信奉者和执行者。生于日本本州岛松本市。他曾用三年时间在日本外国语学校学习中文。1894年甲午战争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日本出兵侵略中国时，川岛参加陆军，任三等翻译官。

1900年8月，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往西安，善耆随銮护驾。当帝后返回北京时，通过川岛的交涉，得以安然进入紫禁城。川岛因此受到清廷的器重，尤其得到肃亲王善耆的信赖。善耆曾为川岛向清帝奏请了二品官爵和大授勋章。

川岛向清廷建议由日本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培训警察的机构，清政府立即采纳，下令由善耆掌管的民政部在北京创立高等巡警学堂，聘请川岛为学堂总监。从此，善耆与川岛的交往越来越多，关系也越来越深。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冬季的一天，善耆乘轿来到川岛的住所。两个人高谈阔论，互相倾吐生平抱负，越说越投机。当善耆听了川岛的“东亚经论”时，情绪激昂地说道：“中国如不同日本紧密提携，自身的安全及东亚地区的安定均无保证。你我理想抱负完全一致，可否结为手足？”川岛受宠若惊，却又假惺惺地婉谢说：“殿下是大清朝的皇族，我仅一介布衣，结为手足，很不适宜。”善耆慨然陈词：“这是市井俗论，皇族也好，亲王也好，均不过是人爵而已。人间最可贵的是天爵，从天而爵言，余不如卿。前人有‘忘年之

交’，你我可结为‘忘爵之交’。”

川岛感激涕零，立即吩咐仆人杀鸡摆供，而对红烛高香，两人交换庚帖，结成拜把兄弟。川岛与善耆同庚（一说川岛生于 1865 年，长一岁）。善耆与川岛金兰交拜之际，十四格格显玛刚满一岁。由于两个人的政治结合，遂使肃亲王的亲生女，变成日本浪人的养女，改名川岛芳子，又名金璧辉，最后成了日本间谍。

川岛芳子的胞兄宪立，至今还生活在日本，曾作过披露：1922 年 2 月我的父母故去后，“为清理财产和处理其他事情，川岛浪速伴着芳子来到旅顺。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父亲肃亲王是位仁者，我是个勇者。只为仁者难得天下，光做勇者，亦将失败。我想，如将仁者与勇者的血结合在一起，所生下的孩子，必然是智勇兼备。你一定会赞成这样的做法吧！’他说这番话象谜语似的，可我一听就明白了他的用意。无非是他要把芳子弄到手，他迷上了比他小四十岁的芳子。”宪立又说：“我不想谴责故人，所以直到今天我一直保持沉默。可是为了说明芳子的事，现在有必要公开所有的情况。川岛浪速不仅把肃亲王家搞得破了产（笔者注，川岛从中贪污近百万元），而且是个企图向他的养女下毒手的衣冠禽兽。这些都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今天，许多日本人向我探求事实真相，我不得不将它公之于众。”

川岛芳子曾以自杀反抗养父的兽行，子弹留在臂胛骨上，后在北京同仁医院做手术，由院长饭岛康德为她取出弹头。②

三、组织宗社党

1912 年，满洲皇族为了挽救清朝灭亡，反对袁世凯与南方革命政府议和。

1月14日成立宗社党。主要成员有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江宁将军铁良和王公军咨使良弼等。成员胸前均刺有二龙图形，以满文刺写姓名为标志，在天津、北京等地进行秘密活动。嗣因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又策动段祺瑞等发表通电，赞成共和，并以“优待清室条件”为饵，迫使清廷交出政权。隆裕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举行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出席的王公们大都拿不定主意，庆亲王奕劻躲起来不敢露面，后来，竟带着细软和家眷潜居天津享福去了。惟有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主张整兵一战。但隆裕太后怕斗不过袁世凯，连“优待条件”也得不到，终于1912年2月12日颁发了宣统帝“退位诏书”。可在亲王中，唯有肃亲王善耆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并发誓说“不恢复清室，永世不进北京城”，随后跑到了天津。此时宗社党仍在继续活动。隆裕太后在担心之余，不得不于1912年3月28日传谕解散之。

四、潜往旅顺图谋复辟

肃亲王善耆的第十二子宪钧（曾任伪满军医少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称老宪者）回忆说：“1912年，宣统帝退位，我父亲首先偷偷地跑到天津。川岛浪速得知后，也来到天津找我父亲。那时，我父亲虽不甘心宣统退位，不愿意受革命党的统治，但心里尚无一定的打算。川岛探明我父亲的思想，声称日本可以帮助想办法，并劝他到旅顺居住。我父亲答应了。复经川岛从中联络，驻旅顺的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大将即派日本军舰“千代田”到秦皇岛等候……”

2月2日拂晓，前门火车站的月台，布满日本领事馆武官处派来的便衣警察。商人打扮的肃亲王善耆，躲过袁世凯派出的探访人员的耳目，匆忙走进火车站，很快钻进一列开往东北的三等客车的客厢。身穿便服，怀揣手枪的日本陆军大佐高山公通和川岛浪速紧随其后上了车。车厢内还有十多名化装成搬运工，小贩、绅士的日本人。列车开到山海关嘎然而止，原来张作霖为了防止革

命军出关，派人炸毁了通往关外的铁桥。这一意外情况的发生，迫使肃亲王一行换乘汽车赶到秦皇岛，登上日本军舰，直达旅顺口。七天后，又用同样的办法，经过同样的路线，把肃亲王一家五十多口人送到旅顺。

宪钧回忆肃亲王家属转移到旅顺时的情况说，有一天，我正在肃王府后花园游玩，忽然老妈慌慌张张地来叫我。我回到屋里一看，全家大小正在哭哭啼啼地收拾细软，忙着准备行李。我母亲忙吩咐给我换了衣服，我六哥宪英便领着我到安定门内分司厅胡同川岛浪速的公馆。这时全家五十多口人，也都是这样三三五五地分头来到这里。我们在此住了七天，正赶上过小年（阳历为2月10日），最后一天天还未亮，大家又是这样三三五五地到了东车站，坐火车来到秦皇岛，乘军舰到了旅顺口，先住了几天旅馆，以后就搬到新市街旭川町69号（后改新市街镇远町十番地）。“九·一八”事变后，溥仪来到旅顺时，也是住在这里（笔者注：1931年11月18日溥仪到旅顺，首先住在大和旅馆，过了大概一个月，迁到善耆的儿子宪章家，1932年3月6日离开旅顺）。川岛浪速把我们安置停当。就往日本活动去了。”

肃王善耆全家迁居旅顺，受到关东都督府的热情接待。日本外务省与陆海军当局协商，决定向旅顺官员发出指示，对肃亲王要给予充分保护并提供方便，但须注意尽量不要惹人注目。关东都督府按照和川岛浪速的洽商，把当地民政长官白仁武的官邸提供给肃亲王充当住所（笔者注：今旅顺口区太阳沟新华大街9号），进行复辟活动。

五、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1912年1月29日，川岛浪速与在北京居住的内蒙古喇沁王签订了互相勾

结策划内蒙独立的契约，喀喇沁王又以内蒙的矿山做抵押，向日本人大仓组借款，充当活动资金。1912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的高山公通大佐到达北京，川岛向高山汇报了满蒙起事计划，并取得了高山的同意。决定以松井清助大尉偕喀喇沁王秘密逃出北京，前往内蒙，募集兵员，并去“满洲”接运武器，护送到喀喇沁、巴林两王府。木村直人大尉偕巴林王秘密逃出北京至巴林，担任训练募兵任务。多贺宗之少佐担任筹办军火任务，在满洲交给松井清助。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是日本军部直接操纵宗社党人进行的。1912年5月27日，运送武器的47辆大车由公主岭出发。6月7日，当运送军火的车队行至郑家屯附近时，与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的队伍遭遇，松井一行均被俘获，军火全被焚毁。这时，东三省当局也接连破获了宗社党在开原、公主岭、宽甸、海城等地的秘密机关，使宗社党的势力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其中一部分骨干分子又退缩到旅顺一带，肃亲王善耆只好鼓励他们，以图东山再起。这样，由于川岛等人的阴谋计划和宗社党的复辟活动遭到严重打击。加之，日本政府对如何侵略中国问题，内部意见分歧，政府曾电召川岛回东京。内田外相向他转达了西园寺内阁反对“满蒙独立运动”的方针。川岛不得已只好服从，但向政府提出了给肃亲王居住旅顺的生活保障，以及对川岛一伙在“满蒙”的组织不加干涉等两个条件。这就是所谓“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从此，肃亲王善耆被“软禁”于旅顺，日本政府让他出具不参预“政治活动”的保证，但是，肃王在软禁期间，卧薪尝胆，从不间断骑马、射箭，这是清室的必修课，他的箭术竟能百发百中。

六、在东京再次组织宗社党

1914年4月，第二次大隈内阁成立，加藤高明第三次出任外相。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统治者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企图参加战争，

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解决“满蒙”问题。于是加藤外相积极赞助“满蒙独立运动”。

关东都督中村觉大将根据政府的这种方针，传令驻满洲各地的领事和官宪，不再取缔日本人的“满蒙独立”运动。川岛浪速又开始活动了，宪钧回忆说：“1914年，我家象遇到了喜事似的，喜气洋洋。……一天午后，我父亲对我们说，今天傍晚‘风外’（川岛的别号）大人要由东京回来，大家都要到门外去欢迎他。于是大家整装，由父亲领着到大门外排队等候。川岛一到，我父亲马上迎上去，同他拥抱起来。晚饭时候，父亲又领着我最小的母亲作陪（笔者注：即川岛芳子的生母，1922年卒于旅顺，后同肃王一起葬于北京）。这在我家里是从来没有的事情。从这天起，父亲和川岛会谈了好几天。密谈结束后，我父亲说：‘我已没有东西用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了，我有儿女，你可以随便挑取，作个纪念吧！’结果把十四格格给川岛作了义女，川岛浪速给她起了个日本名字，叫川岛芳子。川岛走后，宪德说他要到东京去。后来我才听说，他去日本的目的，一是代表我父亲向大隈重信表示感谢：一是代表我父亲去组织‘宗社党’，并为此向财阀借款。临行我父亲给大隈重信写了一封感谢信，还送给他三块‘鸡血石’。”

在大隈内阁和日本军部的支持下，宗社党在日本成立，本部设在东京，大连、海拉尔设有支部。宗社党的主要人物是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陕甘总督升允、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等。宗社党成立时照了一张相，前排正中坐着宪德，左首是升允，右首是头山满（日本浪人），还有川岛浪速、山田修、若日太朗（后为大连市长）等三十多人。

七、宗社党在大连募兵训练“勤王军”

宗社党再次成立后，大连成立了分部，川岛浪速等人在大连拥立肃亲王，在大连、安东、貔子窝等地召集土匪，秘密组织叛军，到 1916 年初已组成宗社党“勤王军”二千余人，购买武器，训练经费自然是善耆的事。肃亲王府祖上传下来的不动产（包括农田、山林、牧场，金矿等），在王族中首屈一指。直到善耆逃亡到旅顺，肃王府在奉天、河北、热河，察哈尔等省的领地，仍有日本四国岛的两倍大。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亲自出面担保，善耆以在吉林、奉天两省的森林矿产采伐权作抵押，向日本大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一百万元，从关东军买了野炮四门，步机枪三千多支。

根据笔者向知情者亲访调查，宗社党在大连募兵训练“勤王军”的经过如下：

通过川岛浪速的关系，取得关东都督府军政部（即关东军司令部的前身）的许可，以及在双手沾满中国劳动人民鲜血的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经理相生由太郎的支持下，遂以宗社党名义，借大连寺儿沟“红房子”——“福昌”的劳工宿舍，插旗募兵。只要年龄合格，身体不残，即可招用，几乎是来者不拒。于是，一些流氓，盗匪，乘机猬集。也有不少苦力，为贫困所迫，而被骗入伙。总数约有千八百人（也有说两三千人）。金鼎臣、张化民、张润山、朱春山、杨海荣、王文发、左春发、张辑五、钟会臣、姚子明、李弼清、潘干臣等人，都是主要分子和管事者。

金鼎臣是张作霖部下旅长金寿山的儿子。金寿山、张作霖、冯麟阁原是磕头弟兄，因闹内部矛盾，金为张、冯所杀。于是金鼎臣与张化民（金寿山的参谋，还有亲戚关系）率亲信来大连，住南山一带（今消防队附近）。肃亲王来连并发起组织“勤王军”后，由于一个有复辟之谋，一个要报杀父之仇，彼此正好互相利用。金鼎臣一伙就这样参加了宗社党的“勤王军”。

宗社党在招兵之初，由于缺乏枪支，党徒只穿灰色服装，进行徒手操练，因此人多笑之为“靴子鞋”，意思是老穿靴子鞋没有枪支的兵，焉能打仗？！后来通过川岛的斡旋，在日本老牌间谍，大连市市长石本贯太郎的帮助下，买

了一批枪支（石本死后，其妻向西岗警察署交出了 30 余支步枪，说是宗社党时用的）。同时经金鼎臣的手还向丸尾千代太郎买过步枪、左轮手枪、并定做过龙旗（丸尾是日本的大流氓，侵略台湾时负过重伤，后在大连开设丸尾合名会社，以经商为掩护，作窝藏土匪、贩卖枪支的生意）。此外，宗社党还向民间收买了一些老百姓，在日俄战争时拾得的大都是破旧不堪的枪支，有些还是焊接过的，根本无法在实战中使用。只能装模作样。

帮助过宗社党买枪练兵，以及同宗社党发生过联系的，还有白俄将军谢米诺夫（东北解放时，为苏军逮捕回国枪决）、蒙古贵族巴布扎布、升允和吉林督军孟思远等。

关于宗社党的叛乱活动，据说有过两次，一次北向、一次南向。向北的一次是以长春为中心，打过郑家屯、郭家店。金鼎臣、张化民、张润山等都去了。当时是沿南满铁路，在日本关东军的保护下北上的，原计划在长春一带潜伏下来，伺机举事。但是，虽有吉林孟思远的声援，而各省内应却迟迟未有行动，蒙古一王子（宗社党人）在北上的火车中遇刺而死，尸体由石本运回，葬于大连松山寺附近，整个东北局势对宗社党很不利，于是遂以孤军无援而告失败（一说是因孤军出击，被张作霖部打败）。败退时沿途抢劫，骚乱不堪，一些党徒，乘机大发横财。钟克明、钟克琛兄弟俩，从郑家屯一带逃回时，光是金银首饰就抢得半面袋。

向南的一支“勤王军”主要是打山东潍县（有说打登州、打济南、打青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国宣战，1914 年 11 月日军占领青岛，取代德国在华利益。1915 年宗社党也想“乘势”南下，妄图打登州、破济南，拿下山东，然后兵临北京城，以遂复辟之谋。因此当时有“打了登州，杀了幽州”之说。如意算盘既定，于是身着便衣，暗带枪支，从大连乘机帆船出发，到胶东登陆后，拟首先夺取潍县车站为据点。可是驻青岛的日本占领军鉴

于本身利益，拒绝宗社党“勤王军”偷袭潍县的要求，后来通过日本浪人，以20万现金买通日占领军司令神尾大将。但是，勤王军毕竟是乌合之众，一战就被当地驻军打垮了。

据六、七十岁老人（1965年时）的见闻回忆，宗社党闹事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肃王在旅大搞宗社党前后不过两三年，而招兵举事，则为时更短。只有一年左右时间，大约在1915到1916年，即“二十一条”以后至袁世凯称帝期间。

宗社党在最后一次失败后，党徒们即散了伙。张润山、王文发等，后来在大连露天市场任职，张化民经营大烟馆——平顺楼。金鼎臣在1918年底，还有人见到他住在南山寓所（本人住在楼上，楼下是“地馆”，有好些人，概是他的亲信），后来通过热河省督办汤玉麟的儿子汤少帅的关系，当了热河省禁烟督办，以走私、贩卖鸦片为业。“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飞机炸死在热河。

八、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川岛浪速于1915年夏，同盘据在内蒙古的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扎布取得联系，策动巴布扎布所部与以肃亲王为中心的宗社党相结合，从事“满蒙独立”活动。

巴布扎布，土匪出身，日俄战争时期，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参加日军特别任务班，从事破坏公路桥梁、扰乱俄军后方等工作，战后曾充任彰武县巡警局长，之后又投靠外蒙，任东南方面军司令，后又盘据在内蒙西珠穆沁旗境内的大布苏诺尔盐湖附近，以盐为财源，进行练兵活动。1915年6月，巴布扎布派两名特使去日本活动，由日人大原武庆牵线，与川岛浪速勾结，秘密策划“满蒙独立”活动。③

1916年1月下旬，巴布扎布为了表示恢复清室的决心，“在举行暴乱之

前，先把他的两个儿子农乃和甘珠尔扎布送到善耆家上学，肃王则把七子宪奎送到他的军中，实际上是相互交换人质。宪奎临走时，善耆为他起名叫金碧东，意思是东方一个壁垒”④川岛浪速也派了几个日本人来，同宪奎一起经奉天、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到了哈拉哈河巴布扎布的军中。

1916年3月，川岛在大连设置了举事指挥部。日本参谋本部派土井市之进大佐为此事的总指挥。预定6月中旬，从奉天开始，在庄河，复州、辽西、本溪湖等地举事。

这时，袁世凯突然于1916年6月6日死去，由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日本政府转而采取援助段祺瑞的方针，以便控制中国。从而，肃亲王的以复辟清朝为目的的“满蒙独立”活动再次受阻。

但是，巴布扎布率领的三千蒙古骑兵，在日本军官青柳胜敏骑兵大尉的指挥下，打着“勤王复国军”的旗号，于7月1日越过兴安岭，向辽阳进发，直逼奉天。7月20日过突泉，被吴俊升的部队击败。8月10日到达洮南，渡过东辽河，于14日占领“满铁”沿线的郭家店。为了壮大巴布扎布的兵力，肃亲王又将在大连的宗社党勤王军约七百人，分两批于8月22日运抵郭家店，为巴布扎布虚张声势。⑤

日本关东军本来是支持巴布扎布向张作霖挑战的，这时却一反常态，出面干预，派出警备队掩护巴布扎布的骑兵后撤。原因就是日本政府由“反袁”转而“援段”。

由于日本政府对华侵略方针的变化，解散巴布扎布的“蒙古军”和宗社党在大连、安东、貔子窝等地军队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日本政府派遣曾与川岛浪速共同策划的首脑人物外务省参政官柴四郎、预备役海军中将上泉德弥、议员押川方义和国民议会的五百木良三等人到旅顺处理善后事宜，经过反复协商，于1916年8月16日达成协议。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

第 6875—6876 页) 载: 《关于解散满蒙举事团的经过报告》如下: “为使巴布扎布所部蒙古军退出我势力管辖范围以外, 已决定由我方给予若干武器。上述武器将由关东都督府所管的公用武器中拨付, 并即运往四平街。其数目如下: 步枪(包括附件) 1200 支, 子弹 24 万发; 野炮(包括附件) 4 门, 榴弹 180 发; 榴霰弹(野炮用) 380 发; 手榴弹 100 颗。”

8 月 30 日, 川岛浪速偕同松本菊熊等人前往郭家店, 向巴布扎布所部进行慰劳, 并劝他们返回内蒙驻地。9 月 2 日, 巴布扎布所部便携带着日本提供的上述武器, 在日本军队的护送下, 由郭家店出发, 返回内蒙。9 月 3 日, 该行经新河口附近时, 在朝阳坡和奉军交战; 因有日军支援, 巴布扎布且战且退, 九月间就到达内蒙古林东, 准备重整军马。十月初, 在进攻林西县的一场战斗中, 巴布扎布被奉军击毙。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肃亲王宗社党搞“满蒙独立”为殖民地的活动彻底失败。

九、肃王“家产已尽”内幕

“……是川岛浪速把肃亲王家搞得破了产。”肃王的儿子宪立在日本公布了这一事实真相。

笔者根据调查印证了这一历史结论。两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之后, 川岛浪速眼看大势已去, 就想混水摸鱼。他告诉肃亲王说: “存款已经用尽, 今后连生活也无法开支了。”肃王大吃一惊, 至此, 肃王搞宗社党进行复辟的美梦已成泡影。其实, 肃王府的钱还是有的, 只是被这位拜把兄弟川岛侵吞去了。

事情是这样: 在肃王逃往旅顺之前, 川岛同日本领事馆和日本正金银行早有勾结。声言肃王去旅顺, 金银财宝不便随身携带, 为了安全之计, 并不为外人知道王府底细, 以免引起非议或波折, 可将金元宝及其它金质财物, 渡上银皮, 充作银货, 以川岛名义, 交存正金银行封运。为了达此目地, 川岛又使用

两面手法，强调利害关系和银行信用，以诱肃王入彀。一向认敌为友的肃王不知是计，便欣然同意了。当然肃王一行，也还随身带了不少金银细软，据知情者透露，光是现金就有两百万元之多。到旅大后，川岛又告诉肃王说，银行存款没有问题，不过政府指示，所有存款只能用作生活开支，不准外调，如果要充作政治活动经费，则必须得到日本政府的许可。从此，王府的经济大权，亦操之于川岛之手，一应大小事务，无不通过川岛。川岛说肃王的存款已经用光，那是金货按银价来计算的，而金银之间的差价，就全被川岛侵吞去了。

十、露天市场始末

肃王的存款既已“用尽”，那么王府的生活又怎么办呢？经川岛的商议、策划，决定仿上海的“大世界”，在大连办一个“露天市场”，以利润收入来供养肃王一家。此时此地，肃王自然只有悉听川岛摆布了。

计划已定，经川岛向关东厅申请，于 1921 年（日本大正十年）正式批下西岗桥立町 8 号、10 号、12 号和 14 号四块地皮，约有一万坪（一坪等于 3.03 平方米）。同时又向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借了 30 万元作为资金。以 16 平方米包工 60 元的造价，盖了 700 间左右的简易平房，出租收利，大约每月可收 10,800 元。包括房租 4,200 元（每间房除收押金 18 元外，月租为 6 元），摊租 3,000 元，剧场租 3,000 元（按票价收入 50% 计算），大烟馆租 500 元，澡堂租 100 元，除去休息、开支、上税，每月给肃王府 1,000 元左右，其余部分归川岛支配。

关于市场的管理和办事人员的雇佣，概由川岛一手决择，总的由川岛自己负责。下有市场事务所，设主任一人，由川岛亲信充任，第一任为若同太郎，

第二任为后藤六一。1930年开始，为川岛之弟（一说是侄儿）川岛量平。设总办一人，由前宗社党骨干张润山充任（名义为总办，实际只管收租，他干了七八年后被解雇）。其他都为办事员，日籍管账先生为浅井保卫祖，巡视为山内勇吉。中国人管账先生为张辑五，巡视为王文发，收房租为左春发，翻洋于秩五等人。此外尚有一些零杂工，供职的中国人员一般都参加过宗社党的勤王军。肃王那边，老二宪德，老八宪真也参加过管理。除了川岛和王府的人员外，职员的工资算张润山最高，每月一百零五元。其余的，日籍职员平均每月六、七十元，中国职员平均每月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小学教员），零杂工的待遇，那就寥寥无几了。

关于市场内营业的内容，有大烟馆、妓院、卜馆、剧场、澡塘、饭店、当铺、钱庄、客栈、说唱、赌场、杂耍、卖膏药、小百货店等等，可算是无奇不有，下流至极。整个市场共划为四个区域，八号地段为第一区，有电影院、露天评剧院、澡塘、妓院、鸦片零卖所、小饭馆、当铺、钱庄、中药铺、魔术场、估衣铺等等。十号地段为第二区，有古旧铺、摇铃、骰子宝局、杂耍、武术、卖膏药、双簧、相声、评弹、大鼓书、相面等等。十二号地段为第三区，卖各色各样的破烂废旧物品，包括瓷器、陶器、铁器、木器、古董等等，还有一些小药房（旅馆）、铁匠炉等。十四号地段为第四区，全是空地，以出租地皮或作露天堆货站、旧物寄存场、旧木材零卖场等等。

对市场的营业，日寇统治当局严格限制，只准中国人以个人名义经营，并得先经市场事务所同意，再由地方警察署审核许可，才发给营业执照，并按规定纳税缴捐。当时营业者称事务所为“二衙门”。

出入市场的顾客，终日摩肩接踵，拥挤不堪。许多流氓、阿飞、花花公子、纨绔子弟都集中在第一区，因为那里多是供吃、喝、嫖、赌、吸毒的。光是妓院就有60多家，娼妓200多人。由于市场内出售的多系废旧物件，因而大连人都称为“破烂市场”，又由于盗窃分子经常出没市场，出卖东西，所以又称“小偷市场”。市场的声誉若此，可是日本旅行者及军政人员，凡经由大连者，多要光临观赏，实在居心叵测。

露天市场经营了将近 20 年的光景，到 1940 年左右才出卖。伪“满洲国”成立后，肃王善耆的儿孙们多“攀龙附凤”，升官发财，从此，王府生活不必依靠市场收入了；同时由于战事吃紧，时局动荡，于是到 1937 年时，年过七十已成百万富翁的川岛，就策谋出卖露天市场。终因差价太大，交易未成。直到 1940 左右，才以 125 万元卖与张本政、许亿年、邵慎亭、刘子翱、张洪五、周之扬等旅大八大资本家（一说徐敬之也买了一份儿）。成交后改名为大连“乐天公司”，一直经营到解放时为止。川岛在卖掉市场后，又捞了一大笔钱，自己拿 50 万元。给善耆的次子以下每人三万（孙辈没有），余下将近 40 万元归长子宪章，并以连组（宪章长子）名义，存入三菱银行。

十一、肃王子女们的叛国活动

善耆不但自己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积极进行复辟活动，还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其子女身上。他不许子女作民国的官，也不许为中国的民。潜居旅顺以后，他把子女全部送进日本学校，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肃王死后，他的一些子女也搞起了叛国活动。

善耆子女婚姻，多系政治婚姻，即为复辟活动而结合。如善耆七格格显琪嫁给升允的五子际駟。又以十四格格金碧辉嫁给了巴布扎布的二子甘珠尔扎布，肃王的第九子又娶了巴布扎布的长女，肃王的长子宪章娶了蒙古那彦图亲王的三格格。

1922 年 2 月。肃王善耆病死旅顺，他的第四侧福晋相继而逝。两个人的官柩，由其家族运回北京，葬于朝阳门外的架松坟。

王府一家曾一度搬回北京旧居，由长子宪章当家。按照清朝的世袭制度，

宪章承袭王爵，因此，人多称他为“肃亲王”或“小肃亲王”，因其头大，所以外号叫“大头王”。由于王府的寄生生活，使这位王位的继承者，从小就成了鸦片鬼，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废物。到 1926——1927 年左右，由于弟妹们的不满，闹纠纷，要分家；逼得宪章在无可奈何之中，吞食鸦片膏而自杀。经北京石河子医院抢救，五天后得救。消息传开，正在日本的川岛浪速，闻讯赶来，并摆出长辈资格，说什么“万一小王有三长两短，我们大家如何对得起老王”。于是他把宪章带回大连，花了九千元钱。在大连沙河口五町目 38 号（今沙河口区盛德街）盖了一处小楼（以后他自己亦在附近盖了一所，质量较好）。平时生活开支仍由露天市场租利拨给，每月约一百二十元。可是宪章每月吸鸦片就得花四十多元，有时钱接不上，他就晃着大脑袋到市场事务所去要。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考虑肃亲王善耆忠心耿耿，为恢复清室，家产几尽，死后追封为“忠”。对肃王的子女当然要首先擢用。因为在伪满建“国”前，肃王的第七子宪奎（当时改名叫金璧东）就在吉林熙洽手下。由于张海鹏方面还无人活动，溥仪在天津接见了肃王的儿子宪原和宪基，并派他哥俩前去。他们带着溥仪给张海鹏的一封亲笔信，内容是夸奖他如何忠义，任命他为黑龙江将军，率部攻取省城，宪原、宪基由天津乘日本商船天潮丸到大连，复经奉天、四平到了张的洮南镇守使署，张海鹏设香案跪拜接了“旨”，并任宪原为上校参谋处长，宪基为上校参谋。

伪满成立后，宪奎便一跃爬上伪铁道守备队中将司令的宝座，后来又任黑龙江省长、长春特别市市长，伪翊卫军司令官等要职，而且是身兼数差，骄横不可一世。有一次他检阅军队，见一班长不顺眼，便喝令卸下背包到队伍前面跪下，并拔出军刀要亲手砍头，经大家苦苦哀求，才免一死。后来宪奎之弟宪原继任伪翊卫军司令官。宪章长子金连组（即金志东）也做了溥仪的侍从武官，宪东也任过侍从武官。善耆十二子宪钧参加了伪“满洲国”军队，曾任军医少将、伪满军医院长。

那个臭名昭著的汉奸、日本间谍金璧辉（日名川岛芳子），1906 年生于北

京肃王府，1912年2月12日随父母来到旅顺，并于1914年被送到日本松本市川岛浪速家成为养女。1927年11月，川岛芳子脱离了养父的纠缠，在旅顺大和旅馆与巴布扎布的第二子甘珠尔扎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举行婚礼，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弥太平作证婚人。但结婚不满一年，川岛芳子却突然不辞而别。甘珠尔扎布寻遍了旅顺、大连，都不见踪影，原来她躲进了土肥原在旅顺开办的“国际俱乐部”。后来在东京两三年时间里，水性杨花的川岛芳子过的是放荡生活，并从此投身谍海。1931年11月，溥仪被关东军挟持到旅顺后，川岛芳子也赶到旅顺，向溥仪讨了个到天津接婉容的差事。11月28日，川岛芳子陪婉容乘“长山丸”到大连。之后，她穿梭于京、津、沪及伪满、日本之间，直接参与日本侵华的种种阴谋，曾一度任伪满“定国军”司令，人称“金司令”，这是她平生最得意时期。日本投降后，她被中华民国法院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3月25日在北平宣外第一监狱处决，结束了她可耻的一生。

肃亲王善耆在旅顺十年的复辟活动以及儿女们的叛国行为，罪恶累累。正如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说的那样：“一家满门都是亲日派汉奸。”

注：

一. 本文资料主要是根据卓武山于1963年至1965年间访问所得写出的，先后访问过的有：

金连绥 肃亲王孙子。宪章次子。

罗英 肃亲王孙女婿，升允孙子。

李国祯 肃亲王长孙金连组的妻子，李鸿章孙女。

金光增 日寇西岗警察署巡捕。

张林铨 宗社党人。张华明的儿子。

张成基 宗社党人，张润山的儿子。

路德磐 肃王七子宪奎的汽车司机。

马克济 丸尾合名会社雇员。

韩 谦

林基永 于1918年12月面见过金鼎臣(为人捎信)。

还有刁万通、于鹏九 宫柳村、孙耀庭，杨风鸣，徐敬之，王友仁等。

二. 为了印证历史还参阅了日本官方文献、肃亲王十二子宪钧的回忆、景华：《女间谍金璧辉一生》、草柳大藏(日)：《满铁调查部内幕》、孙宝田：《旅大地方轶事》等

三，引自

①《清史稿·列传六·诸王五》

② 景华：《女间谍金璧辉一生》

③ 日本《外务省的百年》(上)第641页

④ 宪钧《肃亲王善耆的复辟活动》

⑤《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P23 第6910页

(作者单位：大连第51中学)

恭亲王溥伟在大连

孙 棫 蔚

溥伟，号锡晋斋主。满族，爱新觉罗氏，第一代恭亲王奕訢嫡孙。1880年（光绪六年）生于北京，1898年承袭王爵，历任官房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等要职。在辛亥革命时期与肃亲王善耆等组织“宗社党”，宣统帝退位后，避地青岛，为复辟清王朝“毁家奔走，历尽艰苦”^①；在日本再次成立宗社党，两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于1922年迁居大连，做“寓公”十四年。1936年薨于长春，终年57岁。

一、祖父的显耀

溥伟的祖父奕訢（1832—1898），乃清朝道光帝第六子，与奕誼（咸丰帝）同在书房，少颖敏勤学，肄武事，共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道光帝名其枪法曰“棣华协力”，刀法曰“宝铎宣威”，并以白虹刀赐之，深受爱抚。奕誼即位（年号咸丰），封訢为恭亲王。载淳继位后，于同治十一年又降旨准其子孙世袭王爵。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被任命为全权大臣，留京谈判，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1861年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帝死后任议政王，为军机处领班大臣。主张“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同时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办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开展洋务运动，成为清末洋务派首领。后因受慈禧太后猜忌，罢去议政王，仍在军

机大臣上行走。1884年（光绪十年）解职，1894年复任军机大臣。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授宗令。是年王疾作，润三月增剧，光绪帝奉太后之命，三临省视。四月薨，年六十有七。帝再临祭奠，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谥曰“忠”，配享太庙，后来称恭忠亲王。②

奕訢子四，载澂、载浚、载潢皆先王而卒。王薨，以载滢子溥伟为载澂后，承袭王爵。

二、溥伟生平③

溥伟为载滢第一子。二弟溥儒（字心畬，著名书画家）三弟溥偁。

溥伟，郡王衔多罗贝勒载滢之继夫人赫舍里氏候补知府崇令之女所生。

1880年（光绪六年）1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子时生于北京恭王府。

1889年（光绪十五年）十一月赏给翎支缎匹。

1890年正月赏给头品顶戴。

1894年（光绪二十年）奉西太后懿旨本年予六旬庆辰，允宜特沛恩纶延厘中外懋赏之典首重亲贤头品顶戴，交宗人府议叙。

1895年十一月奉西太后懿旨，以员外郎（从五品）善佺之女为溥伟之妻。

1896年十二月奉旨郡王衔多罗贝勒载滢之子溥伟着承继郡王衔；出多罗贝勒载澂为后，并赏给多罗贝勒用，加恩在内廷行走。

1897年二月赏戴三眼花翎。三月补进王公六班，是月派出左翼近支第二族族长。

1898年二月派出正进五六班。四月恭亲王奕訢薨，奉懿旨，承袭王爵。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二月，管理“觉罗”事务。觉罗，清制，奉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为大宗，称其直系子孙为宗室；对其叔伯兄弟的旁支子孙，称为觉罗。觉罗系红色带为标志，别称“红带子”。九月，管理太

庙、祠祭并近支婚嫁等事。

1902年七月，补授正黄旗汉军都统（都统、满语称“固山额真”，领兵7500人，同将军衔）。十一月派出新营房城内官房大臣。十二月派充值年大臣。是年23岁。

1903年二月，派出随扈大臣，四月署理对引大臣。润五月派出稽察火药局事务。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正月调补镶黄旗蒙古都统。

1907年四月管理响导处事务，五月调补正红旗满洲都统（1913年三月，撤去满洲都统职）。是月管理新旧营房。九月署理宗人府。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三月，派充总理禁烟事务大臣。七月奉旨崇文门正监督。十一月奉上渝恭亲王溥伟着穿带唎貂褂。

1911年（宣统三年）奉旨乐部及蒙古音津彪印钥著溥伟暂行佩带。四月开去总理禁烟事务大臣。

1912年，满洲皇族为了挽救清朝的灭亡，反对清帝退位，阻止袁世凯与革命政府议和，于1月14日成立宗社党。嗣因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又策动段祺瑞等发表通电，赞成共和，袁又以“优待条件”为饵，迫使清廷交出政权。隆裕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举行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出席的王公们，大都模棱两可，庆亲王奕劻躲起来不敢露面，后来，竟带着细软和家眷潜居天津享福去了。惟有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主张整兵一战。但隆裕太后顾虑斗不过袁世凯，连“优待条件”也得不到，终于2月12日颁发了宣统帝“退位诏书”。恭亲王见大势已去，遂避地青岛，但其心不死，不时为恢复清王朝而继续活动。1912年3月28日，隆裕太后传谕解散“宗社党”。

九月，奉隆裕太后懿旨，所有从前恩赏王公等府第房地亩，皆赏给溥伟作为私产（民国对清室“优待条件”第七款：其原有之私产，大清皇帝辞位之

后，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三、避地青岛

1912年2月，恭亲王决心不住民国地，遂投靠德国侵略者而避地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于1914年11月占领青岛，于是溥伟又转向日本帝国主义，妄想借日本力量行复辟之举，并发誓“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推行大陆政策，企图先行吞掉“满蒙”，进而独霸中国，因此，便乘辛亥革命爆发之机，日本军部和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直接操纵宗社党人进行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是都失败了。

川岛浪速，日本大陆浪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日本出兵中国时，川岛参加陆军，任翻译。

1901年，被清政府聘为北京警务学堂总监督。川岛与肃亲王关系极密切，并结拜为把兄弟。辛亥革命后，在川岛等人的策划下，1912年2月，肃亲王善耆秘密逃离北京，2月6日到达旅顺，受到关东都督府的热情接待。从此，川岛操纵以肃亲王、恭亲王为首的宗社党，并联络内蒙的喀喇沁王和巴林以及土匪巴布扎布，进行“满蒙独立运动”。

据肃亲王善耆的儿子宪钧在《肃亲王善耆的复辟活动》一文中说：“1914年，大隈重信组阁当了首相，川岛波速便进一步策划利用我父亲进行复辟活动。我二哥宪德去日本东京，一是代表我父亲向大隈重信表示感谢；一是代表我父亲去组织‘宗社党’，并为此向财阀借款。宗社党本部设在东京，大连、海拉尔设有支部。宗社党的主要人物有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以及前陕甘总督升允、巴布扎布等。溥伟的祖父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訢，溥伟是他的嫡孙，有继承光绪作皇帝的资格。“宣统退位后，毁家奔走，为恢复大清江山忠心耿耿。

1916年恭亲王在青岛期间，曾收到前陕甘总督升允自东京派专人送来的专函，这是为复辟清室而举兵起事的极密信件（内容详见《大连文史资料》第三辑）。

升允(1858——1931)，字吉甫，举人出身。蒙古镶蓝旗人。1905年任陕甘总督，1909(宣统元年)因反对立宪被革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重被起用，任陕西巡抚，督办军务。1912年反对清帝退位，率甘肃马安良的“精锐军”、陇东张行志的“壮凯军”等约十万人，东进取陕，连下长武、永寿、邠州、醴泉、咸阳等十余城，妄图攻下长安，迎奉宣统帝，建立偏安西北的小朝廷。壬子三月攻乾州而闻宣统帝逊位诏，他仍带兵顽抗，由于将士拒绝作战。乃匆匆西退。1913年暂居青海之西宁以待时机。未几，库伦内变起，乃谋渡日，先取道恰克图，至乌金斯克，辗转换西伯利亚南满车往大连，渡海至日本东京，1914年在东京参加宗社党。④1917年初回国后，往来天津、上海，大连、青岛之间，与宗社党人暗中活动，1917年张勋复辟，他曾劝说旧部，企图以甘肃为复辟基地，未成。溥仪到津，授升以顾问，但为溥仪近侍所嫉。1931年秋，病卒于天津，终年七十有四，赠溢号“文忠”。

信中提到的孟贤，姓高，名起元，举人出身，曾随肃亲王善耆来旅顺，任工大与二中两校教师。刘潜楼，名廷海，光绪时翰林，官至侍郎，当时亦寓居青岛，与溥伟交往甚密。信中提到的“贵介弟姻事”，是指恭王二弟溥儒，字心畬，是著名的书画家，他后来取了升允的女儿为妻。

1916年，袁世凯龙袍加身，僭称“洪宪”皇帝，讨袁声浪，席卷全国。宗社党抓住这个时机，通过巴布扎布举兵反袁，企图实现满蒙独立。在这之前，川岛浪速等人在大连拥立肃亲王，在大连、安东(今丹东)、貔子窝(今皮口)等地招兵买马，秘密组织叛军。当时已组成宗社党“勤王军”2000余人，并开始训练工作。他们于1915年夏，同盘据在内蒙古的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扎布

取得联系，策动巴布扎布所部与以肃王、恭王为中心的宗社党相结合。

1916年1月下旬，肃亲王第七子宪奎，在青柳胜敏（预备役骑兵大尉）的陪同下，前往巴布扎布驻地，联络共同举事。3月，术泽畅（预备役步兵大尉）以及刚退伍的工兵大尉入江种矩赶到大连，接着川岛便在大连设置了举事的指挥部。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直接担任幕后指挥。他把土井市之进大佐派往中国东北，任土井为此次举事的总指挥，并由大仓喜八郎借给肃王一百万元的资金，拨给五千枝步枪和八门野炮。土井、川岛等人预定4月15日举事。^⑤

川岛等人的举事计划继续进行，预定六月中旬，从奉天（沈阳）开始，在庄河、复州、辽西、本溪湖等地举事。这时，袁世凯突然于6月6日死去，由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日本政府由反袁政策转而采取援助段祺瑞的方针，以便控制中国。因而，“满蒙独立”活动也被迫停止了。但是，巴布扎布率领的三千蒙古骑兵，在日本军官青柳等人的指挥下，打着“勤王复国军”的旗号，从7月1日向洮南进攻，7月20日过突泉，被张作霖部下的吴俊升部队击败。8月10日到达洮南，渡过东辽河，于14日占领“满铁”沿线的郭家店。为了壮大巴布扎布的兵力，又将在关东州（旅大地区）内的宗社党勤王军约700人，分两批于8月22日运抵郭家店，为巴布扎布虚张声势。^⑥

这时，由于日本政府对华侵略方针的变化，解散巴布扎布的“蒙古军”和宗社党在大连、安东、貔子窝等地的军队问题，派遣曾与川岛浪速共同策划的首脑人物外务省参政官柴四郎、预备役海军中将上泉德弥、议员押川方义和国民议会的五百木良三等人到旅顺处理善后事宜，经过反复协商，于1916年8月16日达成协议。在西川参谋长致田中参谋次长《关于解散满蒙举事团的经过报告》中所述协议如下：^⑦“……为使巴布扎布所部蒙古军退出我势力管辖范围以外，已决定由关东都督府所保管的公用武器中拨付步枪1200枝，子弹24万发。野炮4门，榴弹180发，榴霰弹380发，手榴弹100颗，并即运往四平街。”

8月30日，川岛浪速偕同松本菊熊等人前往郭家店。向巴布扎布所部进行

慰劳，并劝他们返回内蒙驻地。9月2日巴布扎布所部携带着日本提供的上述武器，在日本军队的护送下，由郭家店出发，返回内蒙古。9月间到达内蒙古林东，准备重整军马。10月初，在进攻林西县的一场战斗中，巴布扎布被奉军击毙。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遂告破产。

肃亲王善耆在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中，费尽心机，家产几尽，最后梦想成空，终于1922年2月薨于旅顺，后葬于北京。

四、在大连作“寓公”

肃王的突然病逝，对恭王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知道，从此宗社党的活动将再次瓦解，恢复清室的希望将化为泡影。

1922年(民国十一年)秋日，溥伟自青岛移居大连，筑室“星浦山庄”(今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西村61号，三层黄色独楼，现为“大连星海宾馆”)。匾额为李西用隶书题的。李西，字东园，自号石竹山人。清光绪五年生，祖籍山东福山，后迁金州。曾以国学生选翰林院侍诏，清末辞职归里。是著名的金石、书法家。

恭王到“星浦山庄”后，临池赋诗，挥毫以自遣怀，广交大连诗坛、书法界文人。到大连后基本上不再过问“政治”，宗社党已经停止活动。

恭王作《星浦山庄》闻雁云：

露下青槐陌，秋深白豆篱。

寇氛兴未艾，游子怅何之。

仆仆将焉获，劳劳多所思。⑧

溥杰回忆说，1927年，我为了投靠张学良，不辞而别，自天津乘日本货船天潮丸到大连。哥哥溥仪托日本驻津总领事馆通电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署监视我。就有一名日本翻译同四五名日本警察登船检查。一看到我就问：“您是从天津来的前皇帝溥仪的弟弟么？”我知不能隐瞒，只得承认。中岛说：“请您先到星浦大和旅馆歇一歇。”我在大和旅馆共度过约十来天的软禁生活，他叮嘱我不要对报馆记者谈什么，说是怕引起中国方面的误会。

日本警察除领我参观了海产馆等之外，还领我到大连市郊溥伟（前清恭亲王，在大连作“寓公”）家一次。他一见我就哭了，并称赞我有“志气”。向他求教应不应该乖乖回去时，他思考了一下说：“有人来找，怎能不回去？”最后，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徐勤之子徐良把我接回了天津。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积极筹划建立全东北的傀儡政权，采取了种种阴谋手段。一面先后派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和金梁到天津，劝诱溥仪；一面派当时的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把恭亲王溥伟从大连弄到沈阳，让他当“四民维持会”会长，扬言要以溥伟为首建立“明光帝国”，迫使溥仪尽快来东北。为了扩大影响，在日伪警宪簇拥下，溥伟穿上亲王的团龙黼黻，特地到沈阳祭陵。这一招对一心想当皇帝的溥仪还真奏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对某些现象不由得有些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郑孝胥对溥仪说：“千万不能错过时机，日本人一旦把溥伟扶上去……”溥仪这时的态度“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日本关东军终于在1931年11月18日把溥仪弄到旅顺大和旅馆，加以严密封锁，就是他们家人也不准接近。

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溥仪迁到肃亲王善耆（这时已死）的儿子宪章家里去住（肃亲王府邸当时在旅顺太阳沟旭川町60号，今新华大街9号，为旅顺驻军所用）。

日本关东军挟持溥仪已成，便把在沈阳的溥伟劝回大连。溥仪为了争当皇帝，对恭王溥伟始终戒备。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潜行旅顺后，天津

和北京的一些想做官的遗老们借口服侍我，跑到旅顺来，也都被郑孝胥挡了架。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遇到拦阻。”如果不是溥仪“谕旨”，郑孝胥何以敢挡王爷驾?!

肃亲王善耆的第十二子宪钧(伪满时期任军医少将)回忆说：伪满成立后，“溥仪对溥伟也是不放心，始终没有给他一个职位，就连零钱也不肯给。后来贫困至极，死在长春旅社里”。

1934年(康德元年)3月，伪“满洲国”改为伪“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恭亲王溥伟奉旨祭祀三陵、太庙。溥仪命溥伟着以行装行礼，并加恩准其佩带白虹刀。^⑩

1935年(康德二年)，伪满皇帝溥仪为避寒，1月21日午后七时，乘专车抵达旅顺车站。直赴新市街高崎町前关东军司令官官邸之行在。1月23日上午10时30分，溥仪在行在静养，赐见在大连作“寓公”的恭亲王溥伟。“圣心”极为欣悦，一同午餐，直欢叙至下午一时余。⁽¹¹⁾

1936年11月24日(丙子十月十日)卯时，恭亲王薨，年57岁。是日溥仪谕旨：“恭亲王溥伟秉性忠诚，操行直毅，才猷闳达，学识渊通，自袭爵后，历充差便恪恭尽职。

辛亥以还毁家奔走，历尽艰苦，坚贞不渝，及满洲建‘国’，该亲王随时展对，启沃良多，忠爱之忱，惓惓匪懈。王以九月十三日来京时患感冒，痰嗽，叠经朕遣医诊视，方冀病痊，不意该亲王遽尔薨逝。曷胜轸悼著赏给陀罗经被，派熙洽前往奠醊，特赐谥曰‘忠’，并赏给丧费三千元，用示笃念亲贤之至意”。⁽¹²⁾

每年旧历正月十四日，是溥仪的生日，即“万寿节”。届时溥伟以前清恭亲王名义，向皇帝祝寿，但恭王来时从不住宫内，都下榻在站前大和旅馆(今长春市春谊宾馆)或越香村大旅社(溥伟经常住此，最后薨于该旅社，宫廷“学

生”都去吊孝。)(13)

五、恭王家属简况

溥伟的儿子毓蟾，号君固，现是中国艺苑创作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驰誉中外的书法家，为中日文化交流曾访问日本，为增进中日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今年春节前夕，笔者曾拜访毓蟾先生。

君固先生说：“我也是大连人，1923 年生于大连黑石礁，1937 年离开大连去长春作宫廷‘学生’，直到 1945 年伪满垮台。”当我提起能否介绍一下承袭王爵经过时，这位 66 岁的老人不胜感慨地说：“至于我个人，应该时时解剖自己，不要忘了过去。我所以能有光明幸福的今天，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教育、改造和挽救，使我弃旧图新。过去已经成为历史，如果实在想了解，在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中称‘小固’者即是我。《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一书有我的回忆录两篇……”。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431 页中写道：“小固(即毓蟾，号君固)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溥伟去世后，我以大清皇帝的身份赐他袭爵，把他当做未来‘中兴’的骨干培养……”。

同毓蟾一起学习的宫廷学生毓塘(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称“小秀”者)回忆毓蟾袭恭亲王爵时说：“大约是七七事变后(实为 1939 年)，恭亲王溥伟死去后，家中生计困难，他的侧福晋偕毓崧(毓蟾弟，解放后改学兽医)，从大连带着他们恭邸那把白虹刀，据说这把刀柄上镌刻着‘此刀曾杀第一忠臣’八个字(毓蟾说，纯系讹传，刀柄上根本没有八个字)，是清初扬州屠城时，豫亲王多铎用它来杀史可法的那把刀，鲨鱼皮刀鞘上还镶着宝石；还有大阅御用紫宝石黄丝腰带和咸丰皇帝给奕訢的手书朱谕这三件宝物，来长春投奔溥仪，毓崧也被收入宫内一齐读书，和我们一样当学生，他母亲在外边住。1939 年的某

一天，溥仪通知我们去缉熙楼上西头他的书斋，给毓瞻(小固)袭爵。我记得溥仪坐在南面，小固跪着，我们都站在旁边，听溥仪讲话，没有啥庄严的仪式，只是勉励小固，要象老一辈恭亲王那样，不要辜负祖先之类的嘱咐，因为这里毕竟不是当年的北京清政府，只是沿袭故实地渲染一番而已。所以以后，除侯二叔好和他开玩笑，因小固经常剃光头，叫‘秃王爷’外，我们弟兄之间，谁也没有把他当作王爷来尊重，仍然是毓瞻称之”⁽¹⁴⁾

真是名存实亡的末代王爷。毓瞻先生曾风趣地说：“我是小鱼穿在大串上。”从此他便与溥仪共沉浮二十年(1937年进宫学习到1957免于起诉释放为止)。

注：

本文史料多由恭亲王溥伟之子，大连籍的中国末代王爷—爱新觉罗·毓瞻先生提供，特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①③⑩⑫毓瞻提供的《爱新觉罗氏家谱》

②《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七》

④罗继祖《庭闻忆略》

⑤《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册。第632—633页

⑥《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P2 3第6910页

⑦同⑥第6875—6876页

⑧孙宝田《恭亲王溥伟移居大连时的诗》(见《大连文史资料》第三辑73页)

⑨溥杰《溥杰自述》(见《文史资料选辑》100辑302—303页)

(11)《溥仪宫廷活动录》(1931—1945)第59页

(13)爱新觉罗·毓瞻《伪满时代的溥仪》(见《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第52页)

(14)同上第53页

(作者系大连第51中学教师)

旗人在大连地区

瀛 云 萍

“旗人”，就是清代八旗组织所辖军民的总称。“旗”，是清代特有的一种军民合一的社会基本组织。它既是军队组织，又是民政组织，只有不同的旗籍番号，却无固定的地域。

八旗组织中，有“满八旗”、“汉八旗”、“蒙八旗”的区别。

“满八旗”又称“八旗满洲”，简称“满旗”或“满洲”，是努尔哈赤组成的。先是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组成了“建州四旗”的队伍是从女真氏族公社末期的狩猎组织发展而来的。原来的狩猎组织，是每十名猎手为一“牛录”(意为大箭)，每牛录的头人称“额真”(意为“主”)。自1589年开始，努尔哈赤以牛录为军队组织，每一牛录的兵丁有百余人不等。牛录额真变成军官名(汉译为“佐领”)，对所属的兵丁有指挥、制裁的权利。到1595年，努尔哈赤直属的兵员已达五千多名；到1601年，归附努尔哈赤的部落首领有190多员，兵丁的数量更有大幅度的增加。于是努尔哈赤将所有的牛录统一编成四个固山(汉译为旗)，系狩猎四方合围之意。其总领四方的为“中旗”，旗用正黄色，居北方，其他三方面为“围翼”：西方用红色，东方用白色，南方用蓝色。行动时，每旗都有定向，又建立了严密的军法条令。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对其所属的军队又进行了整编，在牛录额真之下，增设两员代子(汉译为骁骑校)为牛录额真的副手；四员章京，四名领催(满名“拔什库”，主管钱粮文书的小吏)。每一牛录的兵丁均分四份，每一章京管领一份，生产、生活、作战等一切事务，均由章京直接管理。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到此完成。战时，兵员自备马匹给养等。

在原有四旗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四旗。原四旗称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新四旗称镶黄旗、镶白旗、镶蓝旗、镶红旗，即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镶”字，常被写作“厢”字。八种旗帜上均绣有龙图腾，

颜色与旗色相同。

按规定每一牛录为三百兵，合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汉译为参领)一员统领之。合五甲喇为一固山，由固山额真(汉译为都统)统领之。固山额真之下设梅鹿额真(汉译为副都统)左右各一员。后来每一牛录不一定是三百兵，每一甲喇也不一定是五牛录，每一固山也不一定是五甲喇，差额很大。

初编成此八旗时，共有 400 个牛录，平均每旗 50 个牛录。其中蒙古、女真混合牛录 306 个，纯蒙古牛录 78 个，纯汉人牛录 16 个。后又加入朝鲜牛录 5 个，共 405 个牛录。这是建州女真开始建立八旗的“民族成分”。

天聪九年(1635 年)，后金太宗命改“诸申”(女真、肃慎)八旗，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满洲”，从此才开始有“八旗满洲”的称呼。同时在八旗的民族成分上，“满洲”也就不等于“女真”(诸申、肃慎)了。

“八旗汉军”：就是由汉人组成的大清国统治支柱的“旗兵”。它不同于最早编入八旗满洲的 16 个汉人牛录，也不同于后来编成的“绿旗兵”，无论在编制上、待遇上都不相同。先是天聪七年(1633 年)四月，明将孔有德、耿仲明率军归清。清太宗命他们仍领本部，称“天佑军”，旗用白镶皂。同年七月太宗下令原分隶于满洲各旗的汉族壮丁，于每十丁中抽出一丁，披甲入伍，共得 1580 名，编成一个汉军旗，旗用黑色。同年 12 月明将尚可喜又率部归清，太宗仍令他统额本部，称“天助军”，旗用皂镶白。

崇德二年(1637 年)七月，太宗将一旗汉军扩编为左右两翼旗，两翼均用黑旗。崇德四年太宗又将两翼汉军旗扩编为四旗汉军，各固山额真之下增设梅鹿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四个汉军旗的旗帜是：正黄旗(蓝旗镶黄边)、正白旗(蓝旗镶白边)、正红旗(蓝旗镶红边)、正蓝旗(蓝旗镶蓝边)。崇德七年(1642 年)六月太宗又将四旗汉军扩编为八旗汉军，旗色、编制、官兵员额、官职称谓皆同于“八旗满洲”。唯满旗旗主为世袭，而汉旗各级官员皆为流官。

同年八月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奏请以所部属汉军旗。帝准其奏：于是以孔部属汉军正红旗、耿部属汉军正黄旗、尚部属汉军镶蓝旗。

“八旗蒙古”是天聪九年(1635年)太宗将先后归服的蒙古部众(不包括科尔沁)及先编入满旗的蒙古壮丁的小部分抽出，合编成“八旗蒙古”，旗式、编制一切均如八旗满洲。

其后又将先后收服的女真部落分别编入满旗中。

这样满八旗、汉八旗、蒙八旗各旗的人数，牛录数随时增加。“旗别”成了“籍贯”，各旗的成员遍及全国，均以牛录为单位，归各所在地的军事长官指挥。

我们大连地区：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金州地区就地编成满旗，共征丁576名，其中百人披甲，余为附丁。约合五丁供一披甲兵，驻防金州原地。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685—1687年)间，有一批“随龙入关”的八旗满洲，又随帝出关到盛京，然后分配到东北各地，其中有的就被分来金(州)、复(州)地区。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金州就地编成巴尔虎人一个正白旗，驻防金州东门外。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将金州城以南到海滨半岛上的全部汉族居民，都整编入族变成旗人，并分别编为汉军正黄、镶黄、正白三旗：正白旗包括今旅顺、水师营、北海一带居民；正黄旗包括今青泥洼、龙王塘、营城子一带居民。同时又在庄河(时属岫岩)扩编了汉军镶蓝旗。

据《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五《兵志》记载，盛京驻防兵数量中，雍正年间复州驻有满洲兵、蒙古兵，巴尔虎兵共599名，统由城守尉管辖。金州驻有满洲兵、巴尔虎兵、汉军旗兵共830名。金州1681年设城守章京，1687年改为城守尉，1843年熊岳副都统移治金州。岫岩驻有满洲兵、蒙古兵，巴尔虎兵共547名，统归城守尉管辖。旅顺水师营驻有汉军旗兵560名，归协领管辖。

复州城守尉管辖满八旗(蒙兵在满旗内)、巴尔虎一旗共九旗。金州副都统直辖汉军三旗、满八旗、巴尔虎一旗、共十二旗。

岫岩满族的来源(庄河是 1906 年从岫岩分出来的) (载《满族研究》创刊号):

- (一) 1621 年(天命六年)太祖派来征服岫岩的旗兵。
- (二) 1633 年(天聪七年)太宗堂弟济尔哈郎带来岫岩驻防的旗兵。
- (三) 1687 年(康熙二十六年)从北京拨来驻防的旗兵。
- (四) 1692 年(康熙三十一年)由张家口调来驻防的巴尔虎旗兵。
- (五) 1697 年(康熙三十六年)拨来八旗的锡伯族兵员。

(六) 1726 年(雍正四年)从山东、云南拨来报地植田的汉人; 分别被拨入汉军正红、正黄、镶红、镶蓝四旗中。

“旗人”原来并非是一族。但由于八旗牛录制是军民合一的组织, 清廷有“旗、民不通婚; 旗、民不交产; 旗、民不同刑”的规定, 而旗人与旗人之间, 不问原来是什么民族, 都是婚姻互通的。尤其是满汉之间、满蒙之间的婚姻关系最为密切。而旗人与民人之间, 就是汉军旗与民人(基本上就是汉族人)之间, 也是不准通婚的。经过大清二百六十多年的长期通婚融合作用, 到清末“旗人”已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血族集团。旗人内部, 再没有汉、满、蒙各族的单一民族血统的成员存在, 又基本上都使用了汉语汉文。“旗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已经基本形成。所以民国三年四月出版的《旗族》杂志第一期中, 有一篇《旗族解》的文章指出: “八旗制度, 又有满洲、蒙古、汉军之畛域呼?……究其实质, 固非纯一血统; 然往迹流传, 俱可考见, 有清一代之历史, 其血统、语言、文字、宗教、住所、习惯、精神、体质确已纯然同化矣。”该文作者的结论是: “在旗人内部不应再分汉满蒙三种旗人, 而应统称‘旗族’。”

实际上彼时旗人有的已自称“旗族”矣。我们在大连金州区七顶山满族乡找到了一块满族人又姓满的居民的祖墓碑, 碑文中就明白写着“籍列旗族”字

样。碑主人现住七顶山满族乡老虎村，碑现存于乡政府。其碑文如下(原为竖写，刻在墓碑背面，标点为笔者所加)：

尝闻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皆欲勒诸金石，以期永垂于不朽也。昔我祖由燕京之赴金邑也，同胞兄，扶老母，远旧地，历山河，籍列旗族，受职行伍，蒙思元息，耕田教子，背井离乡，荒烟满目，此皆我祖之辛苦备尝者也。于是我祖卜居老虎山，伯祖奉老母卜居东房身。先择吉地于台子山阴，又择佳城于南山之阳，安居乐业，以终天年。于是乃安是土，乃宴新居，幸得子孙绳绳，百世荣昌，瓜瓞绵绵，千载吉祥。谨修墓志，以慰泉壤。幽冥虽隔，情理何殊。我祖有灵，尚其来飨！择字二十以备后辈名次选用，仅将二十字开列如左(下)：

廷玉连治永，德明继世荣，
运兴增鸿业，文士复元成。

现在大连地区内的全部旗人，基本上都报称满族。但今天的“满族”，同清初的满族，已有很大区别。清初的满族指的是“八旗满洲”的成员，他们操满语、用满文；而今天的“满族”，指的是清代全体“八旗满洲”、“八旗汉军”和部分“八旗蒙古”的成员，都操汉语、用汉文。因此，今天的满族，确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其民族传统已非昔比，沿用“满族”旧称，不如称“旗族”更合乎历史的客观现实。

大连地区现阶段的满族(旗人)与汉族(民人)之间，做为民族的区别来说，已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了。自从清朝道光(1821—1850年)以来，“旗、民不通婚”的规定，已被历史的洪流所冲破，婚姻既通了，其他还有什么不能通的呢？

我们大连地区1964年填报满族的只有126,835人。到1986年底填报满族的竟达214,320人，增加了68.97%。究其原因，除了自然人口增加的小部分外，其余都是原来错报了汉族，或有双层族籍的人们，都改报了满族。这些改报的人们，他们报汉族时，谁也没看出他们不像汉人；今天改报了满族，谁也看不出他们不像满族！他们身上的满汉特征何在呢？

现在大连的满族已建立了六个满族乡(镇)

名 称	全乡 人口数	满族 人口数	乡(镇)政府所在地	建立的年月日
三台满族乡	25, 982	9, 482	瓦房店市政府正西 3 3 公里	1984 年 11 月 30 日
老虎屯满族镇	24, 94 3	7, 909	瓦房店市政府西偏北 17 公里	1984 年 11 月 29 日
杨家满族乡	2 5, 407	8, 341	瓦房店市政府西 22 公里	1984 年 10 月 1 日
七顶山满族乡	20, 9 81	8, 393	金州区政府北偏西 1 8 公里	1984 年 12 月 20 日
石河满族镇	2 7, 667	10, 660	金州区政府北偏东 2 8 公里	1987 年 6 月 25 日
三架山满族乡	22, 649	10, 140	庄河县沿正北 41 公里	已批准成立满族乡

这六个满族乡镇，都是满族人口分布较多的地区，但总共只有满族 54, 925 人，只占全市满族人口的四分之一弱。此外，庄河县的小孤山镇、太平岭乡、高岭乡、桂云花乡、塔岭乡，徐岭乡、平山乡、英烈士乡、大营镇、荣花山镇；瓦房店市的李官乡、复州乡、太阳升乡等，都是满族人口分布较多的地域。

大连市各县(市)区都有满族的分布，据 1986 年底的统计数字看，瓦房店市 65, 544 人，庄河县 63, 856 人，金州区(52,660 人，新金县 1 2, 273 人，其它五区(中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和旅顺口)合计 1 9, 805 人，长

海县最少，只有 182 人。市内以甘井子区最多，有 6, 825 人。

(本文作者系大连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已退休)

鳌拜的后裔在庄河

瀛 云 萍

鳌拜，清八旗满洲镶黄旗人，瓜尔佳氏，初为护军校，以战功历迁至高级将领。顺治末，以二等公拜少保，加太子太保兼太子太傅。世祖歿，受雇命为康熙帝辅政四大臣之一。后以罪与其子那摩佛皆革职籍没拘禁。拜死于禁所。

当其全家被收时，有一孙名尔坠者，原为顺天府(北京)一领催(管后勤的)小吏，时在岫岩服役得免。事后除役归田，改隶于镶白旗，定居于今庄河县仙人洞南二十里许之地。尔坠的曾孙始改汉姓为金，遂称其居地为金家屯。

女真瓜佳氏为金裔大姓，其人口占全女真人三分之一弱，改汉姓时多姓官(关)，亦有姓葛的，姓金的很少见。

我们到庄河县太平岭乡采访时，有该乡帽盔大队青林小队金家屯居民金玉国者，到乡招待所向我们反映情况。得知蓉花山乡金家屯住有金姓三支，共五十多户，另有一支迁往鞍山，皆鳌拜后裔。有宗谱传世，现存于庄河县机电局长金福元手。

于是笔者与市民委徐桂芳同志三访金福元同志(中共党员)，得他帮忙亲写其家谱于下：

金 氏 谱 书

我们金家的谱系，元明以前迄无文字可考。据谱书记载，清朝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称他为一世祖，原系镶黄旗人，康熙八年被罪

革职。

三世祖尔坠，清时任顺天府领催，至岫岩州供职。因罪臣后裔而改属镶白旗，遂定居于现在庄河县仙人洞南二十里处，前临庄河，后依小山，取名金家屯。兹将一世祖鳌拜以下各祖考分支列下，以备慎终追远，知我金家之所出。

我们金家的辈行，按三十二字顺序排列，即永（润）中洪玉，福国（延）兆庆，立志修学，振起文明，秉诚守正，继世显恒，绍祖惟德，长保繁荣。从谱学来看，概是从八世祖开始才按字序论辈的。六世时，虽以“龙”字为辈，但并未固定。

一世祖鳌拜，清朝康熙帝辅政大臣，祖母吴大汉。

二世祖多吉里，祖母不详。 ‘

三世祖尔坠，曾任顺天府领催，祖母于氏、朱氏。生四子，长子名偏头，次子名七十三，妻李氏，三子苏合纳妻石氏，四子留明。

四世祖父苏合纳生四子，长子虎尔敏妻徐氏、王氏，次子锁柱妻李氏，三子田保妻王氏，四子少夭无后。

五世祖父虎尔敏生四子，长子金龙兴妻李氏，次子金龙顺妻唐氏，三子金龙钱妻王氏，四子金龙升妻曹氏。

六世长支祖父金龙兴，生一子金禄妻曹氏。

七世祖父金禄生三子，长子金永海妻张氏，次子金永江妻石氏，三子金永昌妻曹氏。

八世长支金永海生四子，长子金中绅妻陈氏，次子金中福妻陈氏，三子金中玲妻张氏，四子金中显妻寇氏、白氏。

九世长支金中绅生四子，长子金洪斌妻何氏，次子金洪殿妻白氏，三子金洪喜出继二支中福为子，妻朱氏，四子金洪来妻刘氏。

十世长支金洪斌生二子，长子金玉堂妻白氏，次子金玉芳妻王氏、刘氏。 .

十一世长支金玉堂生一子金福林妻李氏。

十世二支金洪殿生四子，长子金玉坤，次子金玉庆妻石氏，三子金玉洲妻

陈氏，四子金玉波妻李氏。

十一世长支金玉坤生四子，长子金福安妻杨氏，次子金福祥妻姜氏，三子金福成妻陈氏，四子金福九妻李氏。

十一世二支金玉庆生五子，长子金福广妻林氏，次子金福玉妻吕氏，三子金福平妻梁氏，四子金福明妻趟氏，五子金福弟。

十一世三支金玉洲生三子，长子金福洪妻于氏，次子金福春妻王氏，三子金福俊妻黄氏。

十世四支金洪来生一子金玉珂。

十世三支金洪喜生五子，长子金玉满妻陈氏，次子金玉清早亡，三子金玉秀妻耿氏，四子金玉太妻张氏，五子金玉德妻百氏。

十一世长支金玉满生四子，长子金福和妻姜氏，次子金福宽妻刘氏，三子金福有妻耿氏，四子金福岩妻姜氏。

十一世三支金玉秀生三子，长子金福仁妻王氏，次子金福辉，三子金福成。

十二世长支金福仁生一子金国庆。

十一世四支金玉太生五子，长子金福堂妻陈氏，次子金福民妻白氏，三子金福礼妻白氏，四子金福臣，五子金福田。

十二世长支金福堂。

十二世二支金福民生一子金国军。

十一世五支金玉德。

九世三支金中玲生二子，长子金洪文妻杨氏，次子金洪坤妻战氏。

十世长支金洪文生三子，长子金玉富妻趟氏，次子金玉有妻朱氏，三子金玉盛妻傅氏。

十一世长支金玉富生三子，长子金福昌妻张氏，次子金福满妻周氏，三子

金福海。

十一世二支金玉有生二子，长子金福臻妻张氏，次子金福喜妻孔氏。

十一世三支金玉盛生三子，长子金福涛妻白氏，次子金福弟妻石氏，三子金福润妻刘氏。

十世二支金洪坤生八子，长子次子皆早夭，三子金玉祥妻李氏，四子金玉柱妻吕氏，五子金玉仁妻寇氏，六子金玉良妻黄氏，七子金玉鹏妻刘氏，八子金玉楷妻白氏。

六世二支金龙顺生三子，长子金福妻曹氏，次子金桢妻高氏，三子金祥。

七世长支金福生三子，长子金永成妻孙氏，次子金永山妻李氏，三子金永良妻李氏。

八世长支金永成生一子金中堂妻于氏。

九世金中堂生四子，长子金洪礼妻马氏，次子金洪升妻孙氏，三子金洪义妻趟氏，四子金洪圃。

十世长支金洪礼生五子，长子金玉昌，次子金玉普妻陈氏，三子金玉珠妻鞠氏，四子金玉和妻孙氏，五子金玉云妻鄂氏。

十一世二支金玉普生一子金福元妻鄂氏。

十二世金福元生二子，长子金延涛，次子金延波。

十一世三支金玉珠生五子，长子金福忱，次子金福有，三子金福钢，四子金福喜，五子金福天。

十一世四支金玉和生二子，长子金福九，次子金福成。

十二世长支金福九生二子，长子金延辉，次子金延军。

十一世五支金玉云生三子，长子金福贵，次子金福财，三子金福平。

* * *

这分宗谱可说明以下历史问题：

(一) 鳌拜后裔落于我大连市庄河县。

(二) 这样高级官员家庭汉化的时间远较一般平民为早，他家改汉姓、取汉名、从汉俗，随汉人论字排辈，至今已有七世矣。而一般百姓改汉姓用汉名，

有的至今只有二世。改汉姓用汉名的同时说明已改用汉语、汉文。

(三)由其配偶上可证明满旗与汉旗、巴尔虎旗皆通婚，与“民人”也通婚。其女方的寇氏、白氏、满氏乃巴尔虎旗人。曹氏、尚氏乃汉军旗人，尚氏乃尚可喜后人。而鞠氏、于氏、李氏多“民人”。

(作者系大连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已退休)

参加足球活动的回忆

罗 仙 樵

我爱好足球，开始只不过是好玩而已。没想到它支配了我的前半生，而后半生又沾了它的光，虚度了四十多年。

我从 15 岁开始踢球，18 岁时找了几个小青年组织了一个隆华足球队，在大连踢了十几年。后来由于奔走衣食而离开了球队，对足球这项活动，似乎是打上了终止符。谁知道全国解放后，我又回到了体育战线，当了一名中学体育教员。本来还想在这方面做点什么，可是实际上只做了些杂务工作。一晃 40 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不胜感慨系之。

我 15 岁那个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景气时代。尤其是大连那个地位特殊的“自由港”。各国的商人在那里开设了不少洋行。我那时正好从公学堂高等科毕业，学校动员我和同学阎泰运、阎宝士三人去日本留学。我因年纪小不愿离开父母，故而失去了这一留学的机会，结果到新设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当了一名小学徒。

那时候懂英文的很吃香，一些人都想学点儿英文，能找个好的工作多赚一点钱。我也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半工半读地去当时设在骏河町的华商夜校学习英文。

校长傅先生是烟台益文出身的，爱好足球。他组织了个华商足球队，队员都是该校的学生，每天都到老虎花园(今劳动公园)去练习。我喜欢足球，也就跟着去踢上几脚。我踢足球可以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有一次华商队对青年会队比赛，华商的人没有来齐，傅老师让我替补，我就穿了一双比我的脚还大一寸的球鞋下了场。说实在的，那不是下场踢球，而是在场内看别人踢球，这就算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吧。

老虎花园这个小场子在“满铁”棒球场的南面，中间隔着一条小河沟，东西有两个球门。这里没有人管，所以一些小青年都到这里来踢球。谁有球，谁

为主，说了算，不管有多少人，平均分成两个组，没有裁判，也不管犯不犯规，乱踢一通，踢进球门就算赢。有时还两个足球同时踢，满场乱飞，你踢你的，我踢我的，各不相顾。

正隆银行有六、七个人天天到这里来，他们有个球，一些人就围着这个球踢。他们中间有郭义达、刘义昌、李成平、杨永卿、孙德尊等。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互相认识的。

他们的集体宿舍在西岗子正隆银行支店院内，正好是我家小铺子的对门，于是，见面接触的机会多一些，就更亲近了。

到 1925 年，我已经踢了几年球，自己觉得踢得不错了，就和刘义昌、郭义达他们商量，想组织个球队，找人赛一场，看看怎么样。于是，就把常到老虎花园(后改称中央公园)来的一些小青年集合在一起，组织了个中央队，约青年会的球队比赛了一场。可一阵就被打黄了。组织不健全的乌合之众，是经不起临场对阵的。

有了失败的教训，大家商讨着要组织一个象样的队。但是，当时对于足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运动，应如何建队和比赛等等，知道的不多，于是就设法买些有关的书来读。那时大龙街只有一个启华书局，这里只有武侠小说，根本没有卖体育书刊的。后来到外地买了几本书来读，才逐渐提高了对足球运动的认识。特别是读了当时蜚声遐迩的球王李惠堂先生写的《足球》一书，更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足球的历史。

从此，我体会到要组建一个球队，第一要有个名称，第二要有个宗旨，第三要有个纪律。

因为队里有七八个正隆银行的职员，就商定以正隆银行的华人球队做为招牌。定名为“隆华足球队”，取兴隆中华的意思。

当时也想不出什么堂皇的宗旨，只定个“互相团结，锻炼身体”八个字。

此外又定了几条纪律。球队建立以后，大家选我当队长，接着又吸收了一批队员。学生有耿思华、张文焕、张维忠、孙福德、战凤台、陈英凯，工人有王鸿玉、王鸿林、王永盛、靳福合。

那时根本没有球场。有一片空地，有两个球门就算不错了。边界线都是现画的。每逢有比赛时，我就和刘义昌、郭义达、杨永卿四个人拿根绳子，背桶石灰和旗子去布置。所谓足球场，只不过是一块空地，画上几条白线而已。因为没有护栏，比赛一开始，观众就往场内拥，巡边员一面巡边，一面还要像变戏法打场子那样劝观众出场，甚是辛苦。

隆华队约战青年会队就是在法院南面这样的场地上进行的。

中华青年会队(又称中青队)当时是大连最强的队。新成立的隆华队因前年以中央队的名义和他们赛了一场，一阵就被打黄了。所以有人怕输，想约个弱队比赛。我说：“那次比赛我们还是‘乌合之众’，被打败并不稀奇。现在我们是个有组织的队了，不能怕输，没有输就没有赢，我们应该在失败中吸取教训，提高球艺。任何事物都得从头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没有一下子就能到达顶峰的。”大家听了我的话，同意向中青队约战。中青队正愁没有对手比赛，欣然同意。并且约好踢三场，比个高低。

第一场，隆华队还不是对手，被中青队射进了六个球。

正隆银行的队员在西岗街我家的对门有个集体宿舍，那是一间有 20 个“塌塌密”大的屋子，很宽敞。于是就成了隆华队的队部。每次比赛后都回到这里。我拿出一元钱，诸位年小的队员去饼干工厂买一桶饼干(那时一块金票就能买一洋油桶日本的龟甲煎饼—饼干)再到我家打点开水泡壶茶，大家团团围坐，边吃边谈。开会也没有什么规矩，你一句，我一句，互谈心得和感受，也有批评和指责，但这都是在心情舒畅，轻松友好和笑声中进行的，非常活跃。最后我做总结，提出改进的目标，就散会。这个会每次赛后都开，无形中成了一个制度。

第二场比赛是在第二个星期天进行的。这次比赛又被踢进了三个球。球虽然输了，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有了进步，缩短了差距。

第三次比赛又以 0 比 1 败北，真是连败三阵。球虽输了，可得益非浅，不仅受到了锻炼，而是熟悉了对方的打法，从而认真地研究了对策。

中青队在连胜三场以后，总觉得不够过瘾，又约我们再赛一场。结果这第四场竟以 0 比 0 踢平，赛中已给了中青队以很大的威胁。这算是隆华队最初的战绩吧。

转过年是 1926 年，青年会为了开展足球运动，决定在中华运动会上添加一场足球比赛，邀请隆华足球队参加。以前中青队和隆华队共比赛了四场，中青队以三胜一平的战绩获胜，他们以为这次再赛，一定能稳操胜券。

为了这次比赛，冯庸大学校长冯庸先生特捐赠了刻有“勇冠三军”字样的大银杯一座。并决定每年举行一次，连胜三年者，银杯就归胜队永久保存。

隆华队接到邀请后，就开会研究比赛对策。估计他们的最强阵营，很可能是：

祁福祥 马成美 周维璞 孙广琛 陈家运
王铭堂 蔡泰山 刘红秀
刘文建 毕文金
陈柏生

经过了上年的四场比赛，我对中青队也已了如指掌。中青队的左翼硬，马成美的一盘一传，祁福祥的一射，准而有劲，颇具威力。马成美的盘带虽好，但他踢球无力，软绵绵的威胁不大，可以不管。于是我派张文焕盯住祁福祥，不让他起脚射门。右锋陈家运只能沿边带球传中，不能射门。内锋孙广琛盘带过多，只想单独立功，推进不快。中锋周维璞虽是个危险人物，我把他交给了王鸿运，王的头球好，抢球稳健，可以逼他把球传出去，不给他射门的机会，这样就可以保住不输了。他们的三个前卫只到中线就不再前进了，所以在后场只看住他们五个前锋就可以了。

研究了对方，我们隆华队也排出了阵容：

陈英凯 王鸿林 战凤台 孙福德 郭义达

李成平 王鸿云 张文焕

罗仙樵 刘义昌

耿恩华

阵容确定了，接着又商量好一个先守后攻的战术。为了保证不输，把前后卫又做了一番部署，将前卫排成一条右前左后的斜线，不是一条横线。三个前卫的前后距离各三米左右。

赛前，队员王永盛建议组织个啦啦队。我觉得在胜负未卜的情况下，啦啦了半天输了球会更丢人，但王永盛却说这一回肯定能胜，我有一把洋号，再借一把，加上两个鼓(一大一小)就行了，人我负责找。因为大家都同意，我也就同意了。

比赛是在下午两点，暂停了田径赛后进行的。上场一看，中青队的阵容和我所料的一点儿不差，对于这场比赛，我想一定不会输了。可那次我没有上场，换上了谁现在想不准了，可能是傅宝瑞。

比赛一开始，中青队就先发制人展开猛攻。因为隆华队已经充分地研究了对方的打法，虽有险象，但未失分。下半时易地再战，中青队因在上半时的强攻过猛，体力有些下降，而降华队则开始了反攻，下半时 20 余分钟时，隆华队从后场传到前场的一个高球，在争顶中，中青队刘红秀举腿过高，将隆华队郭义达的前额踢伤，郭义达在血流满面的情况下，带球猛插禁区，射进了第一个球，为隆华队夺得冯庸杯打下了基础。中青队丢了第一个球后，有些慌张，又被隆华队中锋战凤台射进了第二个球。比赛遂以 2 比 0 隆华队胜利而告终。

我登上主席台接受了刻着“勇冠三军”的冯庸杯，队员各得了一些奖品。这一次胜利大大地鼓舞了隆华队士气，队员们在尔后的练习中就更努力了。

这时啦啦队就大吹其号，大打其鼓。啦啦队队长王永盛又建议，以鼓号为前导上街游行一番。大家都不反对，于是我就抱着银杯走在最前面，后边一路纵队从大连体育场出发，嗵嗵嗵，嗵嗵嗵，嘀嘀嗒，嘀嘀嗒地，向西岗区最热

闹的街道走去，从东关街顺着电车道往西走到新开路，再转到大龙街一家饭店，出席了老美华经理成衍文先生为我们准备的祝捷宴会。

成衍文先生是一位足球爱好者，对于隆华队有所偏爱，按成先生的话说：“他喜欢隆华队球踢得文明。”每逢有重大比赛时，他总是用车送来饮料，这在精神上给我们的鼓舞很大。后来成先生又在新开路开设了谦益号鞋号，从此，我们的球鞋、服装等，都在谦益号买，不再向天津的利生和春合函购了。

1927年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参赛的日本足球代表队（早稻田大学队）赛后来到大连，并通过满铁体育部向中华青年会约中国队比赛两场。为了共同应战，青年会邀请隆华队共商对策。经过商讨，决定隆华和中青两队合组一个中华足球队，选出二十一人参加，并选罗仙樵为队长，刘文建为副队长。青年会负责定做黑蓝色印有篆体“中华”两字的球衣等。球队虽然组成，但因时间紧迫，连一次共同练习都没做就仓促应战了。

赛前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日本方面满铁领导人和中国方面青年会总干事张洪五先生先后致词后，由日本满铁体育部长冈部平太的小姐向中国队献花，由中国银行经理张家鳌先生的小姐向日本队献花，两队队长升起中、日两国国旗以后开始比赛。

第一场出场的人员是：

陈英凯 马成美 战凤台 孙福德 郭义达
张文焕 蔡寿山 王鸿云
罗仙樵 刘义昌
耿思华

因为队员是从两个队选出的混合队，事先又没做共同练习，漏洞百出，加上守门员失常，结果以0比6大败。

第二场在次日的午后举行，阵容做了如下的调整：

陈英凯 马成美 战凤台 孙广琛 郭义达
张文焕 蔡寿山 刘红秀
毕文金 刘义昌
陈柏生

这场又以 0 比 4 输了。

比赛是输了，但吸取了不少教训。过去我们打的是“阵地战”，各守各的位，互不照应，非常死板。前锋和前卫之间脱节，形成大片漏洞。而日本队的两个内锋前后接应，无形中就排成了 WM 的阵式，其机动灵活的配合、跑动，确实是我们所不及的。

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没有教练，又没有统一指挥，都是各自为战，踢不到一块儿，犹如一盘散沙，再加上两位盘球好手马成美、孙广琛，过了一个又一个，盘个没完，贻误了时机。

总的看来，日本队员的个人技术不如我们，但他们的合作甚佳，非常默契。赛后虽然称赞我们个人的脚下功夫好，但缺乏统一作战的方法。

当天晚间在电气公园(现动物园)内的登瀛阁举行了中日两队的联欢。

这场比赛使我深深的认识到，只重个人技术，忽视了统一的思想意志和战略战术，是注定要失败的。

1928 年，又到了举行中华运动会的时间，隆华队正在厉兵秣马，准备再夺冯庸杯。忽然在《泰东日报》上发表青年会的一封公开信，说原定每年一次的冯庸杯赛，今年因故不举行了，要隆华队在中华运动会上交还冯庸杯换取纪念杯。对此我感到很意外。

前一年中青队在冯庸杯赛失败后，阵容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祁福祥、周维璞外出求学，马成美、秦日新因故他去，因此实力大减。在必败无疑的情况下，才想出了这个中止比赛的办法。

根据这种情况，我当即召集全体队员进行研究。大多数人认为这是青年会搞的花招，停赛的原因是很清楚的，银杯决不能还。我则认为我们踢球是为了锻炼身体，增进友谊，不是为了银杯。我们也可以在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说

明原委，把银杯还给他们，连纪念杯我们也不要。经过讨论，队员都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就写了一个声明在《满洲报》上发表，接着叫王克俭把银杯送还了青年会，冯庸足球赛只举行了一次就这样夭折了。

那时我在邮船株式会社工作，经常去码头船上办事，看见在第三码头 24 号泊位的后面，有些外国人在那里踢球。我就上前和他们搭话，知道他们是太古洋行的 BLUE FUNNEL (蓝烟筒) 船上的船员，爱好足球，因为没有对手，停泊时只好下船来随便踢着玩玩。于是，我提议和他们比赛一场，他们都很欢迎，可需要得到船长的许可。

第二天，我就用打字机打了一封英文邀请信，送给船长，得到他的同意，定下时间，我去领他们到球场。这是我们第一次同英国人的比赛。

英国人身材高大，头球好。最初我们不习惯同外国人比赛，有些怯阵，互有胜负。后来积累了经验，就胜多负少了。

1927 年日本队来大连比赛以后，大连的日本人也开始了足球活动。他们除了在学校之间开展了足球活动，还组织了满铁足球队。后来又计划组织一个足球联盟。

当时的大连虽说球队不少，而实际上只有中青和隆华始终如一。其它球队只是几个人起个名就是个队，踢一场就散伙了。所以满铁单请隆华队和中青队共商组织足球联盟的有关事宜。其主要目的是：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足球运动，提高足球运动的水平和增进友谊；负责招待来访的球队；公认足球裁判员；门票收入补助各加盟球队的经费等。（详见满洲体育年鉴）

当时设在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通称满铁），名义上是一个商业公司，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设在大连的一个庞大的侵略机构。满铁内有许多部，体育部（冈部平太任部长）就是其中的一个，它统辖着许多体育团体。过去日本人不搞足球，看到大连的中国人对足球运动很爱好，并成立了好几个出色

的球队，就想把中国人的足球运动也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都不高，觉得有这样一个组织也好，还可以纠正一些足球界的混乱状况，所以我们都同意了。满铁、隆华、青年会各出一名理事(隆华罗仙樵，青年会宋发身)，满铁提议请电车株式会社的社长山冈担任理事长。足球联盟就这样成立了。

1929 年东北大学足球队远征日本，全胜归来；冯庸大学足球队又于 1930 年来大连与满铁队进行了一场比赛。以 2 比 0 获胜。

1934 年到 1936 年间，足球联盟共组织举行了六次联赛，隆华队连续六次获得冠军。

1936 年，满铁总裁捐赠了一个银杯，并决定从当年开始，将每年两次的联赛改为一次，定名为满铁总裁杯赛。连胜 3 年者此杯就归其永久保存。

这时又吸收了工华足球队。工华足球队是一支新兴的力量，由当时麻袋工厂的工人组成，在该厂职员胡家显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苦练，崭露头角，被吸收为联盟会员，由胡家显出任理事。他们虽拥有朱秉章、朱长英、王宝山、段全图等一些好手，但最初阶段还是屡屡败在其它队的脚下。

1936 年和 1937 年隆华队连续两次获得满铁总裁杯后，因为将主力队员转让给了伪满“国家”队 1938 年的联赛决赛败给了工华队，永久保存满铁总裁杯的希望破灭了。

其实从 1930 年以后，隆华队的人员经常有较大的变化。由于各种原因而离开大连的有傅宝瑞、张文焕、张维忠、王克俭、刘相真、孙福德、耿恩华等，病故的有战凤台等，总共有十多个人。陆续吸收进来的有衣茂梓、李大年、蔡殿阁、吕作富、郭鸿宾、邹国裕、蔡宝珠、文安福、李国瑞、谭学高、谭学荣、于世序、朱永泰、孙世法等人。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郭义达、李成平等人又去了长春。我因两次重伤(一次半月板撕裂、一次骨折)，退居二线当了替补。人员变动虽然这么大，但新加入的运动员的球艺都不比前者弱，依然在联赛中保持不败的记录。

1932 年我考入大连海关工作，工资增加了好几倍。除了隆华队成立当时，

每个队员各拿出一元钱用来买球衣以外，尔后的一切经费都由我一人负担。从没接受过任何人的援助。

在获得冯庸杯以后，除足球联盟的联赛外，每年都有将近 20 场的比赛。印象较深的有：

1935 年 迎战英国海军萨佛克队和日本实业团体冠军队汤浅蓄电队。

1936 年 迎战英海军康沃尔队和日本关东关西对抗赛冠军关西学院队。

1937 年 迎战英国海军坎巴兰队和日本大学球队冠军拓殖大学队。

隆华队和英国船队比赛后有了点名气，英文报纸也登载隆华队的比赛消息。他们将“隆华”二字译成“龙花”（DRAGON FLOWER）。英国海军队就是闻名后通过大连埠头事务所和满铁体育部向隆华队约请比赛的（因军舰都停泊在港外，一般人上不去）。

对英海军的第一战就以 0 比 3 输了。英海军队里有不少是从英国甲级队退下来的。他们球艺娴熟，经验丰富，在上海杯赛中也名列前茅。“萨佛克”是一个全用短传的队，十一个人排成“w”字形，人与人之间等距离地向前推进，只传不盘，一停就走，配合非常默契，人刚到球就走了，使我们疲于奔命也抢不着球。上半时就输了 3 个球。下半时对方停射才以 0 比 3 结束。按实力讲，再输 3 个球也不算多。

后来对英国海军两场比赛，我们也吸取了教训，改变了战术，互有攻守，第一场 0 比 1 失败，第二场 2 比 2 踢平。隆华队因为人员老有变动，且一部分在旅顺，一部分在大连，只有比赛时才凑到一起，因此短传推进也只是学了一点皮毛。

对于三个日本冠军队都取得了良好战绩。其中最使人难忘的是对拓殖大学队的一战。

拓殖大学队是日本大学中新上来的冠军队。他们在大连共赛了三场。第一场以 6 比 0 击败工华队，第二场以 4 比 0 击败了中青队。我国观众非常憋气。

隆华队因为连看了他们两场比赛，对拓大队有了了解，决定在他们气焰正盛的时候，争取先射进第一个球，以打下他们气焰的战术。那时正是隆华全盛的时期，素有铜墙铁壁之称的卫线战将蔡宗珠、文安福、吕作富、李国瑞和攻无不取的锋线谭学高、邹国裕、郭鸿宾、朱永寿、李大年等，不负众望，不到一分钟就射进了第一个球，打掉了他们的锐气，拓大队失球后被打乱了阵角，隆华队越战越勇，又连续射进了五个球，他们连换了三个守门员，也没守住。看台上的我国观众欢声雷动，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赛后日本教练对于排成一条斜线的前后卫倍加赞誉说：“这个战术太好了。”

中青队虽然失败了，但他们也吸收了以夏树福为首的李永新、孙德信、孙承祺、孙承祀等一批前锋，但他们的卫线较弱，在联赛中虽能战胜工华、满铁各队，但始终没能战胜隆华。

满铁足球队成立以后，始终战不过隆华和中青两队。他们为了加强实力，从日本国内请来了六七名好手，其中有参加过远东运动会的中锋本田长康和参加过柏林奥运会的守门员纒纒八郎等，但还是不行。

守门员纒纒有 1 米 80 左右的身材，捕球好，判断准，活动范围广，球不太好进了。过去，隆华和他们比赛时，不太费力就可以射进三四个球，纒纒来了以后，球就不太好进了。隆华队的对策就是如何设法把纒纒引出来再射门。如往右做假动作往左射，或故意漏球让跟进的队员射，不停球凌空扫射等等。在第二届满铁总裁杯赛时，战局紧张，球虽在满铁门前来来去去，但由于纒纒的善守，屡射不进。快到结束时还是 0 比 0。左内锋邹国裕射门果敢，勇于在人群中起脚射门，最后才获得宝贵的一分，使隆华队第二次抱回了满铁总裁杯。

这次出场的阵容是：

陈英凯 邹国裕 郭鸿宾 蔡殿国 李大年
罗仙樵 吕作富 李国瑞

蔡宝珠 文安福

、
宁××

隆华队虽然屡屡获胜，但始终没有觅得一个好守门员。虽然耿恩华、刘相真、刘凤翔、宁××、马殿甲等都先后充任过，但都不是上乘的。因为那时还没有保护守门员的规定。守门员挨踢、挨撞是很常见的，所以有的人就不愿意干，能找到一个就不容易了。因此他们只能救一般的球。不会鱼跃，射往球门上角或下角的球，往往扑救不了。所以在比赛时使卫将不得不分心照顾球门，极度影响了比赛的进程。所幸的是隆华卫将吕作富、蔡宝珠、文安福等都是十一秒左右的田径选手，回救及时才免遭失败。

这年隆华队连战连胜，中青、满铁、工华、商华、新华、青华、旅顺工大各队都败在隆华脚下。

这时旅顺二中见到隆华队所向无敌，鉴于隆华的主力是二中的学生(蔡宝珠、文安福、李国瑞，朱永寿等)，他们决定将加入隆华的二中同学调回学校，而后再向隆华提出挑战。这些队员考虑到事关母校的问题，也只得从命了。可是隆华队接到战书后，不甘认输，招集了剩下的队员准备迎战。没想到在比赛当日，有些人因故未到，只来了张文焕、陈英凯、邹国裕，郭鸿赛、李大年、蔡殿阁、吕作富、罗仙樵、宁××等九个人。这使我大伤脑筋。要干嘛，实力太弱；不干嘛还不甘认输。于是决定以 9 对 11 应战。因为相差两个运动员力量悬殊，不得已只有采取防守战术，八个人防守，只留张文焕一个人在中线附近，并叮嘱他后方无论怎样危急，也不得回救，留在那里，伺机反攻。果然不出所料，一开球，二中队就展开了强攻，隆华队门前成了二中队任意践踏的地带。隆华队则采取了盯人战术，使他们没有起脚射门的机会，只能在门前传来传去。结果给隆华队得到了一个将球传给左翼的机会，张文焕得球

后直奔对方球门。这时二中队的前后卫都压过了中线，返救不及，被张文焕射进了第一个球。下半时易地再战。二中队因为上半时输了一球，一开球就暴风般地杀到隆华队门前，二中队的守门员见到隆华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也进了中线附近。没想到隆华又得到一次将球传出的机会，张义焕得球后直奔空门，二中队只得目瞪口呆地看着张文焕把球送进了网窝。

当日旅顺二中队的阵容是：

李永新	孙德信	夏树福	孙承祺	孙承祀
×××	郭清荣	李国瑞		
	蔡宝珠	文安福		
	马××			

这是隆华队最艰苦的一场比赛。本来我在两次负伤后，一般都不下场比赛，让年轻的上阵，多得些锻炼的机会。但在人数不够时，我才下场。而一旦下场，即便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隆华队也从未败过。因为我不急不躁，善于观察，随时根据比赛情况和战术上的需要，及时调整化置，来个阵线大换班（如前退后、左换右等等）以便打开战局。这种以智取胜的战术，获得了多次的胜利。这次对二中队的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战例。而旅顺二中（后改为旅顺高等公学堂）队在这次比赛中所犯的错误的，就是放松了对站在中线附近的张文焕的警戒。他们以为人数上 11 对 9，隆华队必败无疑，过分的自信，反而使自己吃了“骄兵必败”的苦果。

这次比赛，我是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上场充数的，也是我足球生涯中最艰苦的一战。这以后隆华足球队的声名大振，再也没有队向隆华挑战了。

1930 年前后，世界经济又趋恶化，从大景气降到了不景气，失业的人员大幅度增加。

隆华队里的一些小青年，除了考入中学的一些之外，多半是小学毕业，家境不太宽裕，找不着工作。那时我在大连海关已经稍有地位，看到队员的一些困难情况，甚为焦急，我就找人事科的盛长荣先生，请他给想个办法。后来在他的协助下，同时安排了七八个队员到海关当了下级职员。记得有郭鸿宾、孙

世宽、王国章(是工华队的)、邓永富等人。

1936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帝国”为了粉饰升平，成立了足球协会，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兼任足球协会会长。组织了“国家”足球队。球队成员以隆华的郭义达和李成平为首，都是大连人。他们为了表示所谓的“民族协和”，还吸收了一位白俄来协尔，两名朝鲜人李致镐、金某(名字忘了)，两名日本人根来和友纳(弟)，准备访问日本。他们为了检验本队的力量，特来大连约隆华队比赛。

隆华队接到挑战后，我因为这些人都是熟人，不愿使他们过分难堪，就对队员们说，胡弄一场就行了。结果踢得不很认真，被他们射进一球。伪满队攻进一球后以为是打败了东北最强的隆华队，那个欢呼雀跃的情景，引起我的反感。于是在开球时将阵线稍加调整，并示意队员要马上给个颜色看看。不出所料，在开球不到一分钟，就射进了一个球。尔后又进两球后才停止射门，轻易地以3比1战胜了他们。

回去以后，他们觉得实力太弱，被隆华队毫不费劲地就击败了。于是为了加强实力，特派友纳(兄)来大连找我商量，要求支援他们几个队员。那时隆华队员中没有工作的，我基本上都在海关给他们安排了。因为他们不是考试进来的，都是“巡役”，月工资仅20多元，生活比较拮据，为了使他们能生活得好些，我向友纳提出了较高的条件，工资要在70元以上，并给任命委任官的职位，如同意可以随便挑，要谁给谁。接着我就召集队员们商议。有人提出隆华队怎么办的问題。我说，隆华足球队不过是一个游戏的组织，对生活上并没有帮助，你们生活都很困难，还是吃饭要紧，球队黄了也没有关系。于是让被选中的队员都去了长春。内中有蔡宝珠、谭学高、郭鸿宾、王国璋等，别人就记不起来了。

他们去了长春以后，都被任命为伪满司法部书记官，友纳的诺言实现了，

伪满“国家”队充实了，隆华队黄了。这件事回想起来，我一直感到很内疚。

隆华队虽将主力送走了，但还剩下邹国裕、孙世宽、邓永富、王鸿云、陶文海、蔡殿阁，谭学荣、马殿甲、高荣楠等人，经大家努力奋战，在击败满铁，中青两队后，为了连胜三年永久保存满铁总裁杯，特把送往长春的几名主力叫了回来，参加了对工华队的决赛。可是分手两年的队员再合到一块儿，已非昔日可比，比赛时漏洞百出，结果败给了工华队，永久保存满铁总裁杯的希望破灭了。

1938年我的工作有了变动，从大连海关调转到长春财务职员训练所任副教授。一天两节课，倒也清闲自在。

我在那里工作期间，有大同学院同学石富源，劝我去协和会中央本部工作。协和会是配合傀儡政权，对人民进行法西斯思想统治的专制机构，内分总务、实践、辅导三部。辅导部准备将伪民生部的体育联盟纳入协和会的领导之下，因没有懂得体育的人故未能实现。当时他来劝我到协和会去，目的是为了多赚几十块钱。长春的物价比大连贵两成左右，我已有五个孩子，生活比较紧，因此在送走了第一期毕业生以后，我就去了协和会，并在那里担任了体育联盟名誉主事、足球协会理事等职务。最主要的还是搞足球。

1940年是东京奥运会年。日本在“九·一八”后又挑起了“七·七”事变，由于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日本人在军事上陷入泥沼，国内经济困难，连金牌也做不起了。于是他们为了挽回面子，辞退了筹办奥运会而组织了一个小规模“大东亚竞技大会”。邀请伪满、汪记南京伪政权、内蒙、菲律宾、夏威夷等“国家”和地区参加。

伪满为了参加这个大会，各个单项协会都选拔了代表队。关于足球，就委派我当领队，日本人铃木骏一郎当教练。为了标榜所谓“民族协和”，有几个人是非选进不可的，那就是前面已提到过的日本人根来和朝鲜人金××、李致镐等。

铃木骏一郎是东京帝大足球队最强时代的左边锋，是一位(地质)技术人员，当时他是伪满水利电气局的技正。据他说吉林小丰满水电站的坝址是他选

定的。他反对日本天皇，和我很谈得来，但他毕竟是日本人，有些问题，他还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

关于伪满代表队的服装问题，原定是蓝法兰绒西服上衣，白哗叽裤子，戴草帽，后来因为没有钱，改为草绿色哗叽衬衣、裤子、战斗帽。真是不伦不类。

足球队在长春南岭工业大学集训了一个时期后，经大连去日本。

在大连同工华队作了一次比赛，以0比2败北。

伪满代表团的团长是民生部大臣谷次亨，总领队是体育联盟主事铃木良德。

汪记南京伪政权代表团的团长是褚民谊，李州担任总领队，此外还有一个顾问是日本人冈部平太。

代表团到达东京以后分住在各个旅馆。那时东京不像现在那样有很多高楼大厦，大多是二层小楼，银座的三越百货店的七层楼就算是最高的了。

足球队住在上野车站附近只有十几个房间的小旅馆，配给5台小卧车常驻旅馆门前，归足球队自由使用(那时还没有面包车)。

代表团到达东京以后，参加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日本人根本没瞧起两个傀儡代表，大会发言时只有英文翻译，没有中文翻译，受到了“中”、“满”两代表的指责。现找也不赶趟，于是伪满篮球队(中银队，有田福海等)的管理员老张自告奋勇，当了临时翻译。会后，日本人找到在日本的电影演员白光当了大会翻译。

在代表会上因内蒙的问题，汪记伪中国提出了抗议。最后在开幕式时，内蒙做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打着一面小一号的内蒙旗，跟在伪中国的后面入场才算了事。

开幕式在日本天皇的弟弟、大会总裁秩父宫临场后开始。内蒙做为一个代

表队虽然参加了，但他们没有什么竞赛项目，只在会上做了几个蒙古式摔跤表演而已。

开会后的一个星期天，秩父宫在东京的六义园举行了一次游园会，招待了参赛的运动员。

这个大会原定举行两次，关东大会(东京)，关西大会(大阪)。因为没有钱，只好把足球移到神户附近的甲子园，草草了事。

那时国内还没有草皮球，训练、比赛都是在土场上进行。因此球鞋底都用的是横条，不是皮钉。大会虽然把我们按排在骏河台的明治大学球场练习，但那里也是土场，得不到去神宫外苑比赛场地练习的机会，记得在那里只练习了一次。在练习中发现，草场和土场大不相同，脚下发滑不说，因为球浮在草上，用土场的踢法，一踢就高，地面的传球也因草的磨擦，滚走缓慢，往往传不到位，高球落地的弹跳，也和土场不一样，为了适应草场的需要特将横条换上了皮钉。对日本的第一场比赛，在不习惯场地的情况下，结果以 0 比 3 败北。

在东京的第二场比赛，是对菲律宾队。队员们已习惯了一些草地球场，上半时就射进了两个球，下半时菲律宾队挽回一球，在比赛将终了时，后卫李致镐顶球失误，将球顶进了自己的球门。已经赢了的球却又平了(2 比 2)。

第三场伪中国对日本的比赛非常紧张。伪中国队的三个前锋夏树福、阎承宽、朱秉章都是大连人，其他有前东北大学的谭福祯、天津的姜琨、姜璐等。他们在先失一球之后，从左方传中的一个齐腰高的平球，右内锋朱秉章跳起凌空横扫，没等日本守门员反应过来球已入网。这个球踢得漂亮极了。这场球 1 比 1 踢平。在此期间，大会又招待运动员看了一场 1936 年拍的奥运会记录片“民族的祭典”。

这几场球赛完后，伪满对伪中国，菲律宾对日本的两场比赛，转到关西的甲子园球场举行，四个队都住进了设在橿原的奥运会村。到甲子园赛场得从橿原乘特快去甲子园。对伪满的比赛伪中国“大义”弃权，伪满队白得两分(比赛规定循环赛是胜 2 分，平 1 分，败 0 分)。到此，比赛的成绩是日、伪满各

得 3 分，菲得 1 分，若是最后一场，菲律宾能战胜日本，则各得三分，按大会规定就得重赛，以决名次。这样，这场球就成了最关键的一场比赛。这时队员们从集训到比赛，已离家将近三个多月，都想早日回家，所以对这场球也特别关心。

当日下着大雨，雨像是水柱一般泻降下来，我们各买了 5 毛钱一把的油纸雨伞，乘特快列车去甲子园观战。

日菲之战在如注的大雨中进行。上半时各不相让，皆无建树。下半时，日方可能很少在雨中训练，不善踢水球，体力显著下降，菲队则越战越勇，压过半场打，因日方防守严密，始终未能破门。距结束只剩一分钟时。日方忽得一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到门前，日方跳起一顶，球直奔球门左方，守门员认为此球一定出界无疑，立足未动。不料此球在门柱旁落地，这是一个旋转球，大雨加上草滑，球向里一转，转进了球门，守门员再捕也来不及了。足球比赛至此结束。各队得分是：日本队得五分为冠军；伪满队得三分，为亚军；菲律宾队得二分，伪中国队得二分，并列为季军。

闭幕式在东京外苑体育场举行，伪满队获得二十公分大的方形奖牌一面，队员每人得八公分大的同样奖牌各一面。图案是几个运动员单臂侧平举站在个太阳的前面。奖牌是铝制的，可见日本此时连铜的也做不起了。

比赛完毕，大家都要回家了。那时还没有飞机，来去都是坐船。伪中国队是从华北来的，他们第一天乘船去了天津。第二天轮到伪满队乘船回火连。届时在檀原车站朱秉章来送我们，才知道他是从武汉参加伪中国队去日本的。因为他要经由上海回武汉，所以在我们走后，他只得孤零零地在异国再等两天。他乡遇故知，又要分手了，不禁都流出了泪水。今日说来已经快五十年了，在日本檀原车站满含泪水向我们挥手致意的朱秉章的形象，还历历在目。

永丰塔记略

尚允川

复州古城位于辽宁省瓦房店市西北，距瓦房店市区约 50 公里，沿沈大公路(古驿路)西侧，东南有蜿蜒的复州河，西北背负群山，是瓦房店市西北地区的交通、经济和文化中心。

据考证复州地区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栖息繁衍，镇西驼山乡曾出土磨制石斧、纺锤等石器。汉唐以前这里就有郡县的设置，李官、松树等地的汉墓可为证据。辽兴宗重熙（1032 — 1054）年间迁渤海，扶余遗民于其地，置复州怀德军，复、扶同音，复洲之名自此始。

辽金两代佛教颇为流行，省内锦州的古塔，义县的双塔，辽阳的白塔以及复州的永丰塔，从形制上看都是同时代的建筑物。永丰塔虽未考定其确切年代，但一般确认为是辽塔。

复洲古城在七十年代中期拆除。笔者曾亲见其完整的城南门及瓮城，并看到了出土的刻有“永乐乙酉”（1405）字样的奠基石。《复县志略》所载砖城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是合乎事实的。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重修，是最后的一次。

城外东南隅为高亢丘陵，原有大佛寺，坐东朝西，殿宇巍然。佛殿后有砖塔，建于平岗，为寺院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辽代迁民有的来自永宁、丰水两县，故塔名为永丰，随之，佛寺也称永丰寺，至今复州东南一带仍以永丰为地区名。

永丰塔为石基，须弥座高约 2 米，密檐式、八角十三层，高约 23 米。座的各面都有砖券佛龕。因建塔已近千年，风雨侵蚀，砖雕漫漶，大部分已模糊不清，只存残臂断砖，无复辨认浮雕形象。

永丰塔凌空矗立，居高临下。昔时无论陆行于驿路，舟航于复州河（早已不通航），皆可为遥望城郭的标志。古塔处于群山之中，每当夕阳西下，诸峰

皆暗。仅有余光映于塔巅，称“永丰夕照”，为复州八景之一。清末邑人梁殿奎有诗写此景：

古刹巍峨镇永丰，佛前夕照殿凌空。
六朝金碧浮屠老，一抹胭脂造化工。
薄暮四维山色紫，落晖半点塔巅红。
地临南郭依城阙，日夜来游八景中。

我国到处有“八景”、“十景”之名，其实大多数景目是相互因袭，陈词滥调，很少有状物写景的惊人奇语，从而大多数不足以反映山河景色的雄姿，只不过是文人墨客笔下的辞藻罢了。但永丰塔的高耸。的确是沧桑历史的见证，在近代史上更不乏波澜壮阔的画面。

塔下原为旧时刑场。1914年民主革命激进会的石磊等24人。因截击宗社党私运武器和反对袁世凯称帝卖国活动，被当时旅大地区日本殖民地当局俘获，引渡到原复县（今瓦房店市，当时治所在复州），被杀于永丰塔下。

1946年在解放战争中，由于叛徒的告密，复州区长、共产党员张筠同志被敌人包围。他英勇抵抗，后因弹尽，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于1947年1月17日在永丰塔侧从容就义，时年仅二十六岁，掩埋于塔下烈士陵园。有碑记其事。

(作者系大连市教育学院教师，现已离休)

东北十六省

罗 仙 樵

1941年，日本侵略当局，曾把伪满的东北三省分成十四个省和一个特别市。一个特别市就是新京(即长春)；十四个省是：黑河、北安、龙江、滨江、东安、延吉、吉林，通化、安东、奉天、四平、锦州、和兴安南北两省。以后，兴安南、北两省又分成兴安东、西、南、北四省。这样东北就有十六个省了。省长中，北安，黑河，东安三省，是日本人。延吉省是朝鲜人。当时伪满总务厅统计处长徐家桓被任为四平省省长，我受聘为秘书官。省长会议由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主持，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员参加，各部大臣及有关高级官员列席。觐见皇帝时要上省政奏折。先交伪国务院审查，而审查者竟是一个着长袍马褂的日本人，然后打印五份，宫内府和伪国务院各存档一份，另三份分别送交伪国务总理，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和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

满铁图书馆的西文藏书

汪 哮 海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而满铁图书馆则是这个侵略机构的图书情报中心。满铁图书馆原为满铁调查部的一个图书资料室，1907年创建于大连。随着满铁事业的迅速发展，图书资料室的规模越来越大，其作用和影响也日见扩大。经扩建后，1918年易名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改隶满铁会社直接领导。在近40年时间里，为了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满铁图书馆不惜重金，不择手段地搜集各类图书，很快成为东亚图书馆界的佼佼者。其中所搜集的三万余册西文图书，质量较高，有相当数量的珍本或善本，特别是远东文库(Far East)和犹太文库(Jewish)，收藏有大量研究东亚问题和犹太问题的珍贵资料，特点尤为明显。这部分藏书除了在日本投降时有一小部分散失，解放后上级有关部门调走一部分外，基本上保存完好，现藏于大连市图书馆。多年来因为宣传揭示不够，这些书尘封库内，鲜为外人所知，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为了挖掘这部分藏书，笔者做了一些调查，本文试从源流和特点两方面略做分析，以期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

一、源流考究

据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大谷武男回忆：西文方面，主要是关于东亚，特别是关于中国的书及杂志，这部分书在日本也是高层次的。考究这部分书的源

流，主要是通过重金收买、接收和捐赠，逐渐积累而成。例如，1925年曾将当时驻在长春的苏联领事拉布罗夫所搜集的有关中国边疆问题的西文图书五百余册悉数收买；同年又把在北京留任的意大利公使馆馆员劳斯收藏的舆图及部分图书购进；日本著名汉学家大谷光瑞保藏的图书（其中有中国古籍五千册，西文图书三百册）也移入该馆。最后一次较大规模地接收西文图书则是在1943年。据《书香》记载和大谷武男回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满铁所属的三大图书馆进一步作了分工，规定大连图书馆是“东西关系，学术综合专门图书馆”，奉天图书馆是“交通工学，工业社业图书馆”，哈尔滨图书馆是“北满及苏联关系专门图书馆”。因此奉天图书馆将有关东西关系的贵重欧文书和中文古书移交到大连图书馆。

当然，满铁图书馆主要还是利用满铁调查部驻世界各地的机构代为搜集所需图书的。据《满铁公司史》记载：“到昭和十一年为止，当时所收藏的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报纸、杂志剪辑以及图书，总计有十多万部。”这其中就包括相当数量的西文图书。即使“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马恩通信集》、《马克思传》（孤本）、共产国际杂志等书刊、唯心主义哲学著作《黑格尔全集》、《尼采全集》、《康德全集》等书，也是尽量搜寻。”（杨力生《满铁大连图书馆》）

日本学者草柳大藏的《满铁调查部内幕》一书也提到：“想读的书图书馆里简直是汗牛充栋，应有尽有。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伏尔加《经济年报》、《列宁著作集》、《一九二七年提纲》等等”。该书还记载：一个叫丸尾毅的人曾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旅馆里和一位名叫久门有文的大尉同住过一段时间。临分别时，久门非常珍贵地拿出一本书说，回国时要把它作为礼物送给陆军省。丸尾一看，原来是两年前他在大连图书馆就已经读过的《大英帝国军用地志》。丸尾不禁为满铁藏书之富而感慨万分。

满铁图书馆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类图书，完全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在《满洲教育史·满铁图书馆》一书中就明确提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就是用所藏图书，配合当时的形势发挥其作用”。不言而喻，就是要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

略扩张政策服务。

二、特点分析

满铁图书馆比较注重收藏百科全书，尽管这类图书大都是豪华巨册，价格昂贵，也舍得出重金购买。经积年努力，当时欧美国家出版的百科全书，基本上买齐了，遗漏不多。这些百科全书形成了满铁图书馆西文馆藏的一个显著特点。

《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是公认的最有权威的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是著名的 ABC 三大百科全书之 B。该百科全书以其第九版(1875—1889 年出版)而崭露头角，引起世界重视。这一版共二十四卷，奠定了《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学术威信，确立了大条目主义传统，被称为学者版。第一版(1910—1911)则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发展的另一个新阶段，无论是在框架设计上还是在编辑方法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百科全书之首。第九版和第十一版这两种较珍贵的版本，满铁图书馆均有收藏，印刷装帧均为上品。

《意大利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Italiana)是二十世纪前期世界著名的四大百科全书之一；内容丰富，着重人文历史学科，艺术条目更为出色，特别是关于文艺复兴前后欧洲各国的文化艺术叙述尤详，可补其他百科全书之不足。有关欧洲古老家族氏系条目是在其他百科全中不易查到的。此书印刷极为精良，书内附有很多套色图片。满铁馆藏本为初次印刷本，海内殊不多见。

《布鲁克豪斯社交词典》(Brockhaus' kleines konversations Lexikon)和《大布鲁克豪斯》(Der Grosse Brockhaus)是德国历史悠久的综合性百科词

典，在欧洲有很大影响。奠定了一种不同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纂模式，形成了德国百科全书的独特风格。现行的《布鲁克豪斯百科全书》就是在其基础上修订改编而成。满铁馆所收藏的《布鲁克豪斯社交词典》全本和《大布鲁克豪斯》(不全)均较为珍贵。这两部词典的特点是词条短小易查，释文清楚详尽，对于外来语和外国事务分析得极为精确。

其他著名的百科全书如钱伯斯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法兰西百科全书、新时代百科全书、新国际百科全书等，均为洋洋巨册，印刷精美，插图鲜艳，令人爱不释手。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

远东文库的藏书，对于研究东西关系史的学者来说，则更为珍贵。该文库藏书 6705 种，很多珍本今天已不易看到。

尤其是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著述，弥足珍贵。据《书香》记载和大谷武男回忆，1932 年国际联盟曾派员来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为做好接待工作，满铁图书馆受命举办了为期三天的书展，除展出百余张抗日传单外，主要展出了明清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一百余种。由此可见，满铁图书馆对于这些藏书是颇为自豪的。

例如四卷本豪华装巨册《中华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1735 年巴黎初版本和 1738 年伦敦版，是生活在法国的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利用在华耶稣会士书简和他们有关中国地理，历史、年代、政治、制度、文物、民族的报道，编纂成的一部研究中国的空前巨著，从而把当时欧洲研究中国的热潮推向了高峰。《中华全志》收有大量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元曲《赵氏孤儿》的最早译本，就被收在其第三册中。

满铁馆还藏有可与《中华全志》相媲美的另一部巨著《北京教士报告》(Missionnaires de peking)，巴黎 1776-1791 出版，共十五卷。系清朝中期在中国传教的洋教士所写，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时局、历史、文化、民俗等情况，当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来华，乾隆十三年(1748)死于北京。他翻译了《通鉴纲目》并补写宋至清初史实，成《中国通史》十二卷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满铁馆所藏 1777—1785 年巴黎初版本, 也是相当珍贵的。

年代更为久远的著作, 如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所写的《中国历史》(Sinica historiae), 1659 年(顺治十六年)在阿姆斯特丹印刷出版, 从版本学和文献学的角度看, 都可列为珍本。

《耶稣会士游记》(Travels of the Jesuits)1762 年伦敦版, 为英国学者约翰·洛克曼编, 其中收有法国传教士洪若翰记述他们进入中国并和康熙皇帝接触, 得到康熙皇帝赏识, 以及传教士张诚作为翻译被派到尼布楚和沙俄使节接触, 说服沙俄使节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经过。还有康熙皇帝在废立太子之乱后, 心脏衰弱, 后经传教士罗德诊治, 得以痊愈的记述。这些资料相当珍贵, 海内外均属罕见。

所藏其他著名汉学家和传教士的著作, 如首先记述唐景教碑并研究其传入中国的曾德昭的著作《中国通史》, 1667 年, 里昂出版。

德国汉学开山祖基尔旭所著《中国礼俗记》(China Monumentis), 1667 年, 阿姆斯特丹出版。

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的洋洋巨著《中国情况新记》, 1697 年, 伦敦初版。

法国汉学家德经的巨著《耶稣基督前迄今匈奴、土耳其、蒙古及其他西鞞民族通史》。成书于 1758 年。

《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 1797 年伦敦版, 由马卡尔尼大使的秘书斯坦登所著, 详细记叙了使华经过及同中国各级官员乃至乾隆皇帝接触的过程。是研究中英关系史的珍本。

特诺所写的《出使西藏记》(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 in Tibet), 1800 年巴黎版和 1806 年伦敦第二版, 记载了十八世纪西藏的社会政治、宗教活动和民族风俗等, 反映了西方殖民主义者

觊觎西藏的野心。当为极有价值的史料。

远东文库还藏有不少研究日本同西方交通史的书籍。《东印度公司特使觐见日本天皇记》(Remarkable addresses by way of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伦敦, 1670 年出版。当时东印度公司迫切希望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 书中详细记述了东印度公司第一次派遣特使到日本觐见日本天皇时种种复杂仪式, 及在日本停留时的见闻和观感, 还有日本天皇的种种敕语, 记叙得极为详尽, 为研究日英关系史的必读书。

另外象反映第一次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革命,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日甲午海战,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 日俄战争, 辛亥革命, “九一八”事变, 伪“满州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书籍, 虽然出版年代不算久远, 但其中亦不乏颇有史料价值者。兹举一例, 《奉天三十年》(Thirty years in Moukden)系苏格兰长老会著名传教士司督阁的回忆录。他于 1882 年来华, 在东北传教施医 39 年, 在沈阳创办盛京医院和医学堂。《奉天三十年》记述了他在东北活动的事迹, 对当时发生于中国的事件, 如甲午中日战争, 义和团运动, 日俄战争, 辛亥革命和清帝逊位等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和反响, 做了较为真实的记述。同时对东北社会民俗及满族的生活习惯, 清朝士大夫的繁琐礼仪等都有记述。通过司督阁的眼睛, 可以看到封建王朝末期, 危机四伏, 内外交困, 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的场景。当为不可多得的珍本。此书还可匡正某些中文书和学者对司督阁记载的错误, 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赘述, 待另写专文说明。

“犹太文库”同样是一座值得开发的文献宝库。《犹太百科全书》皇皇巨册, 豪华精美, 堪为上品。一些希伯来文的著作, 尚难以考证其真正的价值。年代久远的著作, 如十七、十八世纪的版本, 亦不鲜见。犹太文库的建立, 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加速同德意法西斯相勾结的企图。满铁调查部曾将当时世界各国报纸杂志上有关犹太问题的报道和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消息, 剪辑装订成几十册, 至今保存完好。可以肯定, 这些资料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在这些西文藏书中, 艺术类图书也颇有特色, 而且这类图书印刷装帧大都

极为考究。例如《蒙古建筑》(The Moghul architecture)为专门研究蒙古风格建筑艺术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关于蒙古的庙宇建筑叙述尤为详细。另外关于蒙古建筑与伊斯兰教的圆屋顶建筑在力学上的原理以及彼此的影响，也作了极为透彻的说明。作者史密斯为研究东方艺术的专家，他曾用十余年时间专门从事东方建筑艺术的研究。此书当为研究东方建筑学的必读书。还有当年为国联调查员极为称道的《中国陶瓷图录》，对于研究陶瓷艺术来说，也是极有价值的参考书。

考古方面的书也颇具特色，匈牙利斯坦因，法国伯希和的著作展示了西域考古研究成果，也反映出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国珍贵文物的掠夺。这些书彩色插图，装帧考究，极为精美。

西文期刊杂志部分也收藏一批珍本。如一八三二年五月创刊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美国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主编，另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卫三畏参与编辑的。《中国丛报》前后连续出版二十年，其中刊载了鸦片战争前后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调查报告，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各种侵华主张，翻译介绍的有关中国历史、宗教、农业、儒家典籍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作品。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发轫和早期中外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

还有由法国著名汉学家高第创办的《通报》(T'oungao)，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中国每周评论》(China Weekly Review)，《亚州评论》(Asiatic Review)等近百种西文杂志，满铁图书馆也是尽力收藏，形成了特点。

上述所举十不及一，然仅此，亦足以说明满铁图书馆西文藏书的价值。笔者因外语等诸多知识所限，不能深入全面地概括出这批藏书的全貌。中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和各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整理与开发这批宝藏，揭示和宣传

这些珍本，使其服务于中外学术研究，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应当成为我们今后亟待抓紧的一项工作。

(作者系大连市图书馆副馆长)

封面题字设计：陈 经 迪

工本费：2.30 元